

甘肃史志



2012.1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2011年12月19日，副省长郝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巡视组办公室主任吴明明到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宣布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要领导的职务任免决定。根据工作需要，金庆礼同志不再担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职务，专门从事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李虎同志担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职务。

或许，是因为

九 日

你问我，为什么歌声不断

或许，是因为

我出生的地方，叫董志塬

那里的黄土层，世上最厚

那里的黄土塬，天下最宽

那里的太阳最红

那里的月亮最圆

那里，给了我宽广的胸怀

那里，给了我丰富的情感

站在那里，我笑对三皇五帝

站在那里，我笑着历史变迁

你问我，为什么浑身是胆

或许，是因为

我生活的地方，在黄河边

这里，一头携着东海

这里，一头牵着喜马拉雅山

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这里是东方文明的摇篮

这里，给了我无穷的智慧

这里，给了我正义的肝胆

站在这里，我敢下海底降龙

站在这里，我敢上天宫舞剑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9133 号

卷首语

或许,是因为 九 日(1)

特 载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2012 年工作要点 (4)

副省长郝远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6)

省志办主任李虎在天水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9)

理论研究

地方志书的选材 陈泽泓(12)

小议小篇平行分卷体省志 李琳琳 沈松平(18)

史地考证

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 薛方昱(24)

神秘黑水国 黄 杰(29)

工作论坛

继承与创新并重修志与用志结合 陈希圣(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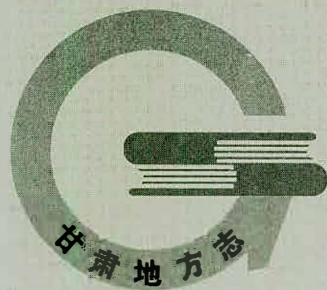
关于提高志书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王建华(37)

经验交流

刍议新编地方志专业审稿之技巧 赵 丽(40)

全神贯注修志书 尽心竭力出精品
——省地税局二轮修志工作总结回顾
..... 司徒芳 整理(43)

录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高天成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篇目选登

《临夏市志(1986—2005)》目录 (46)

历史回眸

甘肃民国大事记(1935—1936) (52)

转 载

清代以来地方志编纂问题述论
.....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 (58)

陇原人物

杨静仁心系家乡二三事 周学海(70)
从《慕寿祺致甘肃通志总纂安晓峰书》
探先生方志学的学术思想 慕思恭(74)

乡土民情

石崖寺花儿会 李雪兰(77)

志苑随笔

中国地名趣味派对 车安宁(79)
赴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扶贫 钱 旭(76)

简 讯

省志办安排部署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8)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2012 年工作要点

2012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及省委十一届十四次会议精神,紧密围绕文化大省建设要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切实有效的工作举措,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和 211 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全面抓好地方志工作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不断开创“志为主体,志鉴并举,整体推动,均衡发展”的地方志工作新格局,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一、突出抓好主体业务,在志鉴编纂上取得新成果

认真抓好组织协调、检查督导、业务指导、人员培训、志稿评审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全省第二轮修志,继续扩大地方综合年鉴工作覆盖面,保证志鉴质量,提高工作水平。

加快志书编纂进度。进一步强化主体业务意识,切实加快志书编修进度。省志计划今年完成的,抓紧审定评议,争取尽快提交终审。正在编纂的,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完成初稿。尚未启动的,创造条件尽快启动。省志中,终审《档案志》、《税务志》上册(地税部分)、《体育志》;初审《水利志》、《气象志》、《广电志》、《教育志》、《文化志》、《共青

团志》;《建置志》、《地理志》、《生物志》、《人物志》、《书画人物志》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州志中,出版《武威地区志》,终审《定西地区志》。市县区志中,出版《永登县志》、《正宁县志》、《和政县志》等 4 部,评议《平川区志》、《民勤县志》等 3 部。

加大年鉴工作力度。认真做好《甘肃年鉴》2012 卷的编辑工作,采取调整篇目结构、充实薄弱内容、加强文字校核等措施,进一步提高质量。加强对市州年鉴的审查把关。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促进有条件的市县启动年鉴工作。

提高志鉴质量。把精品意识贯穿到修志编鉴工作全过程。严格执行审定验收各项制度,重视志稿评议程序,切实把好志鉴质量关。做好对终审志稿的校核订正工作,力争多出佳志、良志。

二、努力拓展工作领域,在相关工作上取得新进展

在确保修志编鉴重点任务如期完成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相关工作进一步发展。

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快纸质版志书年鉴和相关资料的数字化转换。启动甘肃地方志网站建设。统筹推进全省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工作。

启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志》的编纂。制定《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志》编纂方案,完成篇目设计和人员培训,组织收集资料。相关市(州)地方史志办公室做好配合工作。

抓好修志人员业务培训。争取在下半年举办一期全省修志人员业务培训班。参与指导省上单

位和市县的修志业务培训。

做好《甘肃史志》期刊编辑工作。发挥期刊学术园地作用,积极扩大稿源,改进栏目设置,刷新版面设计,加强学术性,增加可读性,扩大影响力,推动地方志工作理论建设。

加强志书收集工作。加大史志资料收集工作力度,实现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资料室省内志书配套收齐的目标。争取多收多藏外省相关资料。做好现有资料的阅览服务和开发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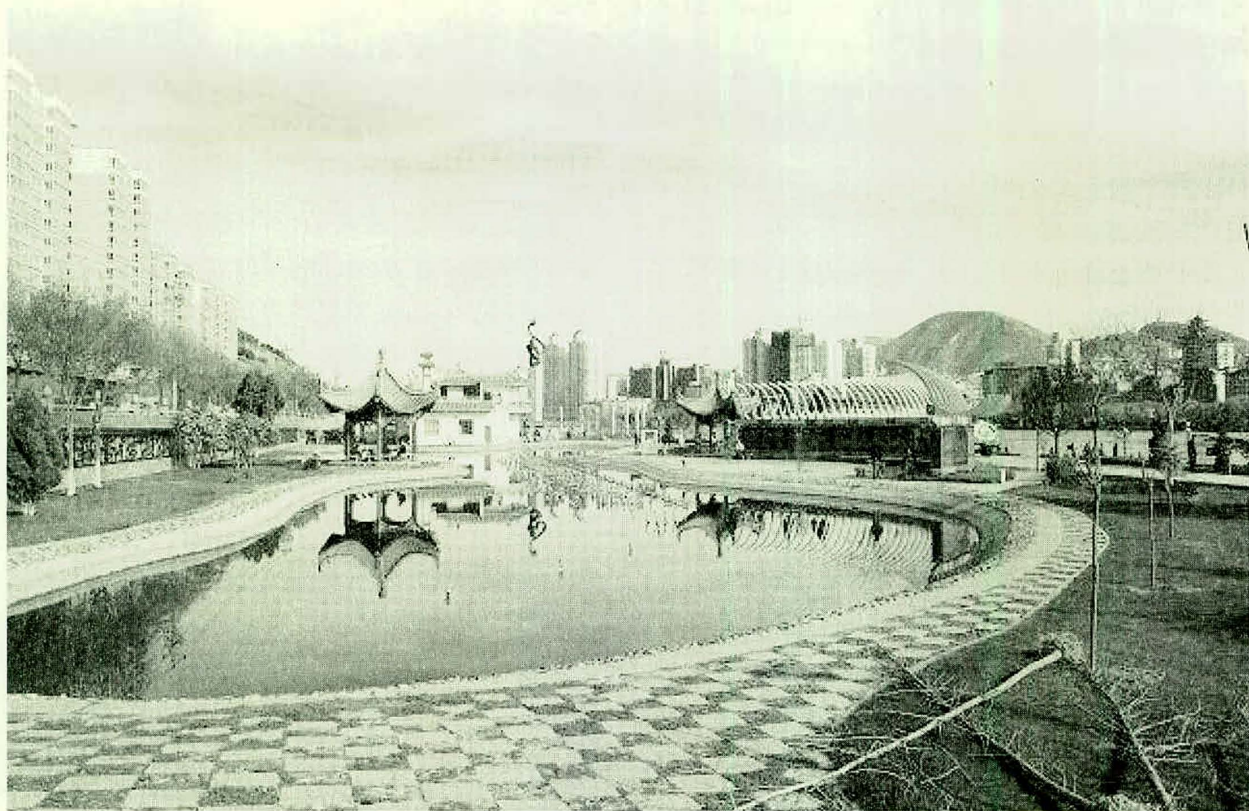
搞好“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决策部署。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各处办“双联”行动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和安排下,尽全力帮助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及其44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圆满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史志办公室在当地党委、政府安排下,完成好各自的“双联”任务,使全系统干部受到教育和锻炼。

三、大力推进修志部门自身建设,在转变作

风上取得新成效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站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搞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锐意进取,苦干实干,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加扎实的作风投入新一年的工作。要不断完善工作思路,积极创新工作方法,认真落实工作责任,推出更多更好成果,以地方志工作的新成绩助推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创建“四型”机关为载体,全面加强机关建设。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改进作风,健全完善制度,靠实工作责任,强化目标考核,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机关向心力和凝聚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为全面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创造条件。



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副省长 郝 远

(2011年12月19日)

同志们：

刚才，吴明明同志宣布了省委、省政府关于金庆礼、李虎两位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省委、省政府的这个决定，是从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建设和工作需要出发，在认真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认真研究做出的，相信能够得到全体干部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近年来，以金庆礼为班长的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职工，指导督促地方各级修志工作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使全省地方志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编纂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优秀史志成果，在传承历史、服务现实，推动全省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完成了首轮修志任务，全面推开了二轮修志工作，提请省政府颁布了《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使修志工作有了制度保证，高度重视志书编纂质量，新编地方志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更加突出。特别是通过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整体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踏实工作、默默奉献、团结协作、奋发有为的工作作风。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金庆礼同志团结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省委、省政府对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工作是满意的，对金庆礼同志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根据工作需要，金庆礼同志不

再担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职务，专门从事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希望金庆礼同志继续关心支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工作。

李虎同志于1996年2月任省档案局（馆）副局长（馆）长、党组成员，2010年3月任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正厅级）。李虎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思路清晰，思维敏锐，经验丰富，严谨细致，勤奋敬业，善于协作共事，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担任省档案局（馆）副局长（馆）长期间，认真履行职责，注重研究解决档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管的档案安全保管、档案编研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担任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以来，加强机关党的工作业务学习，进入角色快，组织省直机关代表团参加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并取得较好成绩，积极组织开展省直机关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活动，举办了喜迎建党九十周年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书画摄影展，组织了省直机关第十届干部职工运动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李虎同志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关心干部职工，团结同志，工作扎实，对自己要求严格，希望李虎同志尽快转换角色，熟悉情况，开展工作，也希望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能够积极支持李虎同志的工作，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加富有成效。

借此机会，我就进一步加强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有关工作，推动全省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讲几

点意见。

第一,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今年10月份,中央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纽带和展示当代中国风范的载体。地方志工作作为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基础事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发挥着重要的存史、育人、资政作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以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契机,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为根本,以建设学习型机关为抓手,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要善于思考,注意总结,结合地方志文化建设实际开展讨论,通过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大胆开拓创新,形成推动地方志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

第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领导班子实现团结统一和正确决策。主要领导要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善于抓班子、带队伍,善于谋大事、议大事、管大事,带头发扬民主,调动好各方面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完善议事和决策机制,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智慧,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有机结合,在重大问题决策和干部任用上,要集体讨论决定,具体任务分工负责。班子成员要增强全局观念和团队意识,多沟通、多商量,彼此尊重,相互支持,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和统一,既要对自己职权范围的工作大胆负责,主动协调解决问题,又要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领导,倍加珍惜和维护好班子的团结,努力增强班子活力,提升班子整体合力,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干部职工拥护的坚强领导集体。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

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引导广大修志工作者热爱地方志事业、献身地方志事业、干好地方志工作,磨练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的意志,培养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努力建立一支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修志工作队伍。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对修志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开展各种方式的学习考察和座谈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创造力,不断改善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第三,不断提升修志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地方志工作肩负着为党立言、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树碑的神圣使命,发挥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信的重要作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要充分认识地方志事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围绕推动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和为整个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两大课题,不断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全面抓好业务建设、质量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编纂出更多的精品佳作。

当前,地方志工作正处于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期,要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撑,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继续抓好《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学习贯彻,理顺地方志工作机构,坚持依法修志,努力营造全社会关系支持地方志工作的良好氛围。要适时抓住甘肃自然和社会重大事件,确定若干选题,组织编纂几部有价值、有影响的专门志书,如借鉴《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编纂经验,筹划和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抗灾救灾志》等,不断扩大地方志部门的社会影响力,更好地服务社会。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始终把精品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的全过程,抓紧完成一轮修志扫尾工作,全力加快二轮修志步伐,加快推进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确保全省修志工作总体进度。

要高度重视年鉴工作,做好对全省年鉴的业务指导和协调工作,把《甘肃年鉴》办成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献资料。要督促各级政府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保障机制,为地方志工作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第四,坚持求真务实,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一个单位的事业顺利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优良的作风。要始终保持优良的作风,以求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状态做好工作。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中。要在抓落实上动脑筋、想办法。要多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了解广大干部群众的所思

所想,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勇于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着力研究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树好形象,带好队伍,不断促进事业发展。

同志们,省委、省政府对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班子寄予厚望,希望新任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势头和精神状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我省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为弘扬甘肃精神,推动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志办安排部署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2月24日上午,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召开全办干部会议,对做好全办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进行动员并做出安排部署。

会议学习传达了省委书记王三运在全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和省委《全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意见》。

会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李虎对全办干部参加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动员大会的精神,尽快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是省委加快推进我省脱贫致富步伐、实现我省同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决策,是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和作风、转变机关作风、培养锻炼干部的务实之策。全办干部要充分认识到省委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扎实认真地开展好此项工作。二是要带着真情实感,做好长期准备和打算,扎实做好联村联户各项工作。全办干部都要把积极参加这项行动看作是自己工作份内的事情,作为为人

民群众办好事、为脱贫致富办实事的极好机会,作为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锻炼提高自己的极好机会。全体干部都要勇于承担工作任务,按要求进村联户开展工作。要按照因村因户制宜,尽心尽力而为,竭尽全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脱贫致富。三是要坚持一手抓业务工作,一手抓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工作,做到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今年,省地方史志办编史修志工作任务繁重,要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抓好联村联户工作。通过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激发工作的热情和干劲,促进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联村联户工作取得好成效。四是要加强领导,常抓不懈,切实把省委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把此项工作装在心中,抓在手上,精心谋划,抓好落实,确保实效。省史志办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在同联系村初步对接的基础上,尽快确定机关干部同贫困户对接的意见,尽快进村开展工作。会后,省史志办大部分机关干部即日将奔赴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开展帮扶工作。

同志们：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我省文化大省建设之际，天水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全面回顾总结2011年工作，表彰奖励修志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安排部署2012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与支持。认真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必将对调动全市各方面工作积极性，开创天水市地方志工作新局面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天水市地方志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法律法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工作思路新、措施实、力度大、效果好，实现了攻坚克难、夯实基础、理顺体制、全面发展的新目标。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对天水的地方志工作是肯定的、满意的。过去的一年，天水市的地方志工作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领导重视。天水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主要领导经常过问，市政府定期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各个阶段工作任务，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去年4月，天水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地方志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从组织领导、机构设置、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特别是市县两级地方志办公室在机构改革中重新组建和规范运行，为全市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工作中把地方志列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文化大市建设的

在天水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李虎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项基础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与其它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落实。地方志工作任务纳入天水市政府目标管理，并认真进行考核，为促进全市地方志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史志部门强化业务督查指导，全面推进地方志工作。坚持政府主导、地方志办牵头，督查指导结合，全面加快了全市二轮修志工作进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了保障志书的质量，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出台了《天水市地方志审稿验收实施方案》、《天水市地方志资料报送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志书和年鉴的审稿程序，明确了地方志资料报送范围和程序。市志办创新工作机制，实行科室职责任务制和地方志业务项目负责制，靠实了责任，匹配了经费，扩大了自主权，加强了自身建设，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保障了地方志书的质量。

三是全市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实现了新突破。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要求，去年用一年时间，天水市全面理顺了地方综合年鉴的隶属关系，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目前，由市志办承编的首部综合年鉴——《天水年鉴》(2011)即将出版发行，全市7个县区中，《秦州年鉴(2011)》、《麦积年鉴(2011)》、《秦安年鉴(2011)》、《甘谷年鉴(2011)》、《武山年鉴(2011)》、《清水年鉴(2011)》均正式出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水市的年鉴工作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值得全省地方志系统学习借鉴。

四是全市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去年5月，天水史志网成功开通，至目前点击量已超过数万人次。这不仅为全市丰富的地方志资源

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搭建了平台,同时也为更好地向国内外宣传天水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在做好修志编鉴等修志主体业务的同时,市志办统筹人力、合理分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近120万字的《天水大辞典》的资料收集工作、近80多万字的《国家灾后重建志》天水部分的资料长编撰写任务等。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近年来天水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重视关心的结果,是社会各界积极配合支持的结果,同时也是全市各级志办及全体修志人员不懈努力、辛勤工作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向天水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表示衷心地感谢,向天水市全体史志工作人员表示亲切地慰问,向今天受到表彰的史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地祝贺!

刚才,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李宽余主任所作的工作报告,对今年全市的地方志史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我都赞成。利用今天参加工作会议的机会,就今后的史志工作讲几点意见。由于不太了解情况,所讲意见仅供参考。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提高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决定。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素有“文化之源”、“文化之矿”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志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又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地方志工作也已由传统文化活动上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书记王三运在水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名城意识,积极打造文化旅游高地。历史积淀厚重、文化悠久灿烂是天水独特的资源优势。希望天水市、县领导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天水文化大市的进程中,能够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更好地将地方志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地方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加以谋划,统筹安排,切实解决好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使地方志工作更好地为天水文化大市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天水市各级史志机构和工作人员,要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加振奋的精神状态、以更加进取的工作态度、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做好地方史志各方面的工作。“有为才能有位”,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就能赢得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支持。

二、着力抓好修志主体业务,全力推动第二轮修志取得新进展。我省的二轮修志工作自2004年全面启动后,截止目前,规划的14部市州志已出版2部,终审2部,规划的85部县区志目前已出版23部,终审5部,完成初稿的有20多部。从天水市的情况看,二轮修志进展还不够平衡,大部分县区仍处在资料收集阶段。按照去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要求,我省要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还相当艰巨。希望市、县志办要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编纂进度,按期完成二轮修志任务。

三、严把志稿审定的各个环节,切实保证志书质量。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志书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主要取决于志书官修的权威性、资料的翔实全面性、编纂程序的连贯严密性,以及记述事物真实准确性。作为新时期的方志工作者,要使我们所编纂的志书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广大方志工作者一定要自觉地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方法,观察事物,研究规律,紧跟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为党、为国、为民立言;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确保志书质量,严把资料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和审核关;一定要从地方志肩负的传承文化、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这一高度,努力编纂出时代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具有地方特色,经得起现实评判和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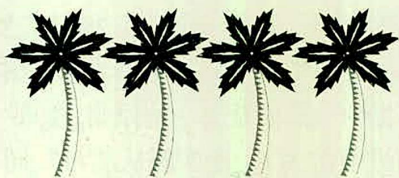
四、突出地方志工作的服务性、社会性,以实际行动自觉融入到天水文化大市建设的进程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为新时期我省文化大省建设绘制了新的蓝图,同时也为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级公众文化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地方志工作部门的主要业务是修志编鉴,无论是其工作性质,还是面向的服务对象,都决定了我们所编纂的志书、年鉴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特别是新编地方志,往往都是上百万字的大部头,要让领导同志天天翻志书、查资料,要使普通群众对志书百看不厌,这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如何让地方志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让我们的文化产品真正融入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地方志工作部门必须解放思想,拓展思路,创新方式方法,寻找最佳突破口和结合点。天水是著名的“羲皇故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伏羲文化、三国文化、秦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享誉海内外,要挖掘这些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地方志是最重要的载体和途径。在今后的工作中,希望天水市的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在认真做好修志编鉴等中心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渴望和需求,充分利用地方志系统的资料优势和人力优势,通过编印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时事月刊、挖掘整理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地情资料丛书、编写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册子、创办反映本地地情地貌、风土人情的地情网站等途径,进一步拓展地方志工作的领域和空间,进一步增强地方志工作服务中心的时效性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性。

五、加强领导,统筹规划,为地方志工作开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编修地方志是政府职责,是政府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官职”,其工作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细致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一是要做到“一纳入、五到位”。市和县(区)政府要按照国务院《条例》、省政府《规定》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十二五”规划、列入政府工作常态化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领导责任制等工作,确保地

方志工作机构、领导、人员、保障经费、条件到位,为地方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二是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修志编鉴的重要保障。在修志的同时要重视培养人才,多出人才。注意培养一些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研究的人才。总的说,史志部门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要努力建立和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奖励机制,将业务水平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管理人才,熟悉地情、精通业务、热爱和安心地方志工作的人才调整、充实到地方志工作机构中来。还要采取措施,吸收专家学者参与,为地方志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同时,要关心地方志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使他们有荣誉感、成就感,鼓励他们安心工作,无私奉献。三是要逐步考虑将方志馆建设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方志馆既是集方志编修、收藏、研究、开发利用于一体的基础文化设施,也是全面展示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俗沿革、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情资料信息中心。从目前全国已建成的方志馆来看,这些场馆在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开展志书的研究与交流、举办志书展览和专题讲座、展示地方人文历史和自然风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建设天水文化大市的进程中,建议天水市对天水方志馆的建设给予考虑,适时予以启动。有条件、有积极性的县区也可以考虑开展此项工作。

最后,我们相信,天水市的地方志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在各级修志部门和全体史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为全市文化大市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好地服务。



地方志书的选材

陈泽泓

地方志是一种独特的文献体裁(或称信息载体),有着特定的记述内容和记述形式。应从选材的角度阐述地方志的记述内容。选材的基本依据,必须立足于理论依据,因此,要认真遵循《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一、关于《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一)《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制订过程。

新中国修志从1957年开始(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列为该方案20个重点项目之一,并在规划委员会之下成立地方志小组,指导各地修志工作),已历50年。首轮修志从1984年开始(1983年9月27日,中央宣传部发文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指导小组要切实对各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做好地方志的编写出版工作。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于3月),也有20多年。志书质量标准问题,在实践中越来越显出其迫切性,理论条件也渐成熟。中指组从2006年在广州召开地方志性质研讨会,开始了一系列的研讨。2007年11月28日印发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提到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求“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进度服从质量”,同时也提

出了“根据新情况建立和完善保障志书质量的各种规章制度”。

实际上,在2006年就开始了《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的制订工作。在广州、北京、桂林等地前后四次集中部分专家与各地修志机构领导参加修订,先后经过16稿的修订,其中从第13稿起至16稿均改称《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并将第7稿及13稿发给全国各省市及军队、武警、新疆兵团的修志机构征求意见。第13稿也得到中指组成员提出的修改意见。2007年9月16日中指组正式下发的文件称《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第一稿为9章共68条,第十六稿为9章57条。正式文件是9章50条。文字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最长时有1万5千字,正式文件是4千多字。这其中凝集了许多修志人员和有关专家、领导的心血。

中指组印发文件的通知提出:“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等志书的质量要求,可参照本规定有关条文执行。”对文件执行的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

(二)理解《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的内容。

共9章,其中总则4条,观点3条,体例5条,内容2条,记述8条,资料3条,行文16条,出版7条,附则2条。文件的起草确实到了字酌句斟的程度,这些内容中有许多是理论层面的总结,有许多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与规范制约性。

着重对各章的一些条目谈谈认识。

第一章第三条,是质量的总体要求,9句话,包括观点、体例、内容、行文、印制五个方面。

第二章第六条,全面正确理解“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风貌,全面反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和成绩,正确反映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和问题”。

第三章第八条,认真理解“体例科学、规范、严谨,适合内容记述的要求”。将凡例纳入体例,而且对各种体裁都有点睛之语,应加注意。

第四章对内容的大致涵盖“方面”的表述有微妙之处(联系第二十四条)。

第五章要注意一些规范在度的表述上如何掌握的问题(如空间、时间的掌握)。

第六章注意对第二十五条的理解。什么叫资料的“代表性、权威性”及“原始资料”。

第七章条数最多,是具体的规范要求。对其中的采用二名法要求应予注意。

第八章基本上采用出版有关法规,其中对版式、书名、开本有特定要求。

第九章主要是对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的要求。

二、志书选材的涵盖面

新方志是在继承旧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其基本构成的内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1997年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对志书涵盖内容均无作出表述。同时,新方志工作者则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新方志的涵盖内容。1981年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讨论了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三个编修(纂)方案并原则通过。省志设31个分志(含经济综述和杂记);市志设11类(总类,城建、政治、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教科文、社会、人物类和杂类);县志设8个分志(概述、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志),此处的概述不是述体,而是包括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建置沿革、人口、县城乡镇。由此可了解新方志起步时对涵盖内容的探索。直到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提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文献”。条例对志书涵盖的内容,表述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从时间上表述为“历史与现状”,空间上表述为“本行政区域”,并要求记述应该是“全面系统”。条例所表述的门类内容,与1981年新县志方案分类最为接近。反映了新方志实践路子,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记述内容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地方志形成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地方志“应运而生”的变化脉络。

对《条例》的表述,还有两个问题应作说明。一是在所述的内容中,还必须加上人物为一类。二是各类的排列,约定俗成是将经济排在政治之前。为此,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章“内容”,在开头引用条例的表述“内容反映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又具体表述为:

“根据各地实际分类,记述内容大致涵盖以下方面:(一)建置、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信息、公用事业等;(三)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经济管理等等;(四)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群众组织、公安司法、军事等;(五)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和计划生育、体育等;(六)人民生活、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七)人物。”

以上是迄今为止对新方志涵盖内容最为权威的表述。应当指出的是,规定对记述内容用了“大致”一词,各地情况不同,记述的具体内容就有所不同。省志内容设置最为全面、复杂;地级市以上的志书,内容设置较为全面、复杂;县志内容设置相对最为完整,规范;区志内容设置对突出特点要求最高但是大体上应该按照质量规定的要求来规范,对于志书记述的涵盖面应保持稳定性。第二轮修志启动以后,所谓“不变不记”(多指自然环境)的说法一段时间较为流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一是自然环境(包括城市环境、地貌、土壤、水文等)都有较大变化,二是续志记述的是续志时段的自然环境,是前志所述不能代替的。

三、志书选材的时空限制

地方志的记述对象是事物,事物的时空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记述的特定要求,这当然也是志书选材的基本要求。

志书的地方性及涵盖面,使得其具有特殊的地情价值。志书在一般情况下多备用于查阅,地方志体裁独特的资料价值,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上得以体现的,时间越长久,其价值就越能体现出来。学术研究查用旧志,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一地区前后不同时期的志书对同一事物有关记述联系对比,揭示事物之演变。另一种方法是将不同地区方志中关于同一事物的记述联系起来对照研究。揭示事物宏观的基本规律。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众多志书的资料联系起来就能构成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应。这是志书不同于其他文献载体的价值所在。

从时间上说,每部志书都有其记述时限。地方志书有新修、续修和重修等分类。新修和重修地方志记述时限是从事物的发端到下限。续志的记述时限则设有上、下限。续志的上限是接着前志的下限的,这就决定了,一般说来篇目设置应保持前志的基本框架,无论是记述的连续性还是有利于查阅使用的角度,都应该这样要求。保持记述内容的相对稳定,地方志的连续性才能体现出来,地方志记述内容的价值也才能体现出来。当然,社会变化快,新志在内容必然有所增添,这就要求掌握后继承与创新的度。

从空间上说,志书从开头记人、地、事发展到涵盖百科。所谓概括一地从古至今包罗万象。旧志发展到成熟时,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财赋、户口、兵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等等,可以说无所不载。新方志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不断开拓新门类,使用新的名称,如自然环境志、信息志、政治志、经济志、金融志、文化志、教育志、社会志等等。

志书在记述内容上,既有涵盖百科,纵贯脉络的广泛性,但又有限制性。

广泛性:在记述规则上的表述,开始是“横不缺项,竖不断线”,逐步发展到“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是对记述内容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

重点的认识的深化。无所不载并非内容越多越好,现时志书篇幅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载,何况,滥载不等于万无一失,在现代社会分工、科学分类细化的情况下,要想把地情“无所不载”都收入志书是不可能的,志书不能代替档案馆。

限制性:在时空上体现为不越境而书、不越限而书。

(一)关于不越境而书。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规定:“区域界限明确。以本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越境不书。交代背景,反映与本行政区域外的横向对比、联系等,不视为越境而书。”记述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包括华侨社团情况,与本地有直接联系;改革开放以后,记述本地经济实体在外地活动,对外友好往来,不视为越境而书。

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本籍人物在外地的活动,与本地没有直接影响或一定联系的,就不能以人物活动意义大小或职务高低来决定其是否收入地方志。

二是克服地望情结。新志是以现有行政区域为记述的空间范围的,在使用地称上不仅要严谨、科学,符合规范,而且在记述中也要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好新旧地称关系。

(二)关于不越限而书。

旧志没有此提法,这是因为旧志编纂时间大多不长,社会变化速度不快,而且地方志的编修往往服从于全国统一。《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规定:“时间界限明确,不随意突破志书的上限和下限,严格控制上溯或下延。”不少新志在凡例中提出“为了保持记述事物的完整性,在记述上适当上溯与延伸”。所谓适当,实际上在许多地方不受限制。

上溯记述要严格控制。例如,新志有的不厌其烦地记述一些早已消失的葬俗之类的旧俗,特别是前志已记述的,还要不厌其详地照搬,一边在高唱精神文明,一边对文明新风或者是新产生的陋俗不屑一提,这就是指导思想有问题了。

下限延伸的情况更令人担忧。广东省首轮93部区县志中,不逾下限的只有8部,绝大多数志书在部分体裁(大事记、附录,照片尤为突出)或部分

事项(领导人任职、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字等)记述下限延伸,短则1年,长则10年以上。一部志书延伸的年限,一般有一至两个,少数有多个。延伸好象存入更多资料,其实作用不大,不仅使用不方便,而且对续修带来更大麻烦。

志书下限延伸的理由五花八门:为了弥补出版时间与原定下限时间差太大的时效作用;适应行政区划变化(如撤县建市、区划撤并、撤市建区、升格调整);“下限后为重要时期”,为“反映改革开放成果”、“填补空白”、“保存资料”、“叙事完整”或“完整记录”;乃至“视需要而定”。突破下限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人名录、经济社会数据表以及反映政绩新貌的照片。这样做的动机,大多是为了追求所谓“时效性”以换求对修志工作的重视,也不排除片面理解修志“服务当代”。这种急功近利的“创新”,只会造成记述体例混乱,降低志书质量,威胁修志工作生命力。

有的地方强调延伸下限能够尽快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更好发挥志书为当代经济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是,现时具备这一功能的的信息载体如年鉴、市情简介等很多,网络宣传也越来越普遍,大可不必为了让志书去负载和发挥这种近效作用而削弱其自身最宝贵最重要的功能。地方志工作机构是常设机构,编修地方志相传不断,大可不必担心会错失下限后任职领导人名字与某些大事和数据入志机会。修志机构除了对修志人员加强教育,对坚守志书记述下限的原则有必要作出明确规定,审查验收志稿务必把好这一关。

第二轮修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续志与首轮志书在时限上交叉,不宜采用交叉从简的记述办法。

二是新修市、区、县志应注意从新行政区域整体角度进行记述。上限原则上要上溯到事物在本区域发端之时。具体的记述方法可以根据事物性质及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处理。要有目的地收集材料,不能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改革开放起端的1979年和本行政区划建置年度固然很重要,1949年也是重要年度,新中国成立,许多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的地级市志在记述中罗列本地原

县份情况,作为地级市志,需要对资料进行纂辑,成为著述。首轮修志还有志书在行政区划升级变化情况下,仍以地名为中心,记述混乱,应理顺记述空间的基本范围,解决好与首轮志书的关系。

四、选材的基本原则

志书的指导思想并非套话,而是确实是起作用的。有的修志人喜欢跟风修改指导思想,导致影响志书质量,对此要认真对待。要坚持选材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和记述事物。

切忌总结报告式、阶段到顶式的记述,防止公式化、标语口号化。记述改革开放要注意到:分阶段的写法不要绝对化;对改革的措施要采取中性的记述,不宜过分铺张;注意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同中有异;不加议论或尽量少加议论;注意改革中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以及记述问题的新角度;不要忽略对正在消失的事物的记述。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观察和记述事物。

切忌人为地定调子,选材要全面、真实,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存真求实。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能以非好即坏的观点一刀切,更不能有意隐恶扬善。摆正政治立场与忠于史实的关系,避免不良政治效应与客观记述的关系。不要把政策规定与社会现实混为一谈。

(三)避免政治化倾向。

志书要摒弃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一种政治色彩,这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而宣传色彩正是当今社会上许多公开发表的文字的一个特点。修志人员要实现从公文写作到志书编纂的转变,特别要注意不能不顾志书的记述体例跟潮流,什么时髦就依什么设计,出现板块化的“三大国策”、“科学兴区”之类的设计。有的事物未经积淀是不能有过分的感情色彩。

(四)突出地方性与时代性。

志书的记述内容,应该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突出地方性与时代性,这就要求编纂者在知识广博,熟悉地情的基础上,具有敏感性与责任心。

改革开放是第二轮修志的记述重点,是时代性的突出表现,如何记述体制改革,首先是结构性问题。普遍的说法是集中写、分散写、集中与分散结合三种形式。其实,改革贯穿各行各业的活动,集中写,在各处也免不了写到改革;分散写,在小范围中也有集中记述改革的。因此,只有两种方式:大集中小分散还是小集中大分散。

集中写的程度取决于地方上改革开放的话事权与力度,即在宏观上的重大决策能力与行为程度;取决于地方上重大决策的内容有多少。

一般说来,行政区划级别越高,可集中写的内容就越多,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方法较好,要从实际出发选择记述形式。

将体制改革集中写,好处是整体记述“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也面临着两个难题:

- 1.在内容上如何体现全面客观,准确把握对体制改革过程与现状的评估。

- 2.在形式上如何体现科学规范,妥善处理与相关各部分的重复交叉。

目前所见的志书和志稿,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效果大多并不理想。

第二轮志稿亦多有设政治体制改革专章的,但所见稿子并不理想:

- 1.宏观上未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状况作全面的概括性记述,多写成工作纪年,有的内容其实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

- 2.有的记述较虚,只提及形式和工作过程,未提及实质变化和具体情况,只讲正面情况,不讲存在问题。

- 3.以偏概全,记述未能全面涵盖政治体制改革。

- 4.未能坚持述而不议的原则,有的提法不当,对一些刚开始的事项评价过高,虚话套话多。

- 5.在内容上多与相关事物的专章重复甚至取代专章。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因此,还是分散到党政决策以及相关篇章中加以记述为好。

五、存史是选材的最基本的标准

当代修志事业面临着两个新情况的挑战:一是信息载体的变化。古代地情信息载体少,传送方式单一,社会变化节奏缓慢,志书的社会价值无疑很大。现代地情信息载体多元化(新闻媒介、年鉴、网上数据库等等),转载方式日趋先进,社会变化纷繁复杂。二是读志用志要求的变化。古代读志者主要是为政者决策与文人学者稽古。当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社会成员素质大大提高,决策者有智囊团、研究机构,社会专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志书在当代还有存在价值吗,修志还有必要吗?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特定的需要与历史发展中,地方志形成了特殊的功能,公认的说法是“存史、资治、教化”。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存史是最为基本的功能。尽管志书的兴起与存在,起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资治,但是,经得起历史考验而留存下来,并能够生生不息,却在于其具有存史的特殊功能。至于教化,则是一种派生而出且与时俱进的功能了。修志事业能连续不断,在于其是所载资料的真实、详尽、准确,而且系统、全面,资料可信可用。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信息载体迅猛增长,但大多数载体着眼于为现时各方所需服务,其急功近利的实用性(站在不同角度有一定之积极意义)是十分突出的,急功近利不是志书的长处,也不应当是志书改革的趋向,那样会失其所长而趋其所短。志书最大的长处只能在提供地情的准确、充实上,以此吸引读者、服务读者、扩大读者面,同时巩固与提高自身地位。在日益增多的信息载体中,志书以资料准确、可靠、充实取得立足之地的要求更高了。随着时间推移,志书会越来越体现出其所存史料的珍贵价值,这种功能在林立的信息载体中是独树一帜的。当然,这种功能不是自然而然,必须通过修志者努力才能实现。

首届志书取得的成绩为众所公认,但在质量方面也不同程度地留下一些遗憾,最主要的是人志资料的存史价值问题,具体表现为误、漏、粗、谬。

所谓误,即是记述不准确。对于同一事物,不同志书记述不一,甚至同一志书前后记述硬伤的

情况也屡有所见。

所谓漏，就是对于一些应当收入志书的地情资料未能收入。造成缺漏记述的情况，一是泛政治化的避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判别那些是应当记述下来的。诸如民情风俗、社会变革。

所谓粗，即是对一些本来应该详写的有地方特色的、时代特色的事物、人物，记述过于粗略，甚至掐头去尾，蜻蜓点水。

所谓谬，指的是因为人为的生造、篡改或采录不实（移花接木或画蛇添足），造成错谬。

首届志书中普遍存在着分志难以跳出部门志窠臼的弊病，必须从存史和用志的角度考虑，明确各分志应当记述的内容重点，自觉摆脱部门志的窠臼，扩大其存史的视野和记述的广度。分志记述的重点，从写法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部门志。主要记述部门情况（包括机构、职能、工作情况）。这类分志宜力求简洁扼要，力戒大而全。

二是事业志。除了对工作部门的记述之外，更要注意着墨于事业的整体状况和总体水平。

三是社会志。其记述内容除了职能部门之外，更重于通过这一部门的角度反映社会状况。承修部门要以修志为宗旨，不能以部门职能所限为理由，将收集、记述部门工作以外的社会问题的资料视为份外。如续志中的服务志，改革开放后，城市服务业已不限于原来服务业管理部门管理的属下单位，而是呈多元化、动态化状态。如果承修部门不把这些内容纳入志书，那么，续修志书在保存历史资料上又将留下新的遗憾。因此，从修志机构到承修部门都应当树立自觉存史意识，科学地把握存史的尺度，才能使志书质量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和提高。

六、几点具体要求

如何判断志书内容应该记什么，不记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存史。从宏观到微观上都以此为依据。凡能够准确地、具体地反映事物的历史与现状的有用的资料，就应该设法保留下来；反之，就不该载入志书。这一点，与工作总结、工作报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而收集的资料大部分甚至绝大部

份来自于工作总结、工作报告，这就需要下大工夫去进行处理，这是编纂工作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以下是编纂工作的几点具体要求：

（一）去虚话套话，去浮泛不实之词，去解释之词，去评论之词。

（二）不说工作过程，去工作总结痕迹。

（三）奖项入志宜慎重。

第二轮志书中以达标、奖项记述代替事物具体性状的记述，成为本届志稿中常见的一种通病。由于奖项名目繁多，具体把关难度较大，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考虑：

1. 必须明确颁奖单位，入志奖项只限于颁奖单位是官方承办或承认的，民间组织或营利性的评奖一律不入志。

2. 同一奖项中（如科技奖）获奖者数目太大的，可按获奖级别高低作详略处理（如分述、列表与点名）。

入典类似评比达标表彰，也不要入志。

（四）少用数量比较。

不能以增长数代替具体数据；一般不必要记述增长了若干倍或百分比。

（五）关于记述社会风俗。

1. 对于现在已不复存的旧习俗，如要补述，不宜列为正文，可附录于风俗部分。

2. 记述旧俗，应记述其衰亡、在新时期复兴的时间及状态。

3. 对风俗习惯如实记述，不加评议，不要渲染迷信色彩。

4. 对于新出现的时尚习俗，应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予以记述。

5. 将政府倡导而未形成风俗的不宜作为风俗记载。

（六）控制志书篇幅。

现时一些区县续志稿，篇幅压缩控制到80万字左右是可能的，也会更恰当些。市志的情况复杂些，篇幅控制在150万字至200万字为宜。建议在审查验收志书时，把控制篇幅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讨论。

（作者系广州史志办原主任）

小议小篇平列分卷体省志

李琳琳 沈松平

摘要:省志编纂模式的选择对于省志的编纂具有重要作用。小篇平列分卷体是当今省志编纂中较为普遍的选择,这种模式不仅符合志书“资料性文献”的基本特性,而且在省志编纂的运用中也有明显的优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小篇平列分卷体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分卷、分志出版与志书整体性、内容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全书篇幅较难控制、各分志间的篇幅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各分志语言风格、行文规范、版式设计各自为政,不够统一、规范等问题,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省志编纂模式,处理好总体设计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

关键字:省志 编纂模式 小篇平列分卷体

省志记一省的人、事、物,始于元代,旧名通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图志。历史上,省志通常称为通志。省志是新中国三级修志中最高层次的志书,篇幅最大,通常在一千万字以上,且跨越数十年,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是当前方志编纂中最为浩大的一项工程。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省志的编纂首先需要选择一个编纂模式,进行总体设计,倘若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框架,任编纂人员自我发挥,那就可能造成材料的堆砌,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直接影响着志书的质量。打个比方说,如果把省志编纂比作是一座大楼的建造,那么省志篇目的设计就可以理解为大楼的设计和建筑蓝图,而编纂模式的选择就像是大楼的根基,如果没有建筑蓝图,大楼就无从建筑,而没有打好根基,

大楼就不能保证高质量与好评价。因此,志书总体设计的第一要素就是确定好恰当的编纂模式,然后才能在编纂模式之下设置篇目,填充内容,进而形成一部完整的省志。

一、省志体例的历史演变

省志编修的模式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以供纂修《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帝诏允其请,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并以贾汉复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纂修的《河南通志》“颁诸天下以为式”,自此,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康熙)

陕西通志》所采用的平列门目体因其“钦定体式”，成为各地纂修地方志争相效法的榜样，理所当然地成为省志的基本结构形式。乾隆时有人称：康熙间，圣祖“特命督抚各修省志，其成式一以贾中丞秦、豫二《志》为准。雍正间，世宗因《一统志》历久未成，复诏各省纂修通志，仍如前式。是恪遵功令，不敢因仍旧志，昭法守也”^①。到了乾嘉时期，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创始人的章学诚受邀编修《湖北通志》，独辟蹊径，创立了不同于平列门目的另一种省志体例——“三书体”，主张方志分立三书，即分“志”为“主体志”、“掌故”、“文征”，一部《湖北通志》分为“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部书，另附“湖北丛谈”。而成书于清嘉庆时期，由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广西通志》，则仿正史纪传体，分典（训典）、表、略、录（宦绩、谪宦）、传五体，开创了省志的纪传体风格，自问世以来，颇受名家赞誉，成为清代最负盛名的一部省志。梁启超云：“嘉庆《广西通志》其价值与章氏鄂志埒，且未经点污，较鄂志更完好也。……故后之作者，皆奉为楷模焉”^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志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旧时代无可比拟的速度迅猛地开展起来。1987年11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的全国省志编纂篇目讨论会上，与会各位专家学者选择湖北、贵州、陕西等省的大、中、小三种不同类型的省志篇目进行比较，集中就地方志整体性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省志篇目就是现在较为普遍的新编省志的三种体例，或称之为编纂模式，即大篇式、中篇式和小篇式。

“大篇式”，又称纲目体或大志多篇体式。这种编纂模式将门类分得比较粗，将相同或者相近的事项归并在一起，合成一卷，统一记述。大篇式一般是大志多篇，设分志（专志）较少，每个门类下设置若干篇，一级志目的专业分志一般在30个以下^③。如二轮《湖北通志》，专志的设置包括卷首、自然卷、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社会卷、卷末7大卷，77篇；二轮《河南省志》分为总述大事记环境资源卷、经济体制与管理卷、基础设施建设卷、农业经济卷、工业经济卷、流通服务卷、政治军事卷、文化

建设卷、人物附录索引卷，共9卷43篇。

“小篇式”，又称为平列式，或称“分志并列体”、“平头设志体”、“平列志目体”等。这种编纂模式根据地方的特点，兼顾现实的社会分工和管理体制，分门别类，类为一志，不设大志，按小类设志，一级志目比较多，一般有65-90个专志^④。如二轮《上海市志》设145卷，是典型的小篇式结构。

“中篇式”介于“大篇式”和“小篇式”之间，可以看作是大、小篇分类法的折中。这种编纂模式以科学分类为主，以现行社会分工为辅，进行设志谋篇，多采取综合立卷、一卷多志（篇）的操作方法，所设一级志目分志一般在50-70个左右^⑤。如二轮《安徽省志》设目录、总述、大事记、各类专志、附录共38卷；二轮《广东省志》设42卷。

“丛书加简志”，这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种新型的省志体例。这种编纂方式把志书编纂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按照部门分类，先按小篇体编省志丛书；第二步，在丛书的基础上精编简志。这样做的好处是较好地解决了采取小篇体、中篇体和大篇体方式编纂的不足，但同时也多出了一步操作步骤。二轮省志编修中，新疆、福建采取了“丛书加简志”的办法。

除开“丛书加简志”，省志大篇式、中篇式、小篇式三种不同体例，其主要区别在科学分类与现行管理体制的关系问题上^⑥。大篇体侧重于强调全志的整体性，门类设置综合性越强，志书的整体性也就越强，故一级门类设置的很少，但层次较高。中、小篇体中所设门类在大篇体篇目中只是大门类之下的小门类。小篇体倾向按现行社会分工也就是现行管理体制设门类，几乎把科学分类和符合社会分工完全等同起来，有利于调动部门的修志积极性，落实修志任务，加快修志进度。中篇体则居于大篇体与小篇体之间，既不把门类分得过大，也不完全按照现行管理体制设类，而是采用以科学分类为主、以现行管理体制为辅的办法设置篇目。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方志学家黄苇曾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利弊得失作过比较精辟的分析：“大篇体门类集中，有利于增强志书的综合性。但如果安排不妥，可能会出现隶属不当和结构不平

衡的情况,在编纂实施中,难度相对较大些。而就‘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篇目来说,有新颖之处,但将解放前后完全分成两块来写,对各种具体事物来说,可能反而容易割裂其连贯性,阅读也不一定方便。小篇体的优点在于容易结合实际,突出地方特点,也易于调动部门修志的积极性。缺点是门类分得较细,事物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整体性较难体现。中篇体的长处是门类设置较灵活,分得不像小篇体那么分散。不足之处在于其是一种混合模式,门类与门类之间有时可能不太平衡,在归类、标名等问题上容易碰到棘手事情”^⑦。

既然如此,那么省志体例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比较合适呢?所谓文无定法,省志的编纂模式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宜划一,应该允许尝试各种模式,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每一种模式的长处,又尽量克服每一种模式的不足。只要扬长避短,能够全面系统地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符合《地方志工作条例》,各种模式都有可能编出高质量的省志来。但就目前流行而言,省级志书框架结构采用小篇体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小篇体方式已成为二轮省志主要的编修方式。本文的论述重点即在探讨小篇平列分卷体模式在现今省志编纂中的运用、出现的问题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以求不断完善小篇平列分卷体模式,并在以后的省志编纂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这种模式。

二、小篇平列分卷体模式在省志编纂中的运用

省志编纂中采用小篇平列分卷体模式,显而易见有着不少优势。

首先,小篇平列分卷体有利于解决跨部类事物的归属。小篇平列分卷体设计互不统辖平列的专业分志,每个专业分志虽然独立出版、印刷,但专业分志之间的排列关系仍符合内在逻辑,因此符合志书的一般原则。而当今中国各个省市,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上农工商、科工贸、产学研、城乡一体化,多元化,在篇目设计上如果选择“大篇体”或“中篇体”,设置政治、经济、社会、工业、商业等大的门类,很多内容尤其是跨部类的事物将难于归属。而采用小篇体,不虚设“经济”、“政治”、

“社会”、“工业”、“商业”等大门类领属,事物的归属较容易解决。

其次,小篇平列分卷体有利于资料的收集、分类,操作性比较强。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之一。编纂地方志,首要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系统地保存一个地区某一时期的地情资料。不论是为经济建设提供信息,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还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为思想教育提供素材,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资料”二字。对于省志编纂而言,选择恰当的编纂模式、设计篇目就是为了合理、科学地安排资料。虽然单从资料性来看,各种编纂模式各有利弊,但是总的来说,“大篇体”、“中篇体”表面上看似形式科学,领属严整,但由于分类较粗,层次较高,束缚了部分多重性事物门类内容的置放。而小篇平列分卷体多开资料“仓库”,能够不受过多束缚地安排资料,所以更能体现志书“资料性文献”的基本特征。

再次,小篇平列分卷体有利于由单位、部门独立成志,调动单位、部门的修志积极性。由方志指导部门与承编部门、单位共同商定分志的具体类目,从整体上把握志书内容的宏观布局和科学性,及分志、分卷间的编排科学性、逻辑性,允许承编单位、部门编写成书,“一步成志”,成熟一卷,出版一卷,不必等到全部分卷编审完成后,一同出版,这样可以不断有成果,鼓励士气,先进推动后进。

复次,小篇平列分卷体有利于省志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特色的反映不仅应该体现在内容上,也要体现在篇目结构上。大篇体结构的志书主要是通过加大记述特色事物的量来体现地方特色,其篇目的第一层次看不出地方特色,一些特色事物在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才见诸标题。正如有的同志认为:“通常情况下,省志的第一层次,难以体现区域特点,而在第二、第三层次中常常因地制宜”^⑧。而中篇体和小篇体的志书,其地方特色在第一层次的标题上就能见到,特别是小篇体结构时有所见,且便于对某些特色事物“升格”设分志。

最后,小篇平列分卷体有利于处理大型志书的规模与传统编纂方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带来

了志书内容的迅猛膨胀,促使大型志书的规模不断扩展;而另一方面,传统编纂方法的“一支笔”总纂经过千百年实践的检验,也符合编纂活动的特殊规律。因此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依靠硬性的控制,压缩志书的规模,对每一个篇目以及篇目下的内容、字数做硬性要求;或是只着重宏观反映,不详细排列微观资料,使得志书的资料性受到影响。小篇平行分卷体,先易后难,分卷出版,改变了以往通过“一支笔”总纂实现志书整体性的途径,转而依靠框架结构的合理设计、体例和行文规范、版式的统一等途径来实现,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志书规模和传统编纂方法之间的矛盾,在省志(大型志书)编纂中彰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三、问题与解决办法

上文我们阐述了省志编纂中采用小篇平行分卷体模式的诸多优势,但我们同时也不否认,在实际的操作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分卷、分志出版与志书整体性、内容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全书篇幅较难控制、各分志间的篇幅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各分志语言风格、行文规范、版式设计各自为政,不够统一、规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省志编纂模式,处理好总体设计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

首先,要处理好省志的整体性与省志各分志相对独立的关系。省志名义上是一部书,实际上是一套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全志的整体性,又保持分卷出版的各分志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总的原则是有利于加强全志的整体性,因为分志是从属于总志的,它不是一部结构完整的书,而是一部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志和独立出版的同类专业志是有区别的,除内容的详略有别外,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一本完整的书,而前者不是,因此各个分志都必须受省志总体设计的制约,要服从总体设计的要求,不能有什么写什么,面面俱到,搞成小而全的部门志。但另一方面,省志的分志又是分卷单独出版的,各专业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服从于省志的总体设计和统一体例的前提下,应允许各专业分志记载与本专业直接有关的全部内容,不做硬性综合,在编纂

方法上对交叉重复有较大的自由度,原则上只须解决好分志内部的交叉重复。我们常常讲专志贵专,但专志贵专不是唯专,那是相对而言的,不要把专志贵专绝对化,要允许专业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突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记述对本专业(行业、事业)事物发展有直接影响和紧密关联的事项。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各学科、各行业之间,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是封闭式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事物,如专业科研、专业教育、商办工业、校办工厂,同时成为若干产业、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交叉问题。如果强行分离,有些专业、事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也无法反映因果关系和事物的兴衰起伏。当然,与本专业(行业、事业)有关联的事项也不是都记载,都记载的话,会无限制的增大篇幅,造成过多的交叉重复。至于何种事项记载,何种事项不记载,关键要看其因果联系的紧密程度,只有因果联系异常紧密的,不写不足以说明事业发展的,才记载,而且应从与事业发展相关联的角度去记载。对于一般性的,次要的,与专业发展无决定性作用的联系,则不予记载。譬如说一些共性的东西,工会、党团、宣传等,宜集中到工会志、中国共产党志、社团志等统一记述,其它各专业分志均不应予以记载。因为这些共性内容从各个专业分志中分离出来,并不影响各专业分志的完整性、科学性;反之,如果放进各个专业分志,反而会使专业分志内容庞杂,并且造成重复而非交叉,影响志书的科学性。

省志是分卷出版的,分志中是否可以设置序、凡例、总述、大事记、人物传、附录呢?这个问题关系到省志的整体性,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序、凡例、人物传应由省志统一记述,各分志不再赘述,但分志中可以设概述、大事记、附录。一般分志可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和编后记组成。序言、凡例是独立志书的体裁,由省志统一记述,分志不记(分志前可附省志统一的序、凡例),这样做可彰显出省志一套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部书,各分志是一部省志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概述和大事记这两种体裁之所以在志书中运用,其本意是为了加强志书的整体性,起到纵揽全志的作用。我们知道方志是“志体横剖”、“横排竖写”的,横剖有利于载纳众多资料,但不足之处是条分缕析,带来因果不彰,就好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必须增加志书综合性的内容,加强志书的整体性,于是就有了概述和大事记这两种体裁。所以从理论上说,不论是整部省志还是各专业分志,都应该设置概述和大事记。省志可设总述,分志可设概述。一般来说,分志的概述应包括本专业历史发展脉络,本专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优势和劣势,经验和教训,以及特点和发展趋势等。大事记亦然。省志大事记所选大事都是有关全省的大事要事,其涉及面全,影响深远,层次较高,其侧重点往往集中于政治、经济、自然等大部类;分志大事记只记行业或事业的大事,其面涉局部,层次较低,侧重点不是很明显。一般来说,列入省志大事记的大事,都可作为部门大事列入分志大事记,但分志大事记中所列大事,大部分无法见于省志大事记,且省志大事记中的大事,也并非各有所属,可以分别并入相关的分志大事记中。因此省志大事记与分志大事记虽偶有重复,但对大部分分志来讲其重复面是极为有限的,并不影响全志的整体性,写好了还是全志大事记的有益补充和延伸。附录对于志书的编写是不可缺少的,它能容纳正文无法消化的资料。整部省志可设附录卷,但同时也应允许各分志设置附录,因为省志包含的部门和行业太多,无法统一收录标准,无法满足方方面面的需要,允许各分志设置附录,不会影响省志的整体性,还会使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致遗失。省志的附录卷可以容纳各分志无法容纳的资料。至于人物传,因省志有专门的人物卷,分志一般不设人物传或人物篇,如果各分志设立人物传或人物篇,不仅容易和省志人物卷重复,且标准也难以把握,容易出现认识和记述的差异,必然影响全志的总体性。但分志可以用以事系人的办法记载人物,写各行各业人的活动,展现人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其次,要处理好志书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交

叉和重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交叉是指同一事物以不同方式在多个地方出现,志书记述中处理好交叉内容,以体现事物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联系,是行文的一种艺术。回避交叉,则会造成记载的疏漏。重复是指相同的事物反复出现,反映在志书中,则是在记述同一事物时完全以相同的方式(包括资料的选取、整合、记述的角度、行文风格等)在多个地方重复出现,是行文的失误。交叉问题若处理得不恰当,就会造成重复,影响志书的质量。正如杨泽澜同志所言:“‘交叉就是重复’或‘交叉必有重复’的断言,简单地把交叉上那么一点局部的、短暂的小重合视为重复,是认识论上的偏颇。而‘交叉易于重复’的认识则较为中允。倘若在选材角度与着笔力度上把握不好,就会滑向重复的泥沼。这是因为角度有大小,位置有高低,笔墨有浓淡,线条有粗细。撰者好比摄影师,选择不同方位,调整长短焦距,对同一事物摄下一张张不同画面的照片……只有把握好选材角度和着笔力度,才能收到交叉自展、重复自免之效”^①。一部志书,尤其是像省志这样的庞大工程,其内容丰富而且复杂,要记述的事物之间,彼此不可能互不联系,且当今社会各个学科相互渗透,互相联系,无论如何在省志的记述中都不可能做到单独记述某一专业、某一事物。即便是小篇平行分卷体也不能“一刀切”,完全独立记述事物,交叉重复在所难免。交叉分“志内交叉”和“志外交叉”,因为本文旨在论述省志编纂,所以主要分析如何避免“志外交叉”(即分志之间的交叉)。

笔者认为,省志编纂中处理志外内容交叉的办法有:第一,加强总纂,事先作尽可能细的通盘考虑。省志各分志的编纂、定稿和出版时间不一致,有的分志早已出版,有的分志还尚未起步,前后相差八九年不为奇,这就给资料交叉运用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为省志总纂者来说,要尽可能细的通盘考虑各分志可能出现哪些资料运用的交叉点,事先从专业分志篇目中理出来,做到心中有数,并一一加以解决,如河流、水库、山脉等涉及地理、农业、林业、水产、交通、电力等志,需要在撰稿前,召集有关分志

撰稿人员采取会商的办法,亮出各自的资料,核实校正,谁详谁略,分别列出各自的记述范围和要求,这样可以避免资料矛盾,数据不实,多处打架或互争资料的现象。在总体设计上,应坚持事以类从,分清主次,详主略次,妥善处理各个分志的记述主体。凡属某分志主要记述的内容,其他分志一般不再专设章、节记述,行文中可适当反映,以体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些内容实在难处理的,可采用“参见”的办法,以减少同一条资料多处重见。第二,凡属不可避免的交叉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记载,但要注意口径一致。如自然资源,地理志可全面记述,农业志作为农业发展的条件,可记述土地资源,水利志可记述水文资源,林业志可记述森林资源等。总的原则是,各分志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去记该事项与本专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方面,突出本专业的特点,不作超越范围的全面记述。第三,涉及与专业发展有直接联系的交叉内容,如科研、教育,既要集中,又要有分散,详略互见。第四,涉及普遍性的交叉内容,宜集中到某一专业分志记述,如党团组织、政治运动、人物等,可以集中到政党群团志、大事记、人物志中记载。集中记述,各自载述完整,也避免了交叉。第五,因归属易换而造成的交叉内容,应当在现行的主管部门所撰写的专业分志中记述,其它有关分志只在追溯历史时作适度记载。第六,某一事物分别隶属两个以上部门,原则上是谁管谁写,各自写各自所管辖部分的内容,详写主体部分,略写从属部分。

再次,省志各分志要统一语言风格、行文规范和版式设计。方志指导部门在总纂时要严格把关,对各部门、单位撰写的分志要统一审定,统一全志的语言风格,力求文风划一。行文规范化,是志书科学性的要求之一。尽管各分志初稿撰写前,方志指导部门一般事先都会印发统一的行文规范要求,但即便如此,最后写成的初稿往往是五花八门,这在目前方志编纂中是个普遍现象。因此要求方志指导部门在审定分志稿时必须严格把关,认真修改,一丝不苟,不能对各部门编纂的分志稿放任自流。志书的版式也是志书科学性、整体性的一个重要部分。省志不同于县志,它是分卷出版的,

全志完成时间较长,这样对版式的要求就更需要严格一点。无论内文字体、格式、编排,还是封面设计(包括颜色)、书脊、扉页以及志名位置、署名等等,都必须符合规范,整齐划一。尽管有的分志不在一个出版社或印刷厂出版印刷,但也要求版式的统一。鉴于目前省志编纂采用小篇平列分卷体,分卷出版,会造成书脊无编号,可考虑在印制时先不编卷号,先行发行,留下光盘,待全部省志编纂完成后,再编卷号增印,也可以考虑采取印刷手段烫到书脊上的办法。

时下,二轮续志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省志编修是其中重中之重。正确认识首轮省志编修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吸取前志的经验教训,完善省志编纂模式,尤其是处理好志书总体设计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对于二轮省志的续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对修好二轮省志有所裨益。

注释:

①[清]徐时作修,胡淦等纂:《(乾隆)沧州志》,凡例,清乾隆八年刻本。

②梁启超:《说方志》,《饮冰室合集》(5),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第94页。

③④梅森:《省志总目权衡谈》,《史志文萃》1992年第3期。

⑤王宜斌主编:《实用续志编纂100问》,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2004年12月编印,第23页。

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方志编修教程》,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6页。

⑦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81页。

⑧欧阳发:《总体设计至关重要》,《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⑨转引自李天程:《正确处理省志中的交叉重复》,《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1期。

(李琳琳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沈松平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

薛方昱

公元前 688 年,秦国出兵渭水上游,伐邽、冀戎,在其地始置邽、冀二县。《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代邽、冀戎,初县之。

邽,即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冀,即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邽、冀二县的设置,为我国置县之始。它比当时的楚国于公元前 598 年“楚子县城”早 90 年,也比晋国在公元前 514 年“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早 174 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早 477 年。故邽、冀二县,并列堪称天下第一县。今考证如下:

邽 县

邽县,有上邽、下邽之分。秦代初期,秦始皇为充实关中,将原居今天水市邽县的部分居民,迁至今陕西省渭南市北的下邽镇,仍沿用邽县之旧名。到了西汉,为了使同名的两县有所区别,将地处渭水上游的今天水市原邽县称上邽,而将后置的地处渭水下游的今渭南邽县称下邽。本文要论述的是邽县原处地的上邽。

一、邽字音义。

邽,秦、汉古音读 guī (龟),宋代以后读 jī (鸡)。

邽字的最初象形文字为“且”,后演变为“圭”,因地处邽山脚下,后来加“卩”旁,成为秦汉以来通用的“邽”字。邽字的造型本为男性生殖器,与“祖”字略同。距此地不远的秦安县大地湾出土的陶祖,证实了上古时居住在这里的羌戎族先民,从母系

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也与传说的华夏民族始祖,生于成纪(今天水市秦安县)的伏羲氏“制嫁娶,以俚皮为礼”的上古婚俗制度相吻合。

二、上邽建置的演变。

邽,上古属成纪之域。夏、商为羌人之地。西周为邽戎方国。春秋秦武公十年(前 688 年),秦伐邽戎,始置邽县,属秦国。战国时秦昭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始置陇西、北地、上郡,邽县属陇西郡。秦、汉因之,西汉改邽县为上邽县。东汉至魏晋仍为上邽,属天水郡,后改为汉阳郡。晋太康七年(267 年),秦州并天水郡治自冀城(今甘谷县)移至上邽城。南北朝至隋唐因之。唐开元二十二年,因地震,秦州及天水郡治迁往成纪县之敬亲川治(今秦安县郭嘉镇),唐天宝元年,州、郡复还治上邽。唐大中三年,秦州、天水郡治复迁至成纪,上邽降县为镇,地属成纪。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清水县治迁至上邽城,其地属清水。北宋治平年间,清水县治迁回清水故城,秦州、天水郡及成纪县治均迁来上邽城。从此上邽城一名被秦州和成纪城取而代之。明洪武二年,废成纪县,其地属秦州直辖。清代因之。民国二年,改秦州为陇南道(后改渭川道、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置天水县,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之后。以上为上邽故地建置演变之大概情况。上邽一名从春秋秦武公十年(前 688 年)建县(含镇)至北宋治平年间(1061~1065 年),历时约 1749 年之久。

三、上邽故城的地理位置。

关于上邽故城的具体位置,学术界、方志界多有争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四说:一是秦州故城(今天水市秦城区)说;二是清水说;三是今天水市北道区驻地及所属的马跑泉、东柯河一带说;四是今秦城区西南九十华里的天水乡(俗称水天水)说。笔者经反复研究文献,察其山川位置、地形,认为天水市秦州故城说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其据是:

1.从邽山位置看,上邽地处邽山脚下,这是肯定无疑的。那么邽山在今何处呢?《水经注·渭水》引用《山海经》说:“邽山濠水所出”。濠水,即今罗玉河,发源于今天水市秦城西北20公里的凤凰山南侧。这就是说,邽山位于今天水市秦城的西北,其主峰是今海拔1895米的凤凰山。又从《太平寰宇记》卷150秦州大潭县条下记:“废伏羌县,本周冀戎之地,……邽山在县东南,落门水在今县西”。文中所言秦汉冀县,唐代伏羌县,即今天水市属的甘谷县。从“邽山在县东南”的方位记载来看,邽山的主峰是今凤凰山,从而说明上邽故城在今天水市秦城区,而不可能在其它之地。

2.从上邽县辖域看其故城位置。从《水经注·渭水》以及籍水的记载看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邽县辖域即今天水市三阳川及其以南,籍口以东,籍水入渭处以西之地(南界文献无记载,待考)。东与绵诸县地相接,西与冀县地为邻。作为县治的上邽城,当然只能在县域管辖之内,而不可能越其境另置他处(引文此略,见后述)

3.从籍水流域诸水位置来看上邽故城的具体方位。《水经注·渭水》关于籍水的记载是:

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籍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东历当亭川,即当亭县治也,左则当亭水,又则曾席水注之,又东与大弁川水合,……。籍水又东南流与竹岑水合。水出南山竹岑,二源同泻,东北入籍水。籍水又东北径上邽县,左佩四水:东会占溪水,次东有大鲁谷水,次东得小鲁谷水,次东有杨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籍水。籍水右带四水,竹岭东得乱石溪水,次东得木门谷水,次东得罗城溪水,次东得山谷水,皆导源南山,北流入籍水。籍水又东黄瓜水注之。其水发

源黄瓜西谷,东流径黄瓜县北……。黄瓜水又东北历赤谷,咸归于籍。籍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径上邽城南,得核泉水,并出南山,北流注于籍。籍水即洋水也。北有濠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归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又改为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濠水又南注籍水。山海经曰:邽山,濠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谓是水也。籍水又东得阳谷水,又得宕谷水,并自南山北流于籍。籍山又东合段谷溪水,水出西南马门溪,东北流合籍水,籍水又东入于渭。

为了节省文字,现将籍水及主要支流摘要今注如下:籍水源于今甘谷县与礼县交界处的瘦驴岭,明清之时叫固城岭。籍水东北流经的当亭,即今天水市秦城区关子镇,当地曾出土石碑一块,上刻“当亭”两个大字可佐证。竹岭,即今天水市秦城区秦岭乡一带,该地今有竹林村,可见古时因产竹而得名。竹岭水,即今源于铁炉乡西山,于籍口汇入籍何的金家河。大鲁谷水,即今源于寥家观,东南流于川口入籍河的年集沟。木门谷水,即今源于谢家岭,北流于三十甸子入籍水的庞家沟。罗成溪水,即今源于何家庙,北流于二十里铺汇入籍水的卫家沟。山谷水,即今源于浮陀子,北流于窝陀里东侧汇入籍水的平峪沟。黄瓜水,两汉魏晋叫赤谷水,西魏曾在该河流域的今秦城区店镇置黄瓜县,水随县名而改为黄瓜水,今俗称南沟河。毛泉谷水,即今秦城南的吕二沟。核泉水,即今秦城南的龙王沟。濠水,即今罗玉河,前已述。阳谷水,即今秦城区东十里铺西侧的水家沟。宕谷水,即今源于南山,北流于东二十里铺西侧入籍水的罗家沟。段谷水,即今源于麦积山,流经甘泉于跑马泉汇入渭水的永川河。《水经注·渭水》记载段谷水入籍而不入渭有误。

从以上籍水及其支流的古今注中看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邽故城在今罗玉河与籍水汇合处的东侧,即明代所筑的大城和东关城一带。

4.从文物古迹来看上邽故城的位置。

据天水市博物馆馆长张惠英女士提供的资料:1986年修建天水宾馆挖地基时,发现一舍利地宫,内有陶碑一方,上书:

迎佛舍利,葬于邽川之地,护佑黎民……。

唐天宝六年

比丘·海印·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39上邽县下记载:

司马宣王垒,俗名上募城,在县东二里。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拒之,此其垒也。

诸葛亮垒,俗名下募城,在县东二里。初,亮出,议者或欲自芟上邽左右麦以夺贼食,帝不从,又束力令护麦。及宣王与亮相持,赖自麦以为军粮。

羌维垒,在县北八里。

出土舍利地宫陶碑的天水宾馆,地处秦汉魏晋隋唐时期上邽故城的东南城郊,故云“邽川”。文中所言“县东二里”、“县北八里”,依《元和郡县图志》编写体例,是指县城东二里,县城北八里。与《水经注》记述体例有别。

上述出土的唐代舍利地宫陶碑和《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三国时魏蜀争夺上邽之战中留下的营垒遗迹,是真实可信的,绝非后来人伪造,从而证实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上邽故城确实在今天天水市秦城区,即秦州旧城为上邽故城。

四、上邽和秦州故城的演变。

上邽与秦州故城,从春秋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置县时起至今,历时27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邽故城历经沧桑,几经战乱毁坏,又几度重建,永远屹立于邽山脚下,藉水河畔,始终座落于一地,代代延续,没有大的变迁,这在中国的古城是少有的。但在城市规模布局上却有小的变动。现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分叙于下:

1.春秋至隋唐的上邽故城,在改道前的罗玉河以东,藉水以北,即明代所筑的大城和东关城一带。该城春秋时可能只有一城,两汉、魏晋时,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为五城相连。其五城的布局大概是中城、北城、东关城、西关城、南关城。

2.宋、元、明、清秦州城。北宋治平年间,秦州、天水郡及成纪县治均从今秦安县的郭嘉镇迁至上邽故城,后来上邽故城毁于宋、金之战。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吴玠、吴玠率军收复秦州后,在罗玉河改道前的西岸,藉水之北,先后筑新城二座,即今小西关城(又名伏羲城)和西关城。明洪武五年(1372年),在罗玉河改道前的东边,即在上邽城故址,先筑大城,后筑东关城和中城,以前的宋城便成了西关城和小西关城,形成东西横向排列的五城,罗玉河仍从宋城和明城之间穿流而过。到了清代,由于罗玉河流域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罗玉河数次泛滥,威胁州城。清乾隆五年(1735年),知州程材傅下令将原由北向西再向南穿过州城中心的罗玉河,改从城外向东至东稍门外再向南,汇入藉水河,形成现在罗玉河的走向。

五、上邽与清水等地的关系。

清水,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一直是秦国的邑地,史称秦亭,是秦国的发祥之地。而秦国在当时是不会在其直接管辖地域之内置县的,而只能在新辟之边地置县设郡。如征服义渠国后置义渠县,征服邽戎、冀戎、豳戎后,置邽县、冀县、豳道县。

西汉始置清水县后,县名沿续至今,未有大的变动。但在历史上与上邽有过几次联系:一是东汉省清水县,其地一部分归上邽县辖;二是唐初在清水县城曾置邽州,历时二年;三是五代至北宋前期,清水县治曾迁至上邽城。据《太平寰宇记》卷150秦州清水县条下记:

唐武德四年,置邽州于清水,六年废邽州,以县来属。……后唐长兴元年,移治于上邽镇,即今理所也。废上邽旧县,旧十六乡,本邽戎地,秦伐邽戎而置县,天宝末陷于吐蕃,大中初复收为镇,今为清水县理所。

由于清水和上邽历史上有过三次建置演变的联系,明清二代撰写《清水县志》时,未察其详,误将上邽记在清水,致使今人产生误解。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古代文献,就会得出上邽之地的建置虽有演变,但上邽故城一直在今天天水市秦城区,从未迁徙他处,只是宋代以后,被秦州城取而代之罢了。

今北道、马跑泉、东柯河一带,春秋战国时属

绵诸戎国之地。西汉置绵诸道,并在今渭水以南之地安置罕开羌,置罕开县(县治大致在今渭水南岸的东柯河一带)。东汉省绵诸、罕开二县,其地并入上邽。三国魏在今北道区社棠一带置临渭县,属广魏郡。西晋仍属临渭县,广魏郡则改名略阳郡。十六国时因之。北魏时复置绵诸县。西魏省绵诸县,其他并入上封(邽)。隋代在今北道区伯阳一带置秦岑县,唐废,其地复并入上邽县。五代至宋初为清水县辖地,宋代治平年间,秦州,天水郡及成纪县治迁回上邽故城,其地属复置之陇城县(县治在今马跑泉附近),金人废陇城县,地属成纪。明初,废成纪县,其地直属秦州辖,清代因之。民国二年(1913年)设置天水县,其地归天水县所辖,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从上述今北道、东柯河一带历史建置归属的演变中看出,这里与上邽县时分时合,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能说这里曾是上邽县辖地,但这并不等于上邽故城就在今北道、马跑泉、东柯河一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道区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时期木板地图,是研究天水市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一些同志据此认为春秋战国时的上邽故城在今北道或马跑泉一带。笔者认为此说仍需商榷:一是该地图分划在数块木板上,拼凑的是否符合它的原貌,二是据已故著名地理学家、兰州大学教授冯绳武先生说:古代地图在方位上座北向南,与现代地图的座南向北恰巧相反。如照此说,这一战国时期的木板地图,可否证实春秋战国时的上邽故城就在今天水市秦城区呢?

关于今天水市秦城区西南的天水乡,俗称小天水,秦汉属西县之地。五代后唐长兴三年置天水县,属秦州天水郡,北宋因之。南宋改县为军,属利州西路。元代地属成纪县(县治今天水市秦城)。明初废成纪县,其地直属秦州辖。民国时地属天水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尽管曾属秦州天水郡,又与民国二年设置的天水县同名,且属天水县辖地,但与上邽故城无涉。故认为上邽故城在今秦城区天水乡之说,实难成立。

还有人认为,上邽故城在今天水市西 50 华里的藉口。《水经注·渭水》明言,藉口为上邽县地,而

非上邽县城,请看前面《水经注》引文,一目了然,此不赘述。

冀 县

冀,本族名。在象形文字上是一个人翩翩起舞的造型。商周时为冀戎方国。建县于公元前 688 年的春秋之时,即秦武公“十年,灭邽、冀戎,初县之”。与邽县并列为我国最早所置两县之一。

冀县一名从春秋置县一直沿续到西晋末年。期间,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天水郡治由平襄今通渭县城迁来冀县城,东汉建宁元年(68年),凉州治所从陇县(今张家川县城)迁冀,三国黄初元年(22年),凉州治所迁至姑臧(今武威)。西晋泰始五年(264年),始置秦州,州治冀城。晋太康七年(268年),秦州并天水郡治自冀城迁至上邽。永嘉元年,战乱频仍,冀县废。北魏真君八年(447年),在县城南面的党亭川设置当亭县(县治即今天水市秦城区关子镇)西魏因之。北周当亭县并于黄瓜县(县治今秦城区南之店镇)。隋改黄瓜县为冀城县,并移县治于原冀城故址。唐改冀县为伏羌县,唐代后期至五代为吐蕃占据。北宋收复后设伏羌寨,后升为伏羌城,属成纪县辖。金人占据期间,仍为伏羌城,属秦安县辖。金曾在甘谷县北的杨家城子(地处大庄乡散渡河与襄南河交汇之处)设置甘谷县,元废,其地划入通渭县。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复置伏羌县,属巩昌路。明代仍为伏羌县,属巩昌府,清代因之。民国时伏羌县划归天水陇南道。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伏羌县为甘谷县,沿袭金置甘谷县之旧名。

本文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古代冀城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看法是:古冀城在今甘谷县城东。笔者经反复考证,认为古冀城在今甘谷县西约 3 公里的天马山下、渭水之南、何家沟(俗称大沙沟)西岸之地(今属五里铺村)。其据主要是:

一、从《水经注·渭水》诸水今注看冀城位置。

该书云:渭水至黑水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径平襄县故城南,其水东南流历三堆南,又东流南屈历黄槐川,

梗津渠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次则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长塹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其水北径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渭水又东合冀水，水出冀谷。次东有浊谷水，次东有当理溪水，次东有托里溪水，吹东有渠谷水，次东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径冀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出岑峡，入新阳川。

《水经注·渭水》记载，今甘谷从黑水峡（俗称上峡）至岑峡（俗称下峡或东峡），南北 11 水注之，其中北有 2 水，南有 9 水。今考注如下：

温谷水——即今从通渭（汉代平襄县）流来的散渡河。

牛谷水——即今源于甘谷金山乡牛蹄湾，南流经谢家川子的田家沟水。

长塹谷水——即今源于甘谷城县武家河乡石庙咀山，北流于甘谷西二十里铺西侧汇入渭河的二十铺沟水（又名王家沟）。

安蒲溪水——即今源于甘谷县古坡乡北山，于马务寺入渭水的马务沟。

衣谷水——即今源于狄家山，流经甘谷县十里铺西侧入渭水的海子沟。

冀水——即今源于甘谷县白家湾乡斜坡山北，流经天马山东侧、大像山西侧的何家沟，又名大沙沟。

浊谷水——发源于甘谷南三十里铺梁，北流经甘谷县城西侧的小沙沟。

当里溪水——即今源于廉家庄梁，北流于六峰乡（蒋家寺）西侧入渭水的赵家沟。

渠谷水——即今源于甘谷县刘家山，北流于皇觉寺西侧汇入渭水的黄家沟。

黄土川水，即今源于天水市秦城区关子乡东梁，北流于北道区琥珀乡罗家川入渭水的霍家沟。

二、从大像山看古冀城、伏羌城的位置。

《太平寰宇记》卷 150 秦州大潭县条下记：

废伏羌县，本周冀戎之地，秦伐冀戎而置县焉。汉书地理志云：冀县属天水郡。西晋太始元年分雍州、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七郡，立为秦州于冀县是。后魏移

于上邽，改此为当亭县，隋大业二年改当亭县冀城县。唐武德初立为伏州，仍于伏羌城置伏羌县，八年罢伏州，以伏羌县来属。天宝元年，复陷吐蕃，皇朝建隆三年，秦州上言吐蕃尚波于等进纳伏羌县地，因以旧城置寨。……，邽山在县东南，落门谷水在今县西。……，大像山在废县东一里，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丈，有阁道可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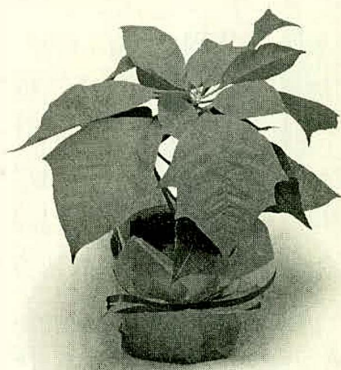
《元和郡县图志》卷 39 记：

伏羌县，中。东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冀戎地，秦伐冀戎而置县焉。……渭水经县北，去县一里。县城，本秦冀县也，隗嚣称西伯都此……。

唐伏羌县城，即为秦汉冀县城，“大像山在废县东一里”，依《太平寰宇记》的记述体例，是指废县城东一里，从而证明秦汉魏晋时的冀县城和唐代伏羌县城，均在今甘谷大像山西一华里、渭水南一华里处的今天马山下，古冀水（今何家沟，又名大沙沟）西岸之地（今五里铺村属地）。

北宋建隆三年（另说二年），宋军收复唐伏羌县地后，于伏羌旧城置伏羌寨，不久，在今甘谷县城南关筑伏羌寨新城。原秦汉冀城、唐伏羌城旋废。北宋熙宁三年，伏羌寨改为伏羌城。明代景泰元年，在宋代伏羌城基础上向北扩筑新城，宋城后废。明城经清代修复，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今存南城墙、西城墙及南门、西门，北城墙和东城墙因城市扩建而被拆除。

（原载《西北史地》1998 年第 1 期，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在张掖市甘州城区西北 12.5 公里处的明永乡,有一片沙窝中残存着二座神秘的古城遗址,人们称为黑水国遗址,它的得名、历史、兴衰、考古活动都存在着众多谜团,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文人墨客前来探幽思古,吸引着众多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前来考察研究。

黑水国是怎么得名的,众说不一,尚无定论。主要流行三种说法:一是黑水国因当地方言转变而得名。“黑水国”这个名称出现于清代。很久以前,黑水国古城处在黑河的一个大河滩上,这里地势低洼,许多地方都有积水。当地老百姓将这一带称为“黑水窝”“黑水锅”“黑水洼”,时间长了,以讹传讹,人们就将这里称之为“黑水国”。二是黑水国因黑河而得名。黑河从黑水国旁流过,黑水国因黑河而盛衰。黑河发源于祁连山,发洪时挟带黑沙滚滚而来。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黑水国一带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后来湖泊逐渐干涸成为水草丰美的平川,月氏民族迁徙到这里,驻守并屯田修城,建都立国。因傍依黑河,故得名黑水国。三是黑水国因“黑匈”而得名。传说中的黑水国是匈奴人修建的城市,强大的匈奴部落在这里放牧生活,建立了国家,因为匈奴人皮肤黑,外族人将他们称作“黑匈”“黑奴”,后来人们把他们的这个国家称之为“黑水国”。

黑水国遗址距今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是集汉唐古城、史前遗址、古寺院遗址、古屯庄、古墓葬为一体的庞大的甘州“历史古籍”,也是集古代人文风光、沙丘、湖泊、芦荡、湿地为一体的河西“特色画册”,在考古界有“河西文物宝地”之称,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北长 15 公里,东西长 10 公里。

黑水国古城遗址又称黑水锅城堡,俗称黑水国或老甘州,民间亦称甘州老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分为南、北两城,相距约 3 公里。北城在国道 312 线以北 2 公里处的明永乡下崖村,始筑于匈奴占河西之时,汉沿用并为张掖郡。唐代、元代和明代,均在北城置驿站。城址呈平面长方形,城垣用黄土夯筑,南垣正中辟门,无瓮城。城垣西南角筑有覆斗形角墩,部分城垣坍塌或被流沙埋没,城

神秘黑水国

黄杰

堡几乎已被流沙埋没,城西南分布大片汉墓群。南城位于距国道 312 线南 1 公里处的明永乡下崖村,始筑于唐代,宋、元、明沿用。南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垣用黄土夯筑,部分被风沙湮没,城垣部分墙体用土坯砌筑,流沙堆积与北墙等高。东面正中开门,并加筑瓮城,瓮垣以子母断砖砌成,门宽 7 米,是典型的古代军事防御工事。墙四角上筑有覆斗形角墩,墩内穿插有柵木,角墩长、宽各约 7 米,东北角墩最高,为三层建筑,台上四边建有围墙,似为角楼,约 13 米,可容一二十人自由活动,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城池内街衢巷道、建筑布局依稀可见,现存城墙多为明代所筑,城内建筑遗址密集,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在国道以南分布有 4 处汉代建筑遗址,其中在面粉厂农场东侧的大型汉代建筑遗址的北段,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汉代绳纹瓦堆,这处汉代建筑遗址规模之大,汉瓦堆积之多,在河西绝无仅有,有可能是汉代张掖郡的所在地。

在黑水国区域内还依城建有 7 处古屯庄遗址,现仅存一处位于南城的北郊,墙体残存,是明代建筑遗址。

在黑水国区域内分布有密集的古墓葬群,据推算,在黑水国区域及周边的古墓葬不少于 1 万座,主要为东汉至魏晋墓,为砖室墓。汉砖有铺地砖、画像砖、条砖、榫卯、楔形砖等。发现的永元十四年记事砖、四灵神兽画像砖、驱驴急行画像砖尤为珍贵,曾出土有彩陶罐、陶仓、陶井、陶灯、陶炉

等陶器。由于古墓葬群较多,就连黑水国南城也建在了魏晋古墓葬群上。

在黑水国区域还有一座并非普通的古代寺院遗址,据考证,从西夏占据河西之际,这座寺院已经兴盛,当时香火异常旺盛,建筑殿堂豪华,僧侣众多。

黑水国区域的史前文化遗址,是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它在我国史前考古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使黑水国区域的历史推进到了4000年以前。早在20世纪40年代,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黑水国区域发现有马厂式陶片。目前发现的黑水国史前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遗址上有密集的动物骨骼、残碎陶片、较多的石器和加工玉器的原材料,是目前已知河西走廊中部最早、最大的原始部落居住地,是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黑水国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据考,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有一个庞大的原始部落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以黑水国区域作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区和部落首领的统治中心,社会经济杂以农业、畜牧业和渔猎为生,他们已经能打造出各类精致的玉石器,他们用绿松石加工成装饰品,供贵族妇女佩带,这个部落是“玉石之路”的最早使者之一。后来,随着宝石的交流,冶铜制铜业也相继传入,他们从孔雀石中炼出铜块,再制成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黑水国的原始部落以大角羊神为图腾崇拜对象,角形鬃和乳状突丁被广泛装饰在陶质容器之上,他们还发明了喝牛奶羊奶的笠形杯。为了放置稳固,他们又将杯底制成圈足,这种杯就是碗的雏形。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产活动的不断加剧,这里的生态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沙化日益严重,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月氏人的聚牧之地。大约在距今约3900年以后,月氏族迁徙到沿祁连山一带的宽阔草原上,这里沦为绿洲中的沙漠。经历了一千多年以后,黑水国恢复了茂盛的植被,月氏族又走入了黑水国。相传,西汉以前匈奴移居这里,划疆为小月氏国国都。他们在黑水国西边的昭

武一带确立了政治中心,国都就建在这里。匈奴击败月氏以后,控制河西,黑水国区域属匈奴獫狁王的领地。匈奴将昭武城设为对外贸易区,由昭武经营,在当时的黑河西岸新筑一城,作为浑邪王属下的獫狁王的王城,故名獫狁城,獫狁城先后由獫狁王和浑邪王所居,管领黑河以西地域。另在今民乐县永固城把月氏城改为单于城,供老上单于及其次子右贤王巡幸或避暑时居住,当时祁连山麓和弱水流域成为匈奴的广阔牧场,大量繁息牛羊。在合黎山中生长着适宜制做弓矢、车辆、穹庐的木材,一种鸬鹚的翅羽可制做箭羽,因而成为匈奴的兵工厂,獫狁城是其冶铁、制革和兵器制做的中心。由于单于城在东,獫狁城在西,因而,獫狁城又称西城。西汉元鼎二年(前115年),河西首置酒泉郡,郡治獫狁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河西四郡,张掖郡治獫狁,即黑水国。由此,黑水国成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中部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随之,汉朝移民又进行了一场空前浩大的大规模的开发,远远超出了这里生态资源的承受能力,生态环境随之遭到破坏。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河西各郡地域大调整,酒泉郡治由獫狁移驻今肃州区的福禄县,张掖郡治由今凉州区张义堡移驻今甘州区的獫狁县。

在汉代的张掖,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这就为后来张掖经济和文化发展夯实了基础。到了东汉晚期,黑水国受沙浪的袭击,逐渐沦为荒漠区和墓葬区,被人类遗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獫狁城在战乱中逐渐荒芜,以致于被废弃,由原县治之地降为城防之所,为求兵防巩固、屯粮安全,西晋前后在其城南另行筑城,即今黑水国遗址南城。经400年的自然恢复,黑水国又一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隋朝将獫狁城改为粮仓,叫巩固亭。唐代在这里设立了著名的驿站叫巩固驿,意思是固若粮囤,可维济丝路商旅。宋代时仍为重要的兵防据点。西夏以后,开发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模宏大的寺院也香火旺盛。在元代,因设甘肃省省会于甘州,巩固驿因在其城西而被改为西城驿,是西去肃州的第一站。到了明代改置小沙河驿,并建常乐堡。唐代巩固

驿,元代西城驿,明代小沙河驿当置南城,是传递政务情报的中转站,历来是张掖的西北重要门户。明代晚期,巨大的沙尘暴将人们赶出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城池、村落、田地全被沙丘重重地掩埋,黑水国沦为了无人区。

为了考证、探寻黑水国的秘密,近百年来,无数考古学家、文史专家多次实地考察,一些盗墓者也慕名乘虚而入,对这座神秘的古城进行了多次探访。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此探险,探险队曾到这里发掘考察,获得极其珍贵的宋代《刘知远诸宫调》残本42页和其它文物,引起中外学者的注目。

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马可·波罗游记》为指南,第三次进入中国西北探险,一月到达敦煌,三月悄悄折回黑水国遗址,进行了一番挖掘,没有什么收获,复返回酒泉,沿额济纳河北上到达黑城遗址掘得大量文物。

1938年,国民党马步芳部队旅长韩起功占据张掖,因黑水国地下有“金月亮”的传说,韩起功师7000余人,他打着修筑公路的旗号,派兵大肆开挖这里的古迹,掘开无数古墓,获陶器数卡车,大肆掠夺,获取不少文物,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并以古墓青砖铺砌公路30余公里。现在的南城中的砖块就是韩起功部队挖掘城下古墓群所致。

在解放前,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中原灶具和一

些人类遗骸,这里曾经出土的古人的遗骸,他们的胫骨都很长,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长人骨”。有人猜测,这是一支来自欧洲的部落。究竟是不是来自欧洲的部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怎样来到这里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时至今日,这个关于“长人骨”的谜团仍没人能解开。1941年9月,国民党元老、诗人于佑任先生同考古学家卫聚贤等人赴莫高窟和黑水国遗址考察,于佑任先生留诗一首:“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中原灶具长人骨,大吉铭文草隶砖。”此诗传开,引起了国内考古界对黑水国遗址的关注。

1956年,国家地质勘察队勘察后,曾认定遗址下有一座地下古城。1992年,甘肃省政府投资,省地质矿务局物探队对黑水国区域用现代电磁波仪器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想发掘出一座地下古城来。在南城发现一处疑点,认定有地下洞窟,挖掘至1.4米深处,是一个魏晋古墓,再深挖为原生沙土层。而勘探者认为13米以下有巨洞,结果挖到11米深处无法施工,被迫停止。

无数专家、学者都想解开黑水国这个不解之谜,在历史典籍上,始终没有找到“黑水国”一说,这一地名一直是民间的说法,就是完成于清乾隆四十年的《甘州府志》也对黑水国只字未提,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谜。

(作者单位:张掖市甘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继承与创新并重 修志与用志结合

陈希圣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相续,经久不衰,由此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曾把搜集和研究地方志作为了解中国国情和地情的重要途径提出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方志事业迎来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地方志成果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重要再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是传承文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就张掖市地方志而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市已出版了一大批市、县级志书和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等多种史志资料,在传承历史,资政育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张掖地方志运用的现状与特点

多年来,在中共张掖市委、张掖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于各县区、各部门党政领导重视,社会各界积极支持配合,全市地方志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史志编纂硕果累累。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地方志工作的支持力度,认真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修志工作提供了有力地组织保证和良好的人力物质条件,全市修志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县区修志机构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与时俱进,真抓实干,开拓创新,不断拓宽工作领域,逐步形成了“以编纂志书为主体,编辑年鉴、编写地情资料、整理旧志和史志信息化建设并举”的工作格局,地方志工作已经由单一的编纂市、县区两级志书发展成为“志为主体,

史志、年鉴、地情资料多元一体”的文化建设形态,全市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情、地情资料体系。同时,地方志工作通过直接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使张掖的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得到提升,地方志工作在服务群众、服务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当前,全市地方史志工作具有实、新、亮、广几个特点:

一是首轮修志全面完成,二轮修志基础实。截至目前,全市方志部门共编纂出版县市志6部,地区志1部,行业志51部,部门志23部,乡镇志16部,村志12部,整理校点出版民国以前的旧方志共9部。志书出版后,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入编纂年鉴、出版地情丛书,为二轮修志打好资料基础。市县(区)已编纂出版年鉴22部,编写地情丛书9部,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协编30多部相关书籍。在全省第六次、第七次优秀史志评奖中,《张掖综合年鉴(1996-2003)》、《张掖综合年鉴(2004-2005)》荣获年鉴类一等奖,《金张掖史话》获文史类一等奖,《张掖概览》获二等奖,《甘州府志校注》获旧志类一等奖,《高台县志辑校》获二等奖。同时,还有多部部门志、乡镇村志及县(区)年鉴获奖。2004年,张掖市地方志办公室获全省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2006年,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获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系统先进单位,有1人被评为全国地方史志工作先进个人。2010年,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临泽县志办被评为全省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全市有1人被评为全国方志系统先进个人,2人被评为全省方志系统先进个人。当前,全市地方史

志工作已初步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市、县(区)两级修志机构已健全完善,市上和6县区地方史志办公室均设立了常设机构。全市地方史志部门共有人员32人,中共党员24人,占75%;大专以上学历27人,占84%。

二是展现地方人文风貌,地情丛书做得亮。多年来,市、县区志办充分挖掘史料,相继编纂出版了《诗吟金张掖》、《金张掖史话》、《古诗话甘州》、《张掖文物古迹荟萃》、《张掖概览》、《张掖民间传说故事》、《张掖春秋》、《肃南史话》、《民乐史话》、《山丹史话》等多种地情书籍。这些地情丛书,都有很强的实用性、可读性和资料性,成为提升张掖文化品味的重要工具,外地客商熟悉了解张掖的一扇窗户,为对外宣传介绍张掖,扩大张掖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和重要客人的接待活动中,这些地情丛书作为礼品赠送各地来宾,受到了广泛好评。同时这些地情丛书,为本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特别是为市、县区项目论证与环境评价提供了翔实、准确的信息和依据,成为热爱家乡、热爱故土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最为实用的乡土教材,充分发挥了地方史志资政、育人的功能。

三是发挥资政功能,读志用志思维新。张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志书记载的“塞上江南”、“半城芦苇半城塔影”、“苇溪连片、五塔连环”、“水乡泽国”等大量史料,都是历届政府开展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2008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多方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尤其是中国黑河流域(张掖)湿地保护工程,就是依据方志提供的史料,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做出的正确抉择。生态张掖、和谐张掖、黑河治理、生态家园建设等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必然。张掖人民生态理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掖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沉淀,在这方面方志工作者为此提供的资政服务是不可忽视的。由此,全市上下形成的广泛的读志用志活动,为地方史志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崭新思维。同时,地方志部门提供的大事记等丰富史料,在讴歌张掖、宣传张掖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通过读志用志活动的广泛开展,张掖方志的以下作用已明显彰显:第一,不少专家学者著书立说普遍引用地方志;第二,市内外人士研究黑河流域、经济开发、生态环境、祁连山资源和历史人文等专题时都以方志为依据;第三,很多部门的大型庆典活动的珍贵礼品也是地方志;第四,带动了行业志、部门志、乡镇村志的相继出版。

四是服务广大群众,地方史志工作影响广。地方史志战线虽然人员少,工作条件差,但经过不懈努力,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在《张掖地区志》成稿的基础上,撷取精华,编写的《张掖地区志》精华本——《张掖概览》,把张掖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浓缩成了几十万字,使广大读者携带方便,买得起,用得上。2008年,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筹措资金3万多元,建起了全省史志系统第一家地情资料展室,将全市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历年出版的新志、旧志、年鉴和地情资料广泛收集,分类陈列各类志书、地情资料130多套,为广大群众和社会有关方面查阅资料、了解张掖地情提供了方便。为形成全社会盛世修志的氛围,多年来,市、县区史志人员走下去主动与市县部门、行业、乡镇村联系,帮助和指导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编纂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厂志、校史、家族谱牒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版或正在编纂的乡镇村志已达40多部,张掖的修志工作不仅得到了省上的高度评价,在社会上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除省内市县来张掖学习考察外,周边的青海、新疆、宁夏、陕西等有关部门纷纷来张掖考察学习。

二、地方志工作的基本经验

多年来,我市修志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困境中奋争,在奋争中发展,更在发展中崛起,产生和积累了不少新认识、新经验,这对于提高我们对修志工作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修志工作的能力,不断把修志事业推向前进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领导体制和修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是修志工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地方志横陈百科,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编史修志工程浩繁,耗力巨大,必须有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政府的全面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志书的不少内容需

要吸收新的学术成果,还要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多年来,经过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这套工作机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修志体制、机制的全新创造。它有利于形成党政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主抓,修志机构承办,各部门协同的有效运行框架,为修志工作提供必须的政治组织保证;有利于将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实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有利于及时研究、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确保史志产品的质量和“官修书”的主体地位。

二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修志事业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动力。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与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和行政机制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产业门类不断出现,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修志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修志任务的实现形式不断进行调整完善,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近几年来,市、县区修志机构结合各自的实际和特点,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思想观念、机制体制、志书体例、志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使新编志书更加准确、生动地反映了张掖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的深刻变革,真实客观地记述了党委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系列丰功伟绩。

三是坚持正确的修志理念,不辱使命,有所作为,修志工作才能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多年来,地方志工作受到市、县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志工作的政府地位。长期以来,修志机构正确把握修志理念,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奋发有为,不辱使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有为”达到了“有位”。事实证明,志书完成快,出得多,质量高,志书成果和地情资料选题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读志用志活动开展广泛,修志机构得到的支持就多,社会影响力就大。

四是坚持发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拼搏精

神,修志工作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全市修志工作总体上能够保持健康发展,取得今天的成绩,除了得益于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大方志工作者始终抱定不畏艰辛、甘于清贫、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决心,坚持发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实现着崇高的人生追求。多年来,全市修志系统涌现出了一批思想过硬、业务精通的优秀群体和先进分子。他们忘我劳动,无私奉献,做出了骄人的业绩,为全市修志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同行和社会的尊敬,他们是张掖修志战线优秀群体和先进个人的突出代表。

三、地方志工作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当前,全市地方志工作部门在发挥方志存史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为地方志工作构建了法制保障体系;通过积极探索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形式、新路径,不断扩大了社会影响;随着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越发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也越来越被各级党委政府所重视,开始呈现一派方兴未艾的方志文化春天。但是,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地方志在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

一是认识滞后。对待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一些人没有认识到它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在价值和功能作用,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的附带品,因而在组织领导上缺乏强度,在重视程度上缺乏高度,在经费投入上缺乏力度,使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远远跟不上时代要求。

二是资源整合滞后。方志工作基础设施、工作手段、资源聚合平台都相对薄弱,方志信息化程度很低,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仍然停留在初阶段、低水平、小气候、不平衡的状态,不能形成上下连通、整体联动、社会共享的网络格局,使方志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大气候、大手笔、大联合、大效应。

三是管理方式滞后。普遍存在着重开发、轻利用,重收藏、轻开放,重政界、轻社会的问题,不少志书、年鉴、专业志和地情资料编印出版后,发行

量少,有的存放入库,开放、推介、宣传、利用不够,使这些花费了很大代价的资源长期束之高阁,不能有效发挥资治、教化的应有作用和效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四是专业人才滞后。由于方志部门的体制、性质、地位和领导关注程度的不同,方志工作队伍普遍存在着年龄老化、青黄不接、力量不足、专业人才缺乏、流动困难的问题,有的县还相当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方志工作的开展。

五是依法落实工作滞后。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之后,虽然地方志工作有法可依,但如何把地方志工作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还缺乏有效办法。同时由于市、县(区)方志工作机构多为近年成立,新人多,业务学习与培训工作相对滞后,面对第二轮修志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勇于探索。

四、地方志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张掖各项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面前,市委、市政府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目标的高度,从新的背景、新的视野,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尤其是确立的立足于生态安全屏障、立体交通枢纽、经济通道的区域定位,着眼于建设生态文明大市、现代农业大市、通道经济特色市和民族团结进步市的目标,突出落实好生态建设、现代农业、通道经济三项重点工作,大力推进十大工程,不断拓宽三条路子,发挥比较优势,展现后发优势,以新理念、新举措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张掖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绿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今后和未来张掖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志为鉴明得失。地方志要在全市新的发展战略中,不辱使命,以志为鉴,立足服务,科学发展,努力推进方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力开发利用方志资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及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充分认识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地方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稀世珍宝”。它以信息的容纳量大,官方的权威性高,享用的社会面广,为其他任何著作所不可替代,为其他一般史书所不可及。正如方志学家顾颉刚所言:“惟方志中,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与其他史书相比,地方志拾遗补缺,记微记著,知兴知衰,见褒见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史料宝库,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我们常说,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而用志正是其生命之价值所在。衡量一个单位有没有社会地位,一种学科有没有学术价值,最根本的就是看其是否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效果。地方志部门只有坚持修志传承文明,用志服务社会,坚持修志与用志两条腿走路的方向,才能赢得党委政府的重视,才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全市方志部门既要默默无闻地修志,更要扎实有效地用志,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是要重视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立体式开发。地方志资源是地方志部门的宝贵财富,要做好开发利用文章,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做到科学开发、立体开发。一是要开发利用地方人才资源。地方志系统是“文化人”聚集之所,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人才很多,是一个高标准的“人才库”。要变方志人才为社会资财。广大方志工作者要转变观念,既要潜心伏案修志,更要走出书斋服务社会;既要关门搞方志学术研究,又要开门搞现实课题攻关。要找准自身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让知识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二是要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要通过点校旧志,编修简志、专志和年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让方志信息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可信的依据。要逐步创造条件,加速信息化建设,使各县区都逐步建立起网站、网页,有条件的可以借助政府网平台,建立方志网页。

三是推出更多更好的史志成果,为文化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当前我市第二轮修志已经全面启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规定》颁布后,地方志工作开始进入法制化、规范

化轨道。全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修志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积极投身地方志发展繁荣的宏伟事业,按照以编纂志书为重点,编辑年鉴、编写地情资料、整理旧志、史志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不断发展“志为主体、史志年鉴多元一体、协调发展”的地方志工作格局。努力抓好当前各项工作,力争在一定时期内推出一批以二轮志书为主导、以地方综合年鉴及专题地情资料为补充,既体现时代性,又紧贴地方性,既注重存史性,又强调可读性的优秀成果,全面扩张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以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为文化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四是创新服务手段,不断增强地方志工作的服务功能。地方志资源为现实服务,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具体工作中,不仅要注重历史研究,更要注重现实研究,使地方志工作切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张掖科学发展提供更多地方史志资源方面的服务。编好志书、年鉴和地情资料,要记载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最新成就和经验教训,宣传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打造地区形象,彰显发展优势,营造招商与发展的好环境。协助政府招商引资,联系客商、宣传客商、服务客商,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史志工作者要走出书斋,走入社会,走近群众,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服务。同时,要将历史档案挖掘的材料,运用到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调研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调研事关全局的问题,然后经过加工、提炼,供领导参考。总之,要着眼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总目标,多层次、多角度,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紧跟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全方位提供地方志资源服务,使地方志工作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是开门修志,不断提升地方志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多年来,各级修志机构大多处于封闭状态,修出的志书多掌握在领导手中,这种封闭状态影响了地方志书的广泛运用。地方志工作要更新思路,破除重编纂轻应用等观念,树立服务当代、服务群众的新观念。要通过创新读志用志手段,让人民群众了解一地的历史和文化,做好读志用志工作。让方志部门编写的志书、地情资料

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加强地方志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实现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地方志、地方志更好地服务群众的良性互动。要改进用志方法,化繁为简,方便使用,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尽可能把一些志书编成精本、简本,使修志成果为更多的人所知、所读、所用。要不断创造条件,及时提供平台,建设方志数据库,建成一项规模宏大、使用方便的方志系统工程,为大众服务,使方志文献在信息社会里发挥出它最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六是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修志与用志结合。首先,要继承和创新并重。加强首轮修志经验的总结是第二轮修志成功的关键。只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高屋建瓴地编修出高质量的第二轮志书。第二轮志书的记述时限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既有资讯发达、资料搜集相对容易的优势,又有社会分工细致化、内容繁多不易记载的难点。我们的志书如何做到与时俱进,将这一时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内容合理编排,如实记述,是我们每一个修志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宣传、培训和研讨,借鉴先进地区好的修志经验,在学习中找到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编纂方法,在以后的具体实践工作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其次,要通过理论研究提高第二轮志书的编修质量。方志是一门需要和值得深入研究的学问,历史上有很多方志学方面的专家。要想在二轮志书编修中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首先要在理论研究上下工夫,要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对待编修工作。只有通过对方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方志工作者才能够逐步培养出严谨的工作态度,培养出灵活的资料搜集和驾驭能力,厚积薄发,保证第二轮志书的编修质量。第三,要增强修志为用的责任意识。读志重在用志,这就要求我们修志工作者充分发挥修志为用的责任意识,及时、主动地去搜集、挖掘、记录本地区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相关数据,为地方政府提供施政参考,为后人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要通过更加积极的努力,将修志为用的意识贯穿在编纂思路中,为地方志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关于提高志书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王建华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也是修志工作永恒的主题。本文结合《酒泉市志》的编纂，拟对如何提高市一级综合志书的质量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科学、合理的篇目设置，是志书编纂成功的基础

编纂提纲和篇目设置是一部志书的灵魂。要想修出好的志书，首先要做的就是集中力量拟定编纂方案，这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重要前提。在志书总体设计阶段，应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的体例结构，合理的篇目设计，这是编纂的基础准备和理论依据。志稿纲目，

在志书编修启动阶段，是志书的总体设计和基本框架，是部署供稿任务、收集资料的提纲和向导，能够起到按纲索骥的作用；在编纂过程中，是志书的篇目，编、章、节、目都是志的标题和文眼，起到照纲编写、避免走题的作用；志书完成后，就是目录，起到索引的作用。所以，合格的纲目是全志内容层次分明、科学有序、精炼准确的概括，不仅能使整部志书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表达流畅、编撰顺利，更有利于用志时迅捷、准确地查找到所需的

完整资料。

如果说，一部志书是一个区域的历史储物箱，人们一打开箱子，所储物件，堆码有序，层次分明，其数量、质量和大小、色彩一目了然，使用方便。这就是纲目设置成功之效。《酒泉市志》采用编、章、节、目的体例，分为序、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和正文四十五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分上、中、下三卷。在整体设计上，把握了实用性、典型性、可操作性“三项基本要求”，注重时代性、地方性、专业性“三大特点”。体现三个突出：第一，立足于酒泉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这个根基，突出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鉴于《酒泉市志》是酒泉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综合志书，酒泉及甘肃省均无通史的情况，酒泉市志办在拟定编纂方案时突出了“历史沿革”部分，共编写了7章、10多万字；为了突出博大精深的酒泉文化，单独设置“文学艺术”一编，对酒泉境内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第二，突出古代“飞天”和现代“航天”两大品牌，单独设置了“敦煌学”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两编。第三，突出地域特色和发展特点，采用升格办法，浓墨重彩地记述了酒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单独设置了“玉门油田”、“农垦”、“疏勒河项目建设”三编。另外，在各编之首均设无题概述，追本溯源，概括全貌，标示特点，增强志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体现纵横结合、史志结合的特点。

二、全面、系统的资料征集，是志书质量提升的前提

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也是衡量一部志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孔子修《春秋》，“得百二十国宝书”；司马迁著《史记》，“代为史官，亲掌图籍”；班固撰《汉书》，“选择前书，缀集所闻”。我们要编纂出良志，更应首先认真做好资料工作。在志书编纂过程中，编纂者一般会接触到大量的、繁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资料，对这些资料，一定要深入探索、仔细研究、吃透资料，才能决定如何使用它们，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安排资料，如何把握详略。

提高志书资料的质量，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酒泉市志》篇目初步确定后，市政府发布

了关于征集《酒泉市志》历史资料的通知,凡对自然和社会发展有所考察价值,对修志所需或有一定补益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习俗、名胜古迹、天灾异情等均在征集范围之内。《酒泉市志》的资料征集采取了主编抓全盘,副主编分工负责抓行业,责任编辑联系资料员的运行机制,将市志所需资料按篇目分解到全市7个县(市、区)、140个部门和单位。对于报送资料,要求部门或单位审查,单位行政主管在政治观点、方针政策、主要事实和保密等方面签署审查意见并盖单位公章。对于如诗词曲赋、社会生活、历史沿革等一些学术性强,研究难度大的篇章,采取课题承包的方式,聘请专家学者研究撰写提供志稿。衡量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首先要看它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准确、全面、系统,是否真实地反映当地客观实际。为此,《酒泉市志》编纂中针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问题,反复考证,寻找可靠证据;对专业性较强的篇章,通过相关业务单位反复核对,杜绝了专业性错误的发生。同时,市志编辑人员本着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普查后细查、先口碑后文献、先文字后实物、先直接后间接的“七先七后”程序,采取网上查阅资料、电话核对资料、翻录档案资料、购买现成资料、索取信函资料、获取口碑资料、实地考察资料、互相交流资料等多种形式搜集资料。总之,资料征集一定要扎实,收集资料要宽,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取用资料要严,要对资料下一番甄别、考证的功夫,不必迷信权威,对于他人著作中记载有误的,应加以修正,不必“迁就相以为借重”,以免讹误。

三、缜密、细致的科学编纂,是志书质量提升的关键

对于志书质量而言,至关重要的因素就体现在编纂,尤其是总纂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应该达到观点鲜明准确,资料充分翔实,布局合理得当,繁简详略适度,文风凝练通畅,表意准确明白的标准。《酒泉市志》编纂中主要做了以下几点:

1.健全机制,把好编写关。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本素材,作为志书编纂者,应该是“调用”其中的资料,而不是“挪用”其中的素材。所谓“调用”,就

是依据确定篇目搭起承编篇章的框架,将篇目作为骨架、来稿作为有待规范血肉,骨架上需要什么样的血肉,就从来稿中寻找什么内容,把它填补到最合适的位置,让来稿顺应篇目。《酒泉市志》实行编写责任制,即按市志篇目统一要求和行文体例,主编主持总纂、编写与业务审查,凡撰稿者皆分篇包干。这一阶段,主编通编全志,全力合拢成稿,做到“力拨冗务,闭门谢客,全力以赴,总阅通改全志”。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对志稿撰写人员的要求是既严格统一大纲体例和步骤,又提倡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既强调速度,更强调质量;既明确分工,又协调一致,形成严肃、紧张、细致的工作作风。在志书编纂之初,将经过编排的资料,供撰写人员试写实习。试写以二三个节、目为宜,分工到人,限时完成。所有的资料撰写人员均参加试写,分志主编也不例外。试写过程中,业务人员跟踪指导,选择竖写实体较成功的样本,供给编写人员学习、参考。志书在正式编写时根据各人特长及编写水平明确分工,把编写任务分解到个人。对不能胜任的人员及时调整,对编写水平一般的适当减少任务。其次,根据撰写人员承担任务的轻重,确定完稿时间。再次,组织专业人员开小型研讨会,传阅志稿,交流经验,找寻问题,共同修改。最后是做好跟踪指导,及时了解承编单位志稿编写进度,并审阅部分志稿,针对存在问题进行专门性指导。

2.分工负责,把好修改关。志书修改阶段,要重点解决资料、数据、文字等方面的问题。首先,志书以资料取胜,志书资料来源于多种形式,经常出现类似于地点错误、人名地名错误、单位称谓错误、职务职称错误、文件标题错误、摘录打印遗漏、修改推版错行等问题,需要认真甄别。其次,志属信史,史实数据必须真实可信,这是起码的质量要求。无论编写志稿还是审改志稿,核实数据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数据硬伤又是最常见且非常严重的差错,所以必须高度注意。第三,志稿中的文字硬伤数量比例较大,其常见类型有标点符号差错、掉字多字错别字、不规范文字差错及修辞方面的问题。为了便于明确责任,《酒泉市志》编纂中将部门、县市的稿件进行合理分工,先由编纂人员单独

进行修改,然后再相互交换审阅。这样做既解决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方面的问题,又解决内容上相互重复,互相矛盾,同一事件表述不一的错误。如:“1958年12月,酒泉、金塔合并建立酒泉市(地级),隶属甘肃省。1961年11月,撤销地级酒泉市恢复县级建置”这一事件,在《肃州区志》中表述是“1959年1月,酒泉、金塔两县合并建立酒泉市(地级)。”在《金塔县志》中表述是“1958年11月12日,金塔、酒泉合并为酒泉市,直属甘肃省”。经核定考证,1958年11月是正确的。

3.集思广益,把好会审关。进入集中编修阶段后,需严格按照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进行全面审读,保证志书的统一性、科学性、准确性。《酒泉市志》的编纂在这一阶段重点把握了六个方面: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史实是否准确,入志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记述内容是否反映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体例是否完备,篇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记述是否规范,文字是否准确、简洁、流畅;志稿内容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保密要求。志书编纂的难点就是对重大问题重新考证核定。酒泉市所属7县市区第一轮都编纂出版了县(市)志,这是《酒泉市志》编纂工作的基础。在修志过程中发现,不同县志对同一问题或同一事件有不同记载。对此,编纂人员进行了重新考证核实,寻找历史事实依据,而不是拘泥于照搬照抄老志;在处理“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民族宗教”以及“扫黄打非”等一些特殊历史政治问题时,谨慎把握秉笔直书与政治原则立场的关系;在撰写历史沿革篇的过程中,编纂人员多方查阅资料,不仅仅参阅各县市区志稿的内容,而且从历史典籍中寻根问祖,避免以讹传讹。

四、广泛、深入的意见征求,是志书质量提升的保障

志书总纂完成后,要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确保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编纂精细、特色突出。这一阶段,主要要根据“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原则和按同一个标准划分的要求,对有待再改的篇目进行专题讨论,并采纳联审中的合理意见;针对上下限不到位、竖写断线过长、横陈缺少要项、重要

事件漏记等问题,查漏补缺,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调查;通过走访知情人、查看原始资料、鉴别考证等方法,分别对志稿中存在差错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削志稿中存在超越记述范围、内容重复等问题的杂芜内容,对志稿中有关纪年、计量、数字、名称乃至标点符号进行校正,力求表述内容准确、朴实、鲜明、生动;结合志书实际,做到“勘校缜密严谨,印刷清晰精美,装帧设计精良”,全程跟踪印刷,确保质量,有序完成志书的出版发行工作。《酒泉市志》征求意见阶段,按照专题和行业分类,分两次将成型志稿分送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将“疏勒河项目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敦煌学”、“酒泉民俗”、“玉门油田”等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内容分送有关专家学者审阅把关;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台等媒体扩大宣传,通过向上级业务部门、出版社和专家学者进行意见征集,增补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夹边沟农场”、“青海油田敦煌基地”等内容,并逐步进行修正、完善。校对是对志稿编辑加工、减少和消灭差错的最后一道质量把关工序,通过校对可以弥补编辑的疏漏,也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延续。因此,校对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志书的质量。书稿校对一般为三校,《酒泉市志》则采用四校,即三校后通校。稿件交付印刷前,由主编、副主编负责对全书内容主要是版式、字号、书眉、页码等进行通校,防止版面、书眉、字号的不一致及其它漏洞。校对工作采取自校、互校、返校和专职校机制,把差错消灭在成书之前。校对中特别重视了返校问题,就是将样稿返回给原撰稿人校对,因为他们是撰稿第一责任人,掌握编辑内容、人名、地名、数据和不易弄清的规格、型号、代码材料的来源,对志稿的校对具有权威性。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志书是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地情书,只有增强质量意识,把提高志书质量放在首位,并始终贯穿修志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色鲜明,体例严谨,文风端正,印制符合规定。同时,充分注重志书的资料性、学术性、准确性,增强可读性,才能有所创新,突出特色,创名志,出佳志。

(作者单位: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刍议新编地方志专业审稿之技巧

赵丽

摘要:新编地方志专业审稿是提高地方志质量的关键环节。地方志审稿过程中要着重围绕篇目设计、横排竖写、行文书写等几个方面,准确把握观点、核准充实资料、突出地方特色、压缩志稿篇幅,同时还要着力注意对断限外资料、专题性资料、因事系人资料的补充。

关键词:地方志 审稿 技巧

新编地方志专业审稿是指志书初稿在各承编单位完成自审之后,交至市志办各责任编辑手中进行审读、修改的环节。作为责任编辑,主要则是根据志书篇目的统一要求,把分散的有关卷、章、节、目纳入志书的有机整体,达到纠错、补漏、删繁、提炼、规范的目的。随着修志工作的深入开展,许多市、县志稿进入审读阶段,这是决定志书质量的关键阶段。研究和探讨志稿审读的重点和要求,对提高审读水平,保证志书如期高质量出版很有必要。笔者从事修志工作数载,承担了许多市、县志卷、章的专审工作,针对志稿专审,本人结合工作实践特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专审的重点把握

各承编单位的修志人员基本上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他们当中许多同志还缺少修志专业知识,编纂的志稿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写作习惯的痕迹。有的像公文写作,总结式、口号式语句多;有的像散文,修饰、抒情的语句多;还有的像工具书,辞书式的解释性文字充实其中。作为志稿第一道把关的专业人员,责任编辑拿到的初稿可谓是五花八门。面对质量参差不齐的初稿,作为专审的责任编辑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修改。

1.看篇目设计是否合理。志书篇目是一部志书的骨骼和框架,居于“领导”地位。志书篇目的确定和取舍,应从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的实际出发,最基本的篇目要门类齐备;有些节、目的增

删设置应体现地方特点的原则;各篇目内容应门类合理,归属得当;篇目的排列应体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的原则。《××市志·城乡建设卷》初稿中第五章“城乡一体化”只设有“镇村规划建设管理”一节。从整卷来看,这一章显得有些单薄,章名是“城乡一体化”,可下面节的内容只有“乡”却没有“城”,这就属于门类不齐全,建议加上“县城建设与管理”,进一步补充完善这一章节的内容。

2.看横排竖写是否得当。新编地方志,横分门类、竖写历史是其基本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横不缺主项,纵不断主线。横分门类必须科学,并且要有统一的标准,否则就要调整。每部分志通过分门别类的记述,写清事物的发展、因果、盛衰起伏、成败得失,体现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志稿内容记述上,要善于综合分析,做到主线突出,段落分明,符合志体。《××市志·城乡建设卷》的初稿,在“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园林绿化”等章节写完后,加入了“县(市、区)城建设”章,各县(市、区)内容独领一节,节下的目与分目按照《××市城乡建设卷》的篇目复制下来。这就出现了“志中志”的格式,不在一个平面,这也是编纂志稿最为忌讳的一点。竖写是志书最基本的记述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时有序,通过点、线、面结合,准确表现某一地域范围内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编纂过程中一定要写好事物的起始点、转折点、终结点发展主线。

目前,在二轮修志过程中,许多初稿的问题都出现在这里。志稿记述不能以时有序,内容表述先后凌乱,有的虽然按照时间先后记述了,却是从上限开始,一年不落的一一排列下来,写成了流水账。这就需要编辑下功夫理出头绪,准确把握“三点一线”,合理地归并、删减、增补,以突出主题。

3.看行文书写是否规范。如果把篇目结构称为志书的骨骼,把横排书写称为志书的血肉,那行文书写就是志书的细胞,是志书构成的最细微的组成部分,却也是一部志书成功与否的基础性工作。志书行文总的要求是:行文严谨朴实,简明流畅;表述准确清晰,符合逻辑;标题以事命题,科学简明;图表工整准确,要素齐全;名词术语规范统一,计量单位符合国家规定。常见的问题有(1)记述文体不规范。新方志采用现代白话记述性语体文,但志稿中多有非记述性问题:如背景介绍多、名词解释多、议论评价多、冗长水分多等等。(2)数字、年代、称谓不规范。在初稿中,经常看到“我市”、“我局”、“××同志”等词,这些都不符合志书的书写规范。(3)记述要素不规范。有些志稿,内容写得很好,就是缺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使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这些都需要责任编辑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对文稿逐字逐句的进行推敲,反复修改,才能使初稿最大程度上符合规范要求。

二、专审的具体要求

专审是志稿质量日臻完善的主要程序之一,是让志稿向志书进化的主要环节。作为专审的责任编辑,一定要按照地方志书审查验收办法的要求对志稿进行严格的审读,并提出科学合理的修改意见。同时,每一个责任编辑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及时与各部门沟通,深入了解地方、行业 and 部门特色,积累储备相关背景资料,从而增强审稿工作的主动性。

1.准确把握观点。为什么要准确把握观点?因为这是志书的政治生命。如果观点出了错,资料再丰富,叙述再到位、再规范,也是徒劳无功的。在志稿的修改中,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统帅资料,力求观点正确、鲜明、突出。这就要求各个责任编辑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对政治部类稿件以及志稿中涉

及政治性的内容记述要十分慎重,审查编者对事物的定性是否准确,观点导向是否正确。总之,要严格按照要求,进一步把握志书的政治观点,力求做到记述准确,褒贬恰当,是非分明。

2.核准充实资料。志稿修改过程中,责任编辑必须对关键性的资料如在几个章节中记述不统一的资料、相邻建置对同事物记述不一致的资料和足以说明某个问题性质的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和补充,切实重视资料的贯通性。行业问题找部门,专业问题找专家,资料问题找原著、查档案,力求使人志资料准确无误。《××市志·环保卷》初稿“生态示范区”一目,生态村的内容从1984年后直接跳到1998年,中间14年是空白,但笔者却从后面的某一章节中看到1986年建成全国第一个生态村——××县董徐村。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和事件,却被忽略了。另外,这期间应该还有其他生态示范区的建设内容应该增补进去。

3.突出地方特色。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新编地方志应当“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地方志是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这就决定了它记述的范围带有严格的区域性和时代性,这是志书区别于其它种类书籍的明显特征。因此说志书突出反映时代性、区域性是志书性质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志书质量的根本问题。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成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地方志的地方特色,要求地方志一定要揭示出该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因素所构成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历史与现状,必须在整个志书中予以充分体现。笔者在审读承编单位报送的初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志稿体现地方特色的内容都比较薄弱,有关卷章的内容放到其他兄弟市的市志里也都可以。这就需要责任编辑帮助理清主次,抓住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名片”式的独特事物,从篇目设置到内容记述,从背景原委到发展变化,都要浓墨重彩,写全记透。

4.压缩志稿篇幅。从目前报送的相当一部分志书初稿看,大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所记述

的内容过多、过细、过繁,志稿的篇幅大大超出了预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编者没有站好记述的角度。如编写一部市志,某些资料用于部门志比较适合,但对于整个市志来说却不太合适,编者在没有分清孰轻孰重的情况下,一律采用,势必增大志稿的篇幅。二是一些编写人员过分强调资料的存史价值,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背景资料大量的塞进来,造成篇幅臃肿,比例失衡。此外,内容交叉重复、表述逻辑性不强也是造成志稿篇幅过大的因素。因此,责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精炼文字,压缩重复记述,精减超出断限和越境而书的内容。《××市志·交通卷》初稿送来时,洋洋洒洒30余万字,约占该市全志篇幅的十分之一。面对这样一部厚厚的志稿,如何压缩其篇幅又不使内容被割断,也可以说是相当于一项“交通工程”了。该初稿中有一目“高速公路”,目下先有一段近500字的概述内容,是将后面子目的内容进行提炼出来。这就属于重复记述,应删去。在记述“宁靖盐高速公路××段”这一子目时,该初稿分三个工程段记述,可第三期工程是2005年11月才开工建设,2008年8月建成通车。实际上这项工程大部分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该市志的下限2005年,该段近1500字的内容记述完全就可用一句话交代一下。该初稿从每个工程的开工情况、完成工程量、工程质量、工程验收和工程设计、监理等方面,用大量的翔实的专业性数据将每个环节的变化发展都进行了记述。虽然资料性很强,但是站在全市交通的角度讲,就有点过细了,也占据了大量篇幅。经过协商调整,该志稿执笔人员将工程质量、验收、监理等部分内容进行删减,有的内容用几句话概括即可。只有遵循这样的删减原则,才能使“瘦身”了的《××市志·交通卷》既内容丰富又不超篇幅规划。

三、专审中不应忽略的资料补充完善工作

在审读初稿的过程中,责任编辑往往容易出现就稿改稿的情况,只埋头于成形的文字进行修改,却忽略了资料的补充。这里讲的补充并不仅仅指对数据缺失的补充,而是指对断限外资料、专题性资料和因事系人资料等方面的补充。

1.对断限外资料的补充。二轮志书是断代志,修的是近2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总体上会有个断

限。各部门单位往往会以这个断限为框框,无论是收集资料还是编写初稿都会局限在这个断限范围之内。但由于事物的发展是变化复杂的,我们在审读志稿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的处理志书断限,对有些事情跨越上下限的记述,不能简单地以“越界而书”断然拒之。例如《××市志·交通卷》中“民用航空”,记述机场发展时,该地的机场是由曾经的军用机场改为民用机场,始于1959年,1962年停航。这件事情在上一轮志书中并没有提及。倘若续志收集资料时仍然循规蹈矩只局限在断限内,不敢往上追溯,那么“民用航空”的发展背景和源头的资料就会缺失。续志反映“民用航空”这个事物就必然残缺不全,给志书造成不应有的缺陷和损失。作为修志的专业人员,审稿时更不能只局限于断限内,应考虑更大范围,这对补充、修订上一轮志书一些内容的缺漏、差错发挥补拙之功效。

2.对专题性资料的补充。在部分初稿中,有些重要内容志书正文虽已述及,但因受体例和篇幅限制,未能详细记述。还有一些属于“拦人则不伦,弃之则可惜”的内容,也就是指那些有一定重要性,但是没办法与志稿中的章节划为一类的内容,这些都属于专题性资料。碰到这种情况,有的作者或者一句话带过或者干脆省略不写,这就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资料性。作为责任编辑,一定要深入了解部门行业的情况,及时捕捉到重要信息,顺藤摸瓜将这些专题性资料挖掘出来,作为专记或者附录收录在志稿之中。

3.对因事系人资料的补充。因事系人是指各分志(卷)在记述事物的发展变化时,结合写出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因事系人与人物立传不同,是把人物及其事迹与所记述的事业发展变化糅合在一起,彰显人物是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事业的发展变化服务的。在审读初稿时,笔者发现,相当部分志稿除了领导出席会议或活动中会提及到人物,其他很少有人物出现,只记事不记人或只记数不记人。历史事件中人物的作用相当大,是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编纂地方志不能忽略人物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责任编辑从资料全面、真实、精确的角度来审读志稿,注意对因事系人资料的补充。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全神贯注修志书 尽心竭力出精品

——省地税局二轮修志工作总结回顾

司德芳 整理

《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二轮编修工作进展顺利,基本完成志书编纂任务,截至目前已形成送审稿。志稿编修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精心设计篇目,制定编修方案

《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编修工作从2008年7月正式启动。具体由政策研究处负责,并确定专人着手此项工作。7月,起草《关于编写〈甘肃省志·税务志〉地税部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组织领导、编纂方式、实施步骤、体例篇目、记述内容及要求、总体时间安排及保障措施等。成立地税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及时与省史志办衔接工作计划,与省国税局税志办接洽,取得工作支持。8月,将编修意见和接洽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局领导的意见是与省国税局分开编修,指示了解掌握其他省市地税局编修情况,专题进行考察学习,取人之长,为我所用。10月,在了解全国有关省市地税局编修地方志的情况后,对山东、河南、湖南三省地税局关于地税志的编修情况进行学习考察,撰写考察报告。起草《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编修〈甘肃省志·税务志〉有关问题的函》,及时呈送省史志办,阐述考察情况,提出省地税局、省国税局单独编修的意见。经与省国税局、省史志办多次协调,同意省地税局与省国税局单独编修,并将地税志更名为《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省国税局编修上册。11月,起草《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编修大纲和实施方案,送省局领导和机关各处室征求意见后汇总,12月形成定稿。

二、确定写作思路,把握编修原则

起草《对〈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初稿的写作方法建议》,对初稿的写作方法,应把握的方向、重点以及如何体现特点等都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在税制部分,重点写省局制定的政策措施,对特别重大的事件,简要概括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在内容的选用上,只写文件、规定的核心内容,原因、根据、要求及认识部分不写。文件只写正式执行的,请示、报告、批复一律不写。基本内容也是高度概括,尽量变成自己的话。税务管理、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部分,体现新思维和人的作用,体现科学发展观。经验特点方面的内容详写,一般性内容略写,既忠实资料,又提升资料价值。税制部分体现甘肃地税贯彻落实中央财税政策、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积极落实西部开发政策和优惠政策。税务管理部分体现甘肃地税不断探索适合甘肃地税的征管模式,不断推进征管体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创新思路,建设亮点项目,不断提升征管工作水平和质量。队伍建设部分通过干部教育培训、作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纪检监察工作,不断提升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提升科学发展观的运用水平。信息化建设方面,突出甘肃地税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不断追求征管现代化、提升征管手段的精神,探索、试点过程及对征管的支持力度等。

提出编修工作应把握五个原则和处理的五个关系。五个原则:一是坚持依法修志的原则。严格

遵守有关法规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及二轮修志的具体规定,严格履行审查验收程序。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全系统改革、发展、建设取得的成就经验,又如实记述工作中的不足、教训。三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把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着力提高志书的核心价值和资政作用。四是坚持述而不论和述而有作的原则。一方面,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空发议论,不作评论;另一方面,要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提炼和概括。五是坚持详略得当的原则,增加具有资政价值的内容,压缩一般性内容。坚持做到“九多九少”,详略得当,即:重要典型内容多,一般内容少;地方措施多,中央规定少;提炼综合多,简单罗列少;本质内容多,表象内容少;把握兴衰转折多,逐年流水记账少;管理经验多,一般管理工作少;动态反映多,静态反映少;无形反映多,有形记述少;记重要活动多,记机构会议少。要处理好的五个关系是:正确处理好质量和进度的关系,确保质量,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力争速度;正确处理好统一要求和具体部门的关系,在篇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上,坚持自成体系,在特色上下功夫,做到突出特点,体现亮点,保证重点;正确处理好存史与资政的关系,既要完整、准确、全面地记述史实,又要总结发展规律,剖析存在的问题,为地税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正确处理好统一和分工的关系,专业志的编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各个部门提供资料,专门成立的编修机构集中编写初稿。另一种方式是将初稿的编写任务分解到有关部门,再由编修机构合稿和总纂。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争取工作上最大程度的支持和业务把关;正确处理人和事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记人也要记事。

突出甘肃地税特点,抓住重点环节,严格方志要求,做到主题突出,特色鲜明。一是体现新思维。观察问题要有新视角,分析问题要有新思维。要坚持人本观念,树立科学发展的思想,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地税工作十多年的回顾分析,体现

人的作用,反映人的思想,特别强调人才对地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二是体现志书价值。既要站在编纂者的角度,又要站在用志者的立场,确实提升志书的资料价值和使用价值。三是设计篇目全面。充分考虑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时代特点,既要考虑税种、税制,又要反映管理和队伍建设等,重视对动态事情的记述。四是取得丰富资料。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搜集、筛选、整理、考证资料。要占有大量丰富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和口述资料。特别要抓好具有亮点的典型材料、事关全局的重要材料、体现部门和时代特色的经验材料的搜集。五是精心做好“概述”。志书的“概述”,是集中反映特色的最佳载体。

三、搜集整理资料,认真编写初稿

初稿的编写工作起步于2009年,本着加快进度、确保质量的思想,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编写初稿,主要完成以下工作:一是扎实安排工作,确保编写进度。2009年1月,及时下发《关于编修〈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的实施方案》和《〈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编修大纲》,对编修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对整体工作分阶段进行具体安排,提出2009年基本完成初稿编写任务。按照大纲对初稿及其他工作进行分工,赵星军负责协调等工作;杨国珍编写税收制度、税务管理、队伍建设部分,承担概述、序、凡例、大事记,总纂和日常工作;周文理承担信息化建设部分初稿编写任务。二是多渠道搜集资料,力争记述全面。给有关处室呈送关于对《编修〈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资料搜集的函》,对时间及内容做出具体安排,共17个方面。通过局档案室搜集资料,为更多地掌握活资料,向已经调整人员了解情况。三是全神贯注编写初稿,完成年初制订计划。由于省地税局志书编写工作起步较晚,时间十分紧张,只有加快步伐,才能赶上进度。编写人员增强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排除所有干扰,一心一意修志,做到每天都有进度。至2009年底,完成初稿30多万字。税收制度、税务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全部完成初稿写作任务,队伍建设完成部分写作任务。2010年,基本完成初稿约50万字。初稿印刷50册,送交省局领导、各有

关处室和市州地税局征求意见,同时附送修改方向和要求。四是积极争取指导,降低编写初稿差错率。为保证志书质量,确保初稿写作不偏离地方志编修的轨道,先后两次邀请省史志办省志处负责人指导工作。

四、及时总结工作,筹备编委会工作会议

2009年4月,针对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局领导提出《关于搜集资料存在问题的汇报》,并对省局档案存管工作提出建议。

2010年1月,将2009年志书编修情况书面向局领导汇报,局领导要求尽量要在特色上下功夫,充分、准确记述反映甘肃地税的历程和工作,做到大事可查、资料可用、成败可鉴、准确又有趣味性、学习性。同时,积极筹备编委会会议,总结2008、2009年编修工作。为使初稿编写内容尽可能全面,同时便于写作概述部分的内容,起草拟定《处(室、中心)十五年(1994—2008年)工作总结参考提纲》,要求各有关处室对1994—2008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总结的内容分为8个方面,同时提出4个方面的写作要求。3月19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工作会议,汇报《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编修工作,发放《处(室、中心)十五年(1994—2008年)工作总结参考提纲》。这次编委会会议的召开为2010年全面完成初稿编写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12月,在完成初稿编写的基础上,编修人员站在资政的角度,对甘肃地税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策研究水平和制定政策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工作研究的意识需进一步强化;三是资料存档工作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交接工作需建立责任制度;四是工作质量和指导工作的层次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五、严格质量标准,认真修改初稿

一是给省局各处(室)及市(州)地税局发放《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初稿,随书附上修改要求和参考方向,并要求继续提供初稿中的短缺资料和图片,在修改结束之后于2011年2月28日之前报送税志办。二是确定2011年初稿修改的工作思路 and 方向:首先,解决硬伤以及内容的缺漏和错别字。其次,进行整体的文字修改和内容的删

补。第三,解决体例问题,对不符合志书体例要求的进行修改完善。第四,弄清楚志书精品的要求和标准,然后确定打造精品的工作思路和方案。三是制定《〈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打造精品计划及责任分解表》,分月安排2011年修志工作内容,确定了各项工作的责任人,使全年工作进一步量化、细化和责任化。四是起草印发《关于对〈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修改问题的通知》(甘地税函〔2011〕123号),要求省局相关处室和市、州地税局尽快结束初稿修改工作,搜集提供2009、2010年相关文字资料及图片资料,将初稿中涉及省局有关处室的缺漏内容全部补齐。为促进这项工作,6月又以甘地税函〔2011〕175号文对初稿修改情况和资料提供情况进行通报,并要求在6月20日之前全部完成资料交接工作,并完成初稿修改工作。五是根据局领导提出的下限延长至2010年的问题,与省史志办和省国税局反复协商、沟通,同意下限延长至2010年。六是根据局领导打造精品志书的指示,制定《〈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精品标准》,包括体例、记述、语言文字、图表制作、资料、修改、印刷等七个方面。

六、解决遗留问题,完成续写和修改工作任务

1.续写2009、2010年初稿内容。续写2009、2010年税收制度、税务管理、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初稿内容。

2.补齐初稿中缺漏内容。缺漏主要有:(1)减免税中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要求将省局和市、州地税局审批的数字相加之后填上表,涉及营业税处、财产行为税处。(2)有关人员情况表中的空白数字,涉及人事处。(3)奖励表彰表中的缺漏数字,涉及省局有关处室及市州地税局。在局领导的积极协调下,及时与省局有关处室接触,送达图表资料,全部解决初稿缺漏内容。

3.修改初稿,充实完善概述、大事记、信息化建设等内容。反复修改、删补文字内容,对2010年形成的初稿进行不断修改,本着文字简约的原则,压缩文字80000字,新增信息化建设2009、2010年内容等120000字。起草总序(下转第57页)

《临夏市志(1986—2005)》目录

概述
大事记

人口 环境 土地篇

第一章 人口

人口概况
计划生育

第二章 环境

地质 地貌 河流
气象
环境质量监测
环境管理及监察

第三章 国土管理

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地籍管理
用地管理

基础设施与基本建设篇

第一章 城镇建设

规划
建设
管理

第二章 房地产业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交易
产权产籍管理
公房管理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单位住宅楼建设
城镇私房建设
物业管理

第三章 交通

道路建设
运输
管理
运输企业

第四章 信息产业

邮政
电信
联通
移动通信
网通

第五章 电力

电力体制改革
电网建设
城、农网改造

农业篇

第一章 体制改革

土地二轮承包
产业结构调整
服务体系建设
税费改革

第二章 种植业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科技推广

第三章 畜牧业

养殖
科技示范推广
畜禽疫病防治

第四章 农业机械

拥有量及作业

管理

第五章 林业

- 林业建设
- 园林绿化
- 科技与管理

第六章 水利 农电

- 水利建设
- 水政管理
- 农电建设

第七章 农村经济管理

- 扶贫开发
- 小康建设
- 农民负担监测
- 土地承包管理
- 村级财务审计
- 农经培训

国有经济篇

第一章 工业

- 企业体制改革
- 设备与技术
- 管理与效益
- 省、州属国有工业企业

第二章 商贸

- 商贸体制改革
- 供销改革
- 粮食改革
- 商品营销
- 网点及管理
- 省、州属国有商贸企业

第三章 对外经济协作

- 对外贸易
- 横向协作
- 招商引资
- 信用促进会

民营经济篇

第一章 企业

- 二轻
- 乡镇

私营

第二章 企业改革

- 产权结构
- 投资结构
- 经营体制改革
- 产权制度改革

第三章 生产经营

- 工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
- 商业
- 餐饮业
- 旅店业
- 理发照相业
- 洗浴业
- 修理业
- 家政服务业
- 中介服务业
- 旅游业

第四章 管理

- 管理机构
- 优惠政策
- 人才培养
- 协调服务
- 技术改造
- 经济效益
- 重点企业及产品

财税 金融篇

第一章 财政

- 财政体制
- 财政收支
- 财政监督

第二章 税务

- “七五”、“八五”税收概况
- 国税
- 地税

第三章 金融

- 人民银行
- 银监分局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村信用联社
城市信用社
农业发展银行
资本市场
人寿保险
财产保险

综合经济管理篇

第一章 计划管理

计划编制与实施
消费水平
重点项目管理
“农转非”管理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市场建设
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与监督
经济检查
商标广告管理
经济合同管理与仲裁
管理费征收
民(私)营企业管理
经纪人管理
个体劳动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第三章 物价

管理机构与体制
物价管理
收费管理
物价监督
资产评估
价格事务
物价指数

第四章 统计

体制改革
普查
服务与监督

第五章 审计

机构
国家审计
外资项目审计
审计事务所

第六章 质量技术监督

机构
质量监督与管理
标准化管理
计量监督与管理
代码编制

政党社团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

代表大会
党员代表大会
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
机构改革
重要决策
视察调研
党的建设
干部管理
宣传教育
统一战线
其它党务

第二章 纪律检查委员会

机构
纪检监察

第三章 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四章 人民团体

工会
共青团、少先队

妇女联合会
工商业联合会

政权 政协篇

第一章 人民代表大会

历届历次会议
换届选举
人大常委会
乡(镇)人大主席团

第二章 人民政府

机构改革
政务制度
施政举要
综合政务
乡镇政权
派出机构

第三章 人民政协

历届委员会委员
政协会议
参政议政

政法篇

第一章 政法

机构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禁毒专项斗争
维护稳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处理“法轮功”问题
执法检查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来信来访

第二章 公安

机构
治安管理
刑事案件侦查
监所管理
交通管理

第三章 检察

机构

审查批准逮捕

审查起诉

反贪污贿赂

反渎职侵权

民事行政检察

监所检察

控告申诉检察

队伍建设

第四章 审判

机构

法庭建设

刑事审判

民商事审判

行政审判

立案信访

审判监督

执行

队伍建设

第五章 司法行政

机构

普法教育

法治建设

民事调解

基层司法所建设

法律援助

律师事务

公证业务

军事篇

第一章 机构

市人民武装部

镇、街道武装部

驻军及驻地军事机关

第二章 兵役

兵役登记

征集

第三章 民兵

组织

应急分队

第四章 军事工作

国防教育

军事训练

第五章 拥政

共建双拥模范城

拥政爱民

人事 劳动篇

第一章 人事

人事制度改革

编制管理

干部职工

工资福利

第二章 劳动

劳动服务

劳动执法

安全生产

第三章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职工医疗保险

民政篇

第一章 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村民委员会

社区、居民委员会

第二章 拥军

军民共建

拥军优属

第三章 优抚安置

优待

伤残抚恤

“三属”抚恤

第四章 救灾救济

自然灾害救济

社会困难户救济

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合作医疗救助

社会捐赠

第五章 社会福利

残疾人工作

老年人工作

社会福利院

城市幸福院

农村敬老院

老年活动中心

社会福利企业

第六章 民政管理

民间组织

殡葬改革

婚姻登记

收养登记

社会救助

福利彩票发行

勘界和行政区划

地名管理

教育篇

第一章 教育改革

教法改革

学制改革

第二章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九年制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第三章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

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第四章 教师

队伍建设

师资管理

第五章 教学研究

教研活动

电化教育

第六章 教育管理

管理机构

教育督导

教育经费

招生

教育设施

重点学校简介

科技篇

- 第一章 科技改革
 - 改革
 - 创先
- 第二章 科技网络
 - 科技组织
- 第三章 科技普及
 - 科普宣传
 - 科技培训
 - 科技示范与服务
- 第四章 成果引进及推广
 - 农业科技
 - 工业科技
- 第五章 科技管理
 - 乡科委、科技文化站
 - 科技成果奖
- 第六章 防震减灾
 - 地震监测
 - 防震宣传
 - 抗震设防
 - 规划、预案编制

文化 体育篇

- 第一章 文化
 -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文艺创作
 - 群众文化
 - 文化市场管理
 - 书画摄影展
 - 市志·年鉴编纂
 - 档案
 - 图书·文物
- 第二章 体育
 - 全民体育
 - 竞技体育
- 第三章 广播电视
 - 广播
 - 电影·电视

卫生篇

- 第一章 改革
 - 机构改革
 - 人事制度改革
 - 管理体制改革
 - 农村合作医疗
- 第二章 卫生机构及队伍
 - 市属医疗机构
 - 乡镇卫生机构
 - 驻市医疗卫生单位
 - 专业队伍建设
 - 医德医风建设
 -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 第三章 卫生管理
 - 临床医疗
 - 医政药政
 - 无偿献血
 - 项目管理
- 第四章 爱国卫生运动
 - “爱国卫生月”活动
 - 农村改水改厕
 - 健康教育
 - 除四害
 - 创建卫生城市
- 第五章 公共卫生
 - 食品卫生
 - 公共场所卫生
 - 学校卫生
- 第六章 疾病预防与控制
 - 计划免疫
 - 传染病防治
 - 地方病防治
- 第七章 妇幼保健
 - 婚产期保健
 - 妇女病防治
 - 儿童保健

民族 宗教篇

- 第一章 民族

(下转第 78 页)

甘肃民国大事记(1935-1936)

民国 24 年(公元 1935 年)

1 月

11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开始办理土地陈报。以皋兰县、康乐设治局为实验区,其他各县,分期推行。

24 日 甘肃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在兰州成立。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庆阳、环县、合水、正宁、宁县 5 县举办保甲制度,以扼制陕甘边苏区。

2 月

5 日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成立,惠子俊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主席。

21 日 谢子长病逝。

是月 国民党当局先后调集 5 个正规师的兵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对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经 4 个月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先后解放陕北 6 座县城,在 20 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 30 多县,使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3 月

是月 陕甘边区合水革命委员会在太白镇成立。9 月解体。

△ 春,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宁县办事处成

立。12 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新宁县委成立(改隶关中特区),宁县办事处撤销。

4 月

11 日 甘肃省佛教会佛学研究会在兰州成立。

是月 班禅额尔德尼九世从宁夏抵兰,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五泉山嘛呢寺设行馆迎接。

△ 国民党当局调胡宗南率部到碧口堵截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并调 49 师、60 师、61 师、中央补充旅,第 2 补充旅等部增援。

△ 陕甘边区宁县荏掌办事处成立。12 月撤销。

5 月

1 日 西兰公路经过 11 年的整修,是日正式开始客货营运班车,全程 704 公里。

16 日 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来兰州视察。

21 日 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甘肃、宁夏、青海监察区监察使署在兰州成立。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奉武昌行营令,征集选送甘肃省乡贤共 30 人,计:贤良类 8 人:赵充国、梁统、廉范、张轨、李晟、权德舆、王蔗、彭泽;武功类 12 人:李广、段会宗、傅介子、甘延寿、皇甫规、张奂、段颖、郭知运、刘琦、吴玠、吴璠、达云;儒行类 2 人:段坚、张国常;忠义类 4 人:段秀实、辛谏、曹友闻、赵率教;文学类 4 人:李梦阳、邢澍、张澍、王权。

△ 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办事处成立,8 月成立正甸彬革命委员会(一说为新正县革

命委员会)时撤销。12月,正旬彬革命委员会改称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中共新正县委员会(改隶关中特区)。

6月

6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共”总司令,驻天水,妄图堵截北上抗日之红25军。

7月

1日 国民党甘肃当局开始实行“三级三审法院组织法”。

是月 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围剿”红军的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调集10多万兵力,向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奋起斗争,8月14日,在吴堡地区歼国民党政府军4个连。20日,又在绥德地区歼国民党政府军1个团。

8月

2日 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之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共3000余人,从陕西双石铺出发,包围两当县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首次进入甘肃境内。3日解放两当县城,11日进占秦安,17日攻占隆德县城。

21日 红25军在泾川以西的四坡村与国民党政府军马鸿宾35师激战。全歼该师104旅208团1000余人,击毙团长马开基。红25军政委吴焕先负伤牺牲。

是月 为堵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朱绍良、张学良等部在西固、岷县一线,天水、陇西一线,会宁、固原一线设立封锁线。

9月

5日 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1军团从四川西北部到达甘肃俄界(今迭部县高吉村)。

7日 红25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今志丹县)豹子川。至此,该军共在甘肃活动35

天,行程1500余公里。

12日 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6日 红25军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17日,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将红25、26、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全军团7000余人。

17日 红1军团2师4团,激战一昼夜,攻克天险腊子口(今迭部县东北),进入甘肃南部。

18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宕昌县哈达铺颁发《回民地区守则》。规定红军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

22日 红1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在哈达铺寻找到载有陕北存在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的国民党报纸,为中央决策长征到陕北提供了重要参考。

△ 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总结红军长征以来的情况,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提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陕北。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军一方面军及中央直属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纵队。全军约7000余人。

27日 红军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是月 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积极执行错误的“肃反”方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逮捕,其中200多人被错杀。

△ 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华池战区委员会成立。

10月

7日 红军陕甘支队突破西兰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19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下旬,至下寺湾与陕北红军15军团胜利会师。中共中央立即制止了陕甘晋省委“肃反”错误的进一步扩大。11月直罗镇战役后,释放了刘志丹等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20日 兰州下东关火药库15时45分爆炸,全城震动。距离在二三华里内房屋被震毁。大火燃烧至次晨4时方息。其中:省立一中、兰州师范、甘肃织呢厂、乡村师范、兰州气象测候所等单位受灾严重。死亡245人,伤394人,倒塌房屋6250余间,毁大车14辆,炸死骡马40余匹,被灾居民1400余户,6085人,损失公私财产(银元)3000万元以上。

11月

2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调职,于学忠继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3日 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和第15两个军团。红一方面军于11月下旬举行了直罗镇战役,歼国民党政府军109师全部和106师1个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4日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新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禁止银币流通,限期兑换法币。9日,兰州通告停止使用银币。

24日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通知甘肃省政府,甘肃省设立之银行所发行各种钞票(流通券)立即停止使用。

2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宣布:商人可以自由到苏区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

28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十大纲领,号召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

蒋斗争。

是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和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陕西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王生玉(后为李生华、马锡五)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陕甘省委成立后即行消失。

12月

6日 甘肃省立医院在兰州成立。有病床60张。

是月 兰州近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成立兰州电灯厂,在萃英门内新装102千瓦发电机1台(俗称西厂)。加上辕门(东厂)原有发电设备,共计162千瓦。

是年

△ 本年10月至第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当局为堵截红军北上抗日,下令赶修甘川、兰秦、天马、定陇、临陇5条公路,全长529.7公里。

△ 商务印书馆兰州支馆成立。经销由该馆出版的各种书籍。

△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通讯室成立,后改名“调统室”(“甘室”)、“联秘处”,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全省共建立组、站台281个,有中统特务6331人。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

2月

是月 国民党政府东北军集结数万人,向陕甘边苏区子午岭一带进犯。

△ 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苏维埃政府所辖地区建立庆华县(不久即改为华池县),并正式成立中共华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 陕甘省华池及关中特区新宁、新正县开展土地改革,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份。

△ 中共党员赵子明到兰州,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身份,开设“兴陇派报社”。

4月

9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就联合抗日进行谈判。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具体协定。

14日 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中弹牺牲。

5月

17日 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宁苏维埃政府。马锡五任主席。6月,省委机关从吴起镇迁至甘肃环县河连湾。

18日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打通同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将全省划为七个行政督察区。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驻在县县长,用以集中其统治权力。计: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临洮(1938年迁岷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平凉;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庆阳西峰镇;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天水;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临夏;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武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酒泉。全省共辖69县,2设治局,人口640.1471万人。

6月

1日 红军西方野战军进入陇东,在环县曲子镇,歼灭国民党政府军马鸿宾部35师一部,俘105旅旅长冶成章。3日,又击溃马鸿宾部8个营,共俘1400余人。解放了曲子、环县及镇原北部的一些地方,扩大根据地纵横700余里。

17日 红军陕甘独立师在环县曲子镇组建。12月,师指挥机关撤销,各团归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指挥。1973年8月,编入八路军359旅。

25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全省,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购献飞机,向各县及各机关摊派

捐款。

是月 曲子、环县建立革命政权,分别成立两县县委和苏维埃政府。

7月

27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是月 甘肃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制定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训办法,各学校增设军训教官。

△ 西北制药厂在兰州成立。生产酒精、硼酸、麻黄素、凡士林等。

8月

5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岷(县)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同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入甘肃迭部县。9日,攻克腊子口。10日,占领哈达铺、大草滩,在岷县二郎山歼国民党政府军鲁大昌部2000余人。

25日 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

26日 庆阳、曲子、环县等地哥老会大爷80余人,在环县河连湾开会。提出“打日本救中国”、“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等口号,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陕甘宁省筹备委员会”。

9月

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

7日 “岷洮西战役”结束。至此,红四方面军先后占领漳县、洮州(今临潭)、渭源、通渭4县。

1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傅钟任书记,下属西路、北路工委。同时成立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何长工为主席;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王维舟任总指挥。8日至10日,在四方面军途经区域还陆续建立了岷县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3个县委和7个县以上地方武装,13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权。这些组织随着红军北上,绝大部分自行消失或遭国民党“清乡”武装的破坏。

13日 红军西方野战军1军团进军至静宁单家集、界石铺以北地区,驻守42天,阻击敌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物资,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在北期间,还建立了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17日 红二方面军发起“徽成两康战役”后,17日攻占成县,18日攻占两当,19日占领徽县、康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甘陕川省委,甘泗淇为书记。并先后建立两当县委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个苏维埃政府。10月红二方面军北上后,这些组织自行消失。

10月

2日 红一方面军15军团一部南下,占领会宁县城。为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良好条件。

5日 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到天水娘娘坝地区,遭国民党政府军伏击。16师师长张辉在激战中牺牲。

7日 红四方面军4军到达会宁城,与一方面军会合,揭开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军司令部先后到达会宁。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中央为庆贺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红军全体指战员致以慰问和祝贺。

18日 国民党政府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令3个军从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给以有力打击后主动后撤。

23日 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在会宁县大梁墩北山战斗中牺牲。

25日 红四方面军5军、9军、30军和直属总队共2.1万余人,于本日开始,奉命先后从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三角城地域西渡黄河,开始了河西走廊的悲壮战斗历程。

27日 红30军89师在景泰吴家川击溃马步青骑兵第5师两个旅。俘虏2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战马70多匹。

是月 赤庆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赤庆县委在元城(今属华池县)成立。1937年7月撤销。

△ 下旬,陕甘宁省党政机关移驻曲子。

11月

1日 红30军在景泰县五佛寺成立河西第一个群众抗日组织——五佛寺抗日促进会,积极配合红军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群众,支援红军。

3日 马步芳以5个旅兵力,向驻守一条山之红30军3个团围攻,激战3昼夜,马部被歼2000余人,副总指挥马廷祥被击毙。红军亦伤亡900多人。此役有“一条山血战”之称。

8日 中共中央批准西渡黄河之红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16日 红9军与马步青部在古浪城下血战三昼夜,毙、伤马部2000余人,红9军也伤亡2400余人。

18日 红军30军89师267.269团及总直骑兵师攻占永昌县城。

19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是日在环县发起山城堡战役,22日战役结束。全歼胡宗南部232旅全部及234旅两个团。是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当局对陕甘根据地进攻。

21日 西路军进驻山丹。

22日 红20军在武威西四十里铺,与马步芳部河西总指挥马元海所率之5个团激战3日,歼敌2400余人。至12月3日,红30军在永昌地区多次激战,共歼敌约6000人,并击落敌机1架。该军亦有较大伤亡。

是月 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统一金融货币,确定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发行之货币为西北解放区之本位币,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之商业流通券为辅币。

△ 张学良由西安飞抵兰州,与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商谈重要国事。

△ 红军大学第三科(又称红大第二校)进驻环县木钵。12月27日,移驻庆阳县,有学员1063名。“七七”事变后,开赴抗日前线。

12月

5日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正式成立。同时成立13个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到1937年3月,西路军还先后建立了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山永县委、高抚县委和山丹、高台、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上述组织随着西路军的失败自行解体。

11日 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赴西安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召开的蒋介石采取“兵谏”的会议,并在张、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上签字。

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影响下,发动“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并通电全国。当日凌晨,国民党甘肃省秘书长周从政、51军参谋长刘忠干接到张学良手令后在兰州响应。指挥所部向驻兰州胡宗南部、驻甘绥靖分署及朱绍良部发动进攻,解除其武装,打死打伤70余人,俘虏1200余人。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绥靖公署总参议张春浦、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等人被扣押,并在兰州公布张、杨“八项政治主张”。

26日,将所俘人员释放。

△ 驻平凉之东北军解除当地宪兵武装,成立人民委员会,宣传抗日主张。随后,进步学生的工人又分别组织起平凉学生联合救国会和平凉工人救国会。

30日 红5军、西路军供给部、妇女独立团攻克临泽县城(今蓼泉乡)。

是月“西安事变”后,马步芳将河西、临夏所有专员、县长、局长驱逐,并以“清共”名义将与东北军有关系之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等杀害。并另派专员、县长。

△ 镇原人慕寿祺(少堂)编撰之《甘宁青史略》正编26卷、副编14卷出版发行。

是年

△ 据甘肃省建设厅统计;截至本年底止,全省有公路总长3140公里,其中标准公路5公里,余皆为土路面。

△ 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兰州分局成立。

(选自《甘肃省志·大事记》)

(上接第45页)和后记内容,充实、完善章下无题小序内容,制作目录。最后形成文字52万字。

4.多渠道搜集书中所需图片,包括领导视察、工作研究、学习培训、介绍经验等图片。共搜集图片800多张(其中,部分原始图片是从兰州市地税局、天水市地税局和白银市地税局档案室选取获得),从中选出299张编辑在彩页中,根据正文中相关内容选择30张插图照片,编辑在正文中。

5.与省史志办积极协调,加快送审步伐。根据局领导加快送审步伐的要求,与省史志办联系、沟通希望提前参加终审的意见,经多次协商同意《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单独送审。

6.总纂全部内容,严把质量关。在续写、总纂之后反复修改,注重史料核查和数据核对,所有记述都有出处,表中数据与文字一致,在基本定稿之前与省局营业税处、所得税处、财产行为税、人事处等处室核对数据、人员和法规等内容,尽量做到

准确无误;在体例上与地方志书条例及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核对,从篇目排序、内容分类等方面进行修改;在文字方面,从规范、准确和流畅方面进行修改。在此基础上,完成省地税局《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编纂委员会审查。

7.积极筹备《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初审会。2011年12月27日,省地税局召开《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初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性忠局长、廖永凯副局长、志书编修人员,省史志办副主任车安宁和省志处主要负责人。省史志办领导对《甘肃省志·税务志》(下册)初稿进行点评,对省地税局修志工作给予肯定,同意通过初审,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形成送审稿报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终审,并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打造精品佳作。

(作者单位:省地方志办公室)

清代以来地方志编纂问题述论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

目前新修《清史》已经展开,编纂《清史·典志》,需要借鉴自古以来志书体裁的编纂经验,其中地方志的编纂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地方志书大致初步定型于宋代,至清代则形成了方志学。清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全盛时期,探讨清代的地方志编纂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把握了中国的传统方志学。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传统方志学得到改造,具有了现代学术的意义,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也是需要总结的。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修地方志,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由于时间接近,更应当借鉴。

一、清代的地方志编纂

清朝政府重视编纂地方志。清廷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就开始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卫周祚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之需,康熙帝采纳后诏令各地设局修志,责成学正检查志书的质量,后来又限期成书。雍正元年(1728),清廷严谕各省县修志。清代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书的传统。清初对于纂修地方志的要求,是既严厉又明确的。

清朝政府对地方志体例体裁有一些明确规定。康熙帝曾将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格式。康熙二十九年,河南巡抚曾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志书,还颁发牌照,提出凡例二十三条,详细规定了时间断限、材料取舍、文字详略、史实考订、叙事先后,以及地图绘制等^①。雍正帝也根据编纂一统志总裁官大学士蒋廷锡等所奏,针对各省志书采录人物事迹一事指出:“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

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调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要求“名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②乾隆帝关心修志事宜,亲自过目进呈的稿本,进行审核。

由于清廷倡导修志,各级政府普遍纂修地方志。省有通志,府、县也无不有志,还有各类其他地方志书。清代一些学者积极地参与了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他们将各自的学术观点带入修志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方志学流派,影响深远。

清代修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到了乾嘉时期在继承历代方志理论研究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方志学。清初学者在方志学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础上,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

志》,综合研究和利用了地方志。他总结前人修志经验,在《莒平二州史事序》提出修志的五项要求:修志者要有一定的学识;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要实地调查研究,反复勘对;要有充裕的时间;文字要通俗易懂^③。康熙时卫周祚根据才、学、识史学三长的说法,在《曲沃县志》序言提出修志亦有正、虚、公三长。所谓“正”,即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所谓“虚”,就是说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集纳众人的意见,不要主观和武断;所谓“公”,就是说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这“三长”实际上就是对修志者提出的“志

德”要求。雍正时学者方苞在《与一统志公馆诸翰林书》中主张修志务必体例统一,反复校勘,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1]。乾嘉时期,志家辈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以钱大昕、戴震、毕源、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据学派,视地方志为地理沿革考证,他们“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以水系辨山脉,以山水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运用考证方法突出。因此这些学者被认为是考据学派,由于重视地理与资料,又被称为地理学派、纂辑学派。与考据学派相对立的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该学派强调对各类资料分析概括,以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比类纂辑文献,所以又称为撰著派^[2]。

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对方志学贡献最大。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小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任国子监典籍。章氏一生未入仕途,前后主讲于多所书院,毕生治史、修志。他对志书的性质、源流、体例、编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形成了较完整、系统的方志理论,使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首先,关于方志的性质。章学诚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章学诚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4]。在《报黄大俞先生书》提出对于方志的见解:“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家言,正著述之所资取……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襃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地理专门自画,不知方志之为史裁,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资。”^[5]“志乃史体”,“志之为体,当详于史。”^[6]他将方志作为历史与地理书的性质区别开来。章学诚既认为志属于史,也将“志体”与“史体”有所区分。他认为志乘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合典章,包函甚广。……志为史体,其中引用成文”。“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合一也”。^[7]他在《湖北通志辨例》中指出:“凡史志诸书分体,有以一字名

者:纪、表、志、传、谱、略、图、考之类是也。有以二字名者,本纪、年表、世家、列传之类是也。”^[8]将方志的性质定义为历史学的范畴,在此范围内对志与史加以区分。

其次,关于方志的体例。由于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基点为“志属信史”,所以他认为:“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9]他创立完整的志书体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认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作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10]。“三书”之中,“志”为主体。并为“志”设立了纪、谱、考、传四体结构,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11]。章学诚所设计的所谓“四体”,在他所修志书当中,也有所发展和改易。如他所纂的《湖北通志》,即分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六体。考据学派与史志学派争论的焦点,是地理沿革与地方文献孰重孰轻问题。乾隆三十八年夏,考据学派代表人物戴震主讲浙东金华书院时,在宁波道署曾经会见章学诚,双方议论史事多有不合,及见到章学诚撰的《和州志例》,遂引起双方对志书重沿革抑或重地方文献之争。对于此次论争,后来章学诚追记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他还提倡志书设立“丛谈”以作附录,并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解释说:“此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也。既约取矣,博览所余,阙人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12]章学诚提出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标志着章氏方志理论的成熟。章氏的“三书”性质与功用各不相同。因此,编纂方法也当有所区别。对此,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凡例》中,还对“三书”性质与功用作了很好的说明,称:“志者志也,简明典雅,欲其可以诵而识也。删繁去猥,简帙不欲繁重。簿书案牘之详,自有掌故专书;各体诗文,自有文征专书。志则出古国史,抉择去取,自当师法史裁,不敢徇耳目玩好也。”^[13]

再次,志书编纂方法。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全部志书编修工作概括为:“乘二便,

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三长”主要是对方志编修人员提出的要求。章学诚极力反对文人参加修志,主张要由具有一定史学修养的人来纂修志书,并已应具有“识、明、公”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二便”为志书编修工作中的二个客观便利条件,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五难”系指编修志书的五个难题。即“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八忌”系指志书编修要:“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化,忌贪载传奇。”“四体”是指“志”应包括纪、谱、考、传四体,相辅为用。“四要”即志书“要简,要严,要核,要雅”。此外,他还要求参与修志人员,不仅要有具体分工,而且应有各自的专责。“提调专主,决断事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17]

又次,方志辨体。章学诚认为:“今之通志,与府州县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无。书苟可互相有无,即不成其为书矣。”^[18]强调通志及府州县志应各有各的义例,不容混杂。

戴震(1723—1777)是清乾隆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皖派考据学的开创人。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三十八年特诏纂修《四库全书》,任翰林院庶吉士。他主纂或审定多部志书,其方志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重视考据地理沿革。如在《应州续志序》中认为,志之失,在于“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载,或载之又漫无据证”。提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在《乾隆汾州府志例言》中还说:“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疆域辞而山川乃可得而记”。戴氏主张编纂志书当重沿革,并应作出详尽考证,以求无误,所以后世视戴震为考据学派、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在《乾隆汾州府志例言》中还反对方志记载“绘图星象,录步天歌”,主张去掉各州县所谓八景、十景,以还雅。不录逸事异闻。风俗物产“无取乎泛常琐滥”。艺文者“以古今为先后,不区别文体。……所有奏疏、论著于地无关者,例不当录。官斯土者及今在任一切士民颂美之辞,事涉导

谏,亦例不当录”。反映了戴氏严谨求实的方志编纂思想。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于历史地理造诣尤深,参与编纂多部地方志,也是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洪亮吉认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19]。他的《新修澄城县志序》认为宋以后州县志书:“舍地理而滥征名宿,略方域而博采词,有去本求末,流荡忘归者焉。”洪亮吉主张方志言必有据。在《任县志序》中说:“盖撰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采旁稽,义归二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他在《淳化县志·叙录》中亦言:“于为此志,准昔贤,非苟求立异,实欲借兹成规示诸来祀。”所拟方志体例援引古法,主张师古。洪氏所修《淳化县志》征引书广博,引文必注出处。引文之后有“亮吉按”,或纠正旧籍之误,或依据作出论断,以求记载可信。他纂修《澄城县志》时也于“建置者并繁简,统辖城郭、镇堡、寺庙、倾宇,又均采自十七史地理志及诸地理书,皆一间者始以旧志,参州志、通志补之,而传闻之未信,方册之准凭者,成无取焉”。洪氏主张志书事必有据,以成一代信史。对方志编纂,强调志书详简适度,要以载籍收录为准。他在《任县志序》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这种观点反映了洪氏“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的思想。

孙星衍(1753—1818)一生曾参与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并与洪亮吉共同编纂《澄城县志》。孙星衍,字渊如,也是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他在《邠州志序》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认为:“夫山川、城阙、河渠、关隘、金石、名迹所存,逾古逾不可废,必得博闻强识之士订正之。若新志所增职官、科举、财赋额程之属,胥吏之有文者皆能为之。”孙氏所纂诸志皆注重资料的考据工作。孙星衍与洪亮吉的“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的修志主张类似,强调后世修志当依旧例续修。他在《重刻景定建康志后序》中说:“蒙谓一方

修志,如有宋元旧本,自宜刊刻原书在前,依例增续,或辨证人之得失,别为一卷。近时作志,动更旧例,删落古人牌版,引书出处,增以流俗传闻、芜秽诗什为不典。”他的《重刊云间志序》也指出:“余病今世修志,无著作好手,不如刻古志于前,以后来事迹续之。或山川古迹旧有遗漏舛误者,不仿别为考证一卷。”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著有《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历代地理志韵编今译》、《历代舆地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等地理书,并先后主修或编纂有凤台、东流、怀远、江阴诸县志及《武进阳湖合志》等志书。李兆洛在《嘉庆东流县志序》认为:“志尚征实,所以传信,一事一语,必据其所自来。”又在《跋咸淳毗陵志》指出:“前代郡邑之志存于今者,推宋人之书耳。类皆义例整赡、考证赅洽,识议深慎。”以考据的好坏,作为衡量方志质量的标准。他所编的志书以考据精核见长。如《凤台县志》每篇大致有本文、注释(双行)、出处、按语。《东流县志》也是记载一语一事,必有所本。李兆洛认为方志的编修直接关乎地方的吏治。在《凤台县志序》中说:“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谣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

朱士嘉将考据学派特点概括为四条:第一,修志者当无语不出于人,详注出处,以资取信;第二,“贵因不贵创”;第三,“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第四,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20]。基本上反映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方志编纂理论。由于考据学派强调与重视志书资料的考据工作,旁征博引,详加按语,标明出处,所以有人又称考据学派为纂辑派,所纂志书为纂辑体志书。这类志书较多地保存了原始资料,史料价值较大,但也显得“芜杂”。中国古代有关地理的学问,一直隶属于史学。清代考据学的兴盛,遂为方志学界考据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学术基础和客观条件。总之,清代是中国传统方志学的集大成时期。

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

民国时期一批方志学专著的问世,使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我们拟分方志学理论专著与论文加以论述。

(一)代表性的方志学理论专著

1.李泰棻著《方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共分为通论、旧志之择评、章学诚之方志义例、章学诚之义例驳议、修志之辅助学识、余对方志内容之三增、余对方志内容之拟目及序列、修志之先决问题、方志之资料、资料之选集法、记录资料之鉴定法、记录以外资料之鉴定法、记录资料之整理方法、记录资料以外之整理法14章。

《方志学》是我国首以“方志学”定名的专著。李泰棻指出,“方志与史相同,仅属范围稍异”。他受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修志者应具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语言学、谱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等学科知识,在传统方志学领域引进现代社会科学。

李氏高度评价方志的学术价值:“各地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其一也;历朝人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当时无人正史之资格,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其二也;遗文佚事,赖方志以存甚多,其三也;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中,其四也;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其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字之遗缺者,其六也;氏族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他史互证,其七也。”

李氏提出,志书“应增记录以前之史实”,即增加史前时代的内容,以反映人类之进化;“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提倡“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工商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要求分列政府历年苛捐杂税,以反映民穷与农村破产的社会现实;“应增贫富富绅之事实”,主张善恶并录。这三项主张中,强调志书应以社会经济为主干,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想。

李泰棻针对章学诚的志书“四体”,主张“志分多体之不必”。

该书最后六章,介绍了资料的种类、搜集、鉴

别、整理的方法,可以说也为历代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全新之作。

2.傅振伦著《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为方志之意义及范围、方志在学术上之位置、过去之方志界(上、中、下)、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方志之撰述等8篇。

傅振伦指出:“方志为记叙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认为方志具载事周悉完备、记事亲切可信、志材多平民化、志材甚为珍贵。同时指出历代方志有十项通病:“取材无当,旨趣乖僻;因习模拟,书多雷同;剽窃拼凑,无异类书;割裂诸志,无所断制;片断记载,几不成书;门类琐碎,意义浮泛;载文记事,猥改意见烦不典;叙述无谓,立论可厌;逐于景物,不求实际;官家修志,失之简陋。”

作者重视系统利用方志,认为应编辑方志汇目及统计表、方志篇目索引、方志提要、方志别录等。他还详细介绍了方志的撰写、组织、经费、资料搜集、鉴定、义例等。

3.甘鹏云撰《方志商》,崇雅堂1938年聚珍版。全书二卷:上卷为《湖北通志义例书》、《复李甥晓垣书》,下卷为《修志答问》(又名《修志刍言》)、《湖北通志凡例》。该书系撰者参与编修《湖北通志》的经验总结。他主张方志为一方之史,应合文献、政治、社会为一书。认为方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甘氏将修通志工作分为五步:第一步是省县志同时修纂,互为所用,县志为省志取材,通志馆指导县志编纂;第二步为制定通志凡例;第三步为定标目;第四步为依一定条例、格式,派员采访;第五步为征求书籍。

4.黎锦熙著《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该书以《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全书分建议因缘、先明三术、次立两标、次广四用、终破四障、结前原则、县志拟目、纂修总例、材料来源、总结全文10部份。

黎锦熙认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他编修方志的理论主要包括:(1)明三术。即修志应先明“续、补、创”三术,续是指旧制已革除或仍需庚续者,革者存其旧,续者接其新;补是指除新获材料应补入外,对于旧者阙遗、舛误之处,

亦应采访旧籍新著补入;创是指旧志所无的新增事类。(2)立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3)广四用。即方志可作“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南”,以符合时代需要。该主张对于提高方志的科学价值及方志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积极的作用。(4)破四障。指志书编修要“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类不关文”是针对章学诚提出的“志”应分记、谱、考、传四体而发,认为章氏之说有种种不便。主张“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类者事类,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文不拘体”是言:“某类中之文体,既一随其事之宜,图可也,表可也,谱或考以及其他皆可以;且一类之中,有时众体成备亦无不可,且属必要也。”“叙事不立断限”是指志书记事不宜上一总断限。“出版不必全书”是指志书撰写,“无论何类,一俟定稿,即力即行;不列卷次,但标其名曰某县某志。”“造及单行分志,先后出齐,依目排定,汇为一书,总序、例目,并诸卷端,便成全帙。”破四障以实用性为纂志主旨,对旧志重体例形式、轻视内容实质进行了改革^[4]。

黎氏所拟县志目为: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司法志、教育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后附本县文征、本县丛录。从门类设置到类目的标题,突出时代要求,具有创新精神。

5.寿鹏飞著《方志通义》,1941年出版。全书通论了方志定义、义例、编纂等问题。

寿鹏飞主张“志乘,为郡邑正史”,认为“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乱兴衰之故,志以补郡国利弊之书”。他强调志义当重于志例,认为“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勿染官气,……务在有俾地方风俗民生”。相对于传统方志编纂理论,这种主张是一个进步。

6.吴宗慈撰《方志丛论》,1947年版。全书辑录吴氏关于修志的诸论34篇、编纂方案2篇、例目

1篇、编纂原则1篇。

吴宗慈说：“正史二千年来之记载，只有国家而无社会。然则方志之所重者，诚有超乎正史之上者”，肯定地方志的特殊价值。他认为“修方志者，固不妨先就荦荦大端，定其轨范，再适用随文起例之方法，则义无余蕴，例亦周瞻而无憾焉”。

吴宗慈论志强调志书的实用价值，认为“若今日则方志所重在实学，乃为一切民族社会经济与科学问题”。对于志书的语言文字，不失简洁之旨。

吴宗慈还提出建立全国各级方志资料库的设想，主张：中央内政部设全国方志资料库；各省民政厅设全省方志资料室；各县设方志资料分室。县内大事“概应随时记录，缮成三份，县有其一，缴省总室者二，于是省有其一，转缴中央部库者一。如此办法，在当时仅略需缮写之劳，于日后即成文献之汇。比起清代章学诚提出的设志科建议，这种见解又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王葆心所撰的《方志学发微》全稿虽未及刊，但所论取材、纂校、导源、派别、反变、赅续、义例七篇，较为系统。

（二）代表性的方志理论论文

除了上述专著外，民国时期的一些刊物，也刊载了不少，重要的如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较为系统地清理了清代的方志学成就。他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自宋以后，会萃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徵组织属各体，成为方志。清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梁启超认为方志可弥补旧史只注重中央政府之不足，欲以方志记载“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而了解“社会之真相”^[23]。梁启超给予方志学及章学诚以很高的学术地位，反映出新史学的思想。

邓之诚在民国初年社会转型时期，继承传统，吸收新学，探讨新的地方志体例。他认为：“志之为体，罗列新旧，本于求详。若新旧互有详略，则不妨相为附庸。若新旧并重，则亦不嫌分立门户。”他还指出：“志者无他，作者便于纂述，而读者寻辑而已。图表志传之体，千古不废，唯增创通纪一类。图

以明之，表以系之，纪以通之，志以详之，传以记之，不尽者归于余录。”^[23]他在传统图表志传的历史编纂形式之外，“增创通纪”，可谓史志合一。不过他也说这是借鉴他人：“金陵通志，创通纪一门，振纲挈领，今古毕呈……夫史之纪乎朝，则方志之纪宜系乎地。”^[24]可见金陵通志的通纪属于通史，邓之诚主张地方志借鉴记载朝政的“史之纪”编纂方法，记载地方上的“通史”。关于通纪，民国人王褒心认为是大事记。他指出：“方志冠以编年之大事记，始于宋高似孙《剡录》之‘县纪年’及元张用鼎《金陵新志》，则名曰‘通纪’。”^[25]王褒心还推断顾炎武《菑平二州史事》属于大事记。具体来看，邓先生设计的地方志（省志），除通纪外有如下篇目：图，有沿革总图，气候物产图，省总图，县分图，坊市图，村镇图，交通图，胜迹图；表，有沿革表，职官表，登庸表（制举、科举、辟荐、考试），封建表，人物表（名贤、列女），学制表，户口表，商务表；志，有地理志，河渠志，经政志，武备志，教育志，实业志，交通志，艺文志，金石志；传，有列传（以本籍流寓为次），人物，列女；录，有轶事，灾祥。邓先生设计的地方志，在地方志编纂学上应有一席之地。

民国时期，法政大学教授余绍宋编纂家乡的《龙游县志》（1925年修），于方志体例有所创新。该志体例，“意在规仿史裁”分正志、附志。正志略拟正史，分纪（名通纪）、考（分为地理、氏族、建置、食货、艺文）、表（分为都图、职官、选举）、传（分人物、列女）四类。附志之一为丛载，包括古迹寺观、前人轶事、怪异；之二是掌故，载册籍公牘；之三系文征，收录诗文。《龙游县志》显然吸收了纪传体与章学诚方志体例。特别是他改造了正史本纪，设置通纪。他指出：“正史本纪，效法《春秋》，记载大事，所以为全书之经（志、表、传悉为纬），非尽出于尊崇皇帝也。历来方志家，狃于地理类书之例，不措意于一地方之大事，又习于忌讳，不敢作纪，遂使全书记载散漫，无所统系，甚有乖于史裁。……兹篇意在为考、表、传之经，故专重一县之大事，汇而纪之，使二千年来情事，萃于一帙。不惟全书若网在纲，亦足为知人论世之助。”^[26]余绍宋的通纪，是“专重一县之大事”的通史，并试图发挥知人论世

的作用。余绍宋的《龙游县志》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梁启超为之作序,甚至说:“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余绍宋的字)书较。”梁启超《龙游县志序》也高度评价方志的学术价值说:“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曷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录焉。”^[27]

瞿宣颖于1930年在南开大学开设方志学,后成《志例丛话》长文,分通论、方法、地理、建置、古迹、经济、社会、风俗、人物、氏族、通纪、丛录、讥贬、杂录等14门,综论方志的源流、性质、内容、体例,并指出旧志的缺点。他反对“方志为兼具地理、历史两性之书”的提法,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而已”。瞿氏极为重视资料的搜集与保存,认为:“严格论之,今日修志尚非急事,取章氏立志科之说而历行之,乃真刻不容缓之事耳”。他对于志书的简洁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文之简洁之否,不系于其量之多寡,更不系于鲜之丰啬。苟无条理,则事虽俭,字虽约,其不能简洁犹是也。苟具条理,则虽枝流万派,朝宗于海,起讫分明,必愈形其简洁。”瞿宣颖认为:“方志中所蕴藏至富,爬梳而出之,必有可观。”并从事辑录方志中各类资料的工作。他还主张“以照片入志,可祛漫用不正确之弊”。^[28]

前述邓之诚、余绍宋继承前贤,创新通纪。此外,瞿宣颖也主张方志设立通纪,他说:“地方之大事,宜汇通为纪以尽其变,不得仅于大事年表叙寥寥数语,亦不宜散置列传中,使读者难于捉摸。盖一邑之事未必为众所周知,非特笔综录之,无由著也。”他还说,章学诚《湖北通志》创《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等,是“于纪传体中兼寓纪事本末体,使因人而及事,穷原而竟委,固良法也。”^[29]实际上,瞿宣颖是在主张通纪用纪事本末体,比起前人通纪用编年体与大事记,更前进了一步,属于新看法。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方志理论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

首先,系统整理和研究了清代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民国时期出版的方志学研究力推章学诚为我国方志学的奠基者,专著大都专章论述章学诚方志学。张树棻还于1934年整理出版了《章实斋方志论文集》,辑录章氏有关方志论述。张树棻序言称章学诚是成方志一家之学说的第一人。民国时期方志学家也对章氏理论进行了批评。如李泰棻、黎锦熙对章氏“志”分“四体”,吴宗慈对章氏“实学”,都有自己的看法。方志学理论研究得到长足进展。

其次,高度重视方志的学术价值。方志在传统时代没有的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探讨方志学术价值的。民国时期,方志的科学价值引起了学者的普遍注意,并予以客观的评价与介绍。如李泰棻、梁启超等人有所论述,瞿宣颖辑录方志社会生活资料,以示方志的价值,并说:“方志中所蕴藏至富,爬梳而出之,必有可观。”^[30]因此民国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对方志的利用与整理,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

再次,强调以社会经济为方志撰修的主干。相对而言,重人文而轻社会经济是旧志不足之一。民国志家主张志书应增加有关国计民生内容,尤其是李泰棻、寿鹏飞都有很好地论述,影响了当代志书的编纂。

最后,采用科学方法编修志书。即在内容分类及类目命名上反映时代变化,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方法。如民国十八年(1929)内政部颁行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确规定:“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31],强调志书编修应采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

清末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变化,特别是近代史学的确立,方志学理论也得以现代化。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地方志编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20多年的实践,取得很多共识,形成了地方志编纂的一些基本原则。下面对修

志的基本原则以及地方志分志的编纂等问题作一论述。

(一)关于史书与方志的异同

不少方志学者强调志与史两者的特点与区别。他们认为,志与史首先是编写形式不同。史体主要记述历史,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为线索,倾向于纵向的发展,论述是史书的主体。而志体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志体有时也追溯过去,但主要的是记载现状,分门别类地横向记载事物,不加论述。其次是门类广狭不同。史体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核心,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线。志体重在资料收集,平列叙事,并无明显的特定轴心。再次,内容详略不同。史的范围较专、较约,志的范围则较广、较博。又次,成书方法不同。史主要依据文献论述,志则依靠调查采访,积累资料,详今略古。史可由一人或数人写成,而志则须各行各业共同来完成。还有,志是当代人写的,史是后代人写的。

来新夏先生讨论了史与志的关系,他不同意“史纵志横”、“史为史观志为志实”、“史有褒贬志无褒贬”的说法,认为人们对事物没有褒贬是不可能的;史与志是同源异体、殊途同归与相辅相成的关系;志书包含史裁,史裁包含志体。编志应本着“志经史纬”的观点,把史、志的特点结合起来,诸体并用,集众之长^[2]。

(二)关于方志的体裁、体例

体例是著作内容的表现形式,特定的内容要求特定的形式。方志是一方的资料性“百科全书”。这一特定的内容要求并决定了志书必须具有的体例。

古代史书体例都是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论述往事,侧重于从纵的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性,它的结构是一条线。而“志体”侧重于从横的方面来表现各种事物的广泛性,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志体的结构像一个共同横断面。方志的总体结构之下,各个部分也存在一个局部结构安排问题。如大事记,是采用编年体,还是采用纪事本末体,抑或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结合体,都须精心安排。各专志,是先分期后分类,还是先分门别类,后依时顺叙,其结构是迥然不同的。一般新编地方志,是

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志、附录五部分组成,卷首加序和凡例,卷末附跋。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专志为纬,形成总体基本结构。各专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结构上受其制约。

新方志的体裁,在旧志体例的基础上,形成了述、记、志、传、图、表、考、录等。各有专用,以志为主。述,指简述、概述或总述。即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地纵述本志所述范围的历史发展之大势,横陈现状的最基本情况。记,用于大事记,以时系事。志,采用记事本末体横排纵述各项事业及其各个侧面的内容。传,专门用于写人物。图,各种地图、图片、照片、统计图、分布图、示意图等。表,各种表格。考,所载资料的考证。录,附录、丛录,系资料辑存。

志书的章法一是重在记述,叙而不论(或曰:依事直叙,述而不作);二是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竖写,要求以时为序,纵述始末,是编纂方志的基本要求。一般将记述内容分解到某一事物,据实立目,纵向记述。从事物的发生、发展以及转折变化,一直写到现状,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史实。竖写要做到记事的完整性。不过仓修良先生认为:“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不是方志有别于史体的特点,因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除编年体以外,无一不是“横排门类”。“当然,用它来区别近代出现的新的史体的编纂形式和方法还是有它一定作用的。总之,专业志的编写,还是提倡以类相从,按类编写比较合适。”^[3]

新方志的文体使用语体文,记叙体。也有人主张在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基础上,也不妨略带点文言成分,使其简洁而又有文采;也可约略吸收一点地方性语言,使志书更有个性。记叙,就是把事物的特点,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记录、表述。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是记叙文体的六大要素。志书一般将是非、褒贬等等寓于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不妄加评论。志书的文体既不同于文艺文体、议论文体、公文文体、教科书文体、新闻文体,也和一般历史著述即所谓史体有某些差异。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

的规定》第十五条：“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新志书的文风要严谨准确、要简明精炼、要朴实、要流畅。

(三)关于概述与小序

概述,即用极简洁的语言概括记述。可分为总述、综述、概述、绪言、序、小序等几种,均冠以卷、编、章、节之首。

概述在志书中所起作用,大体有浓缩、提要、统摄全书的纲领三种说法。概述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各类,统摄全志,揭示因果。“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是志书的原则^[34],设置若干篇,分别记述各类事物,不可能充分反映各类间的联系。志书体例,横排竖写,分类横排后的篇、章、节、目是同一个层次的平列关系,各自独立,以时纵述各事、各业兴衰的变化,无法反映事物的全貌。概述用简洁的语言,沟通各类间的内在联系,述其大要,把志书内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示相互联系的发展运动、趋势及其规律,彰显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志书篇幅较大,概述也可为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各类事物的大势大略、特点提供方便。关于概述的设置问题,方志学界是在不断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的^[35]。

概述叙议结合,所选的内容一般应有本地、本业现实状况的全面陈述,帮助读者了解和分析本地、本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从中找出特点,从“志”中精选本地、本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典型事件,使其与志内各章、节或条目组成经纬交织的立体结构。

概述的编写方式有:一是纵述式,按时间顺序纵述一地、一业兴衰起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二是总体论述式,先扼要纵述一地、一业发展之大势大要,然后归纳其特点,或经验教训;或先扼要综述本地、本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然后重点记述地方特色或行业特色。

编写概述应注意:概述与概况的不同,要论之有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篇幅要适度。

小序,位于分志(专志)之首。它一般成于志后,只有在撰写完某志之后,对事物有了深刻的规律性认识,方可动笔。小序起到通晓全局、统摄全志的作

用。方志界写小序大致有五种方法:纵述沿革、横陈现状,概述整体、展现形势,面中有点、提示特色,前后对比、反映变化,略述源流、承上启下^[36]。小序常见形式,或可归纳为概述式、综合式、沿革式、提示式、引言式。撰写小序应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考虑是否设置。

(四)关于分志

志书的体裁由记、志、传、表、图诸体构成,其中志为主体,由分门别类专门记载某一方面或某一范围内事物的各个分志组成。一部志书除概述、大事记、人物传、附录之外,其余部份都可称为分志(或称分志为专志)。分志为全志的主体。1985年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9条称:“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志书主体,图表可分别附在各类之中。”直接指出了志体在全志中的主体地位。分志成为新志的主体,是区别新、旧志书的一个重要标志。旧志重人文而轻自然、经济,往往人物传成为志书主体,明清旧志人物传往往占全志篇幅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现在新志的分志部份一般都占全志篇幅的三分之二左右。分志也是为全志之纬。志书概述总摄全志,纵横结合,门类交叉;大事记依时记事,通贯全志,成为全志之经;而分志则分门别类,横排竖写,形成了以横断面为主体的专题记述,从而成为全志之纬。记体“包举大端”,成为全志之经,但文简难详事理,而志体分门别类地记述一地各方之事的发展变化,内容包罗万象。方志学界对分志的讨论,形成了普遍性的共识^[37]。

分志的类别。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社会等六大部类^[38]。

分志的体例。分志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不设章节,只按历史时期记述。这类分志目前极为少见,仅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所编的新志之中,有些志书采用了这种形式。二是先分期,后分类。这样划分的结果,各分志的内容就分别被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之内,材料分割零散,使人难得全貌。志书首先按历史分期来安排材料,然后再分类记述,其结果就把一些历史连续性较强,并且有其自身特殊发展规律的事物强行肢解了,而

且门类重叠,层次混乱,类目标题也大多雷同。另外,这类志书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多是依据社会性质,或重大历史事件来作为分期依据的,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是反映一地各项事业自身发展过程的自然分期,同时这种类型志书不便于读者检索利用。三是先分类,后分期。这类分志的特点是在横排门类的基础上,再按历史时期进一步细分。志书采用这种编排形式并不多见,主要是用于某些分志,或分志中的某些篇章。先分类、后分期式分志类型,对记述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差异较大、或有本质区别的事类还可采用。但是对那些前后联系紧密,或不宜分叙的事类来说,这种形式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比如记民俗、民风、民间艺术等历史悠久的文化活动,也不宜腰斩为几块。分志先分类,后按历史时期记述,很容易使分志成为专业史,也不符合志体要求,起码不宜过多采用,四是横排门类,依类记述。即按事物性质分项依类记述的方法。事以类从,根据客观事物的原有系统去记述其全貌和发展的始终,这样不仅避免了用历史分期机械剪裁分志内容的弊端,而且也保持了志体的形式。

分志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地方事业发展的客观条件,包括自然因素、人口因素和物质因素;地方事业发展的历史,分志记事虽以现状为主,但是不能不述事业发展的历史。记载事业的发展史,要说清事业发展的基本道路和事业发展变化脉络;地方事业现状,追溯历史是为了说明现状,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于今后有所借鉴;地方事业的发展规律,分志不仅要记述地方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记述地方各项事业兴衰的原因和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物事迹,这种记载不同于人物传,它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事件为重点,因事叙人。也就是说分志记人,它不同于人物传,不是一个人物生平的完整记录。

分志的编写。一是限定分志记述范围的,即分志编写要限定地域范围与专业范围。二是分志的设置应根据一地自然、社会的实际,按照以类系事,类为一志的原则来确立,既不能设志过多,又

不能设志太少。设志过多会加重各分志之间的交叉重复,又会分割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志书整体显得支离破碎。设志过少则会造成分志篇幅过大,反映不全面。三是分志的横排问题,即如何去分门别类地记事。一种主张分志的横排要贯彻到分志篇目的各个层次,也就是说要“横排到底”。横排形式可以按事类列,按业务内容排列,按科学分类排列,不提倡大类里套小时期。另一种意见主张横排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那些建国前后事类相差较大或有本质区别的事物,可考虑采用划分历史时期的记述形式。不过,作为一部志书的各个分志,或分类、或分期,总体观感不协调。应尽可能注意到总体形式的协调与统一,至少分期记述形式不宜采用过多。

分志和部门志的异同。部门志是以单位或部门的业务或职能为主体,综述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部门志与分志两者之间的区划与界限表现在:记述范围的不同。分志是以事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记述主体的,收录内容只考虑事物的事业特征,而不考虑其行政所属问题。而部门志记事是以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为主体结构的,是以事物的行政隶属关系为主要标志的。分志内容比较单一,独成一类,而部门志内容就比较综合,是多类事物并存。其次体裁形式不同。分志的体裁属于“志体”,虽有些分志之首也设有“综述”、“概况”章节,但这与全志之首的概述有所不同,仍属于志体范围。分志前设置综述、概况,重点在概括分志内容大略,点明其特点,介绍某项事业各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并没有脱离开对志体的要求。部门志则可以述、记、志、传诸体并用,除记述内容比较专项之外,和一般志书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是独立的志书。再者功用也不同。分志只记载某一方面专业内容,内容与体裁形式都比较单一,是一部志书的有机组成部份。而部门志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仅内容与体裁都比较综合,而且反映的是一个部门的全貌,各种体裁一齐备,可以独立成书。

(五)关于资料整理与长编

修志离不开大量的资料,资料整理是修志的

重要环节。修志中的资料整理工作,一般的理论依据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做资料长编的方法。但是,对于什么是长编,如何整理资料,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关于什么是长编。有的人认为长编是资料汇编。如朱文尧认为:“整理资料是以资料为对象,按照篇目,结合资料本身时序、因果或沿革的关系,而排比成为资料汇编,这是整理资料的主要形式。……整理资料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编纂的方法,而不宜采用撰著体的方法。”^[1]这样可以避免失去资料的原始性,避免“失真”。他认为整理资料的工作主要是排比、鉴别、搜索。也有人认为长编是形成志稿之前的成型胚胎。如黄子良指出:资料长编,亦称长编,是指准备删订成书的历史资料的编排汇编。通常的叫法,是略去长编前的资料二字,而冠之以书名或资料的主题词名,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方志长编是在志书编写之前,把已收集齐备的分散资料,按照志书最后确定的篇目要求,进行筛选、编排、鉴定、整理而成的初步稿本。即使是专题资料,也只是把分散的资料稍加整理,不是按照成书的整体要求而系统化了的资料长编。“长编不同于汇编,汇编是按简单的平列分类方法编在一起的完整的或节选的文章和文件,不是按照一定篇目要求资料进行多层次分类整理而成体系的长编。长编不同于志稿,它是形成志稿之前的成型胚胎,而志稿则是对这个胚胎进行雕琢而成的待定书稿。”^[2]曹宪庸不同意资料长编是志书的毛坯、雏形、初稿这些说法,认为资料长编“是按照志书篇目的要求,把搜集到的各种原始资料,经过筛选、整理、考订、汇集成册的资料汇编。”^[3]

如何整理资料长编。黄力扬提出的程序是:检查并修定篇目,紧扣篇目、按专题进行整理,通读资料、弄清脉络,筛选资料、决定取舍,摘抄资料、制作卡片,鉴别资料、核实资料,排列、组合资料、形成长编^[4]。程树棠总结的工作程序是:梳理资料,修订篇目,排列资料,写出文序(是编写节、目资料长编的大纲提要,也是编写节、目志稿的骨架),长编试写(一般多将资料长编整成编辑型、纂辑型,也有的将资料长编整成撰述型),长编处理,

收尾整理^[5]。关于资料长编整成编辑型、纂辑型、撰述型,傅能华也有所论述。

目前新修《清史》,典志篇幅约占全书34%,比重很大,而且增加了很多反映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志目。《清史·典志》的修纂首先应当借鉴传统历史编撰学中“国史”书志与政书典志的编纂方法,此外,清代以来地方志的编修经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9—10页。

[2] 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11页。

[3] 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史志文萃》编辑部出版,1986年,第2页。

[4] 同上,第5页。

[5] 关于两派的争论,请参见青坨山人(王葆心)撰《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第117—137页。

[6] 《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重印本,第293页。

[7] 章学诚:《记与戴本原论修志》,《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1页。

[8] 《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10页。

[9]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6页。

[10]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38—39、42页。

[1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七《通志检稿四》;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254页。

[12] 章学诚:《与石首王名府论志例》,《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23页。

[13]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11页。

[14] 章学诚:《修志十议》,《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47页。

[15]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17页。

[16] 《章氏遗书》卷二十四《通志检存稿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199页。

[17] 章学诚:《修志十议》,《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47页。

[18] 章学诚:《方志辨体》,《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一》;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第2页。

[19]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三。

[20] 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文史知识》1983年3、4期。

[21] 以上可见黎锦熙《方志今议序例》,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第231—244页。

[2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298—314页。

[23] 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地学杂志》9卷第1—6期,转自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75、76页。

[24] 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地学杂志》9卷第1—6期,转自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76页。

[25] 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第3页。

[26] 余绍宋:《龙游县志叙例》,转自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88—89页。

[27] 梁启超:《龙游县志序》,转自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83页。

[28] 瞿宣颖:《志例丛话》,原刊《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转自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第192—225页。

[29] 瞿宣颖:《志例丛话》,转自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第217页。

[30] 瞿宣颖:《读方志琐记》,《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31] 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125—126页。

[32]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5—216页。

[33]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

年,第631—632页;又关于体例的讨论,可以参见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229、237、263页。

[34] 1987年“全国省志篇目讨论会纪要”指出:“按照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根据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目,是目前全国大多数省志篇目所采用的形式。它的特点是眉目清楚、条理分明、结构严谨,便于减少虚设的层次,领属关系容易处理,有利于记述微观资料和突出地方特点,特别是有利于记述微观资料和突出地方特点。”见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384—385页。

[35] 参见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237、257页。

[36] 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412页。

[37] 参见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第274—275页。

[38] 参见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382—388页。

[39]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第2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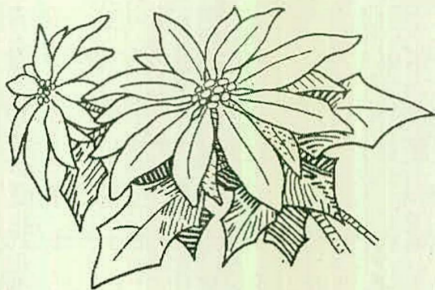
[40]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第303页。

[41]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第304页。

[42]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第307—309页。

[43]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第316—317页。

(本文由中华文史网首发,执笔人:常建华,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静仁心系家乡二三事

周学海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回族革命家杨静仁同志已经逝世 10 年了，但他老人家在家乡榆中、兰州生活战斗和关心家乡的感人事迹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今在当地传颂着，人们深深的怀念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终生的卓越领导人。

朱家沟的童年生活

在风景秀丽的兴隆山下，坐落着一个回族聚居的村庄——榆中县连搭乡朱家沟村，这里不仅是已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回族革命家杨静仁的故乡，是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长地，而且是他青年时代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之一。

杨静仁的先辈们世代生活在朱家沟村，爷爷辈在村上已置有几十亩田地，他的伯父、伯母在家务农，父亲在兰州做了伊斯兰教的一名阿訇。1918 年 9 月 17 日，杨静仁出生于兰州。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由于伯父没有孩子，于是父亲便把他过继给了伯父，由伯父、伯母抚养。童年的杨静仁便在天蓝地绿的朱家沟村和同龄的回族孩子一起玩耍，并在他家“十三亩大地”那里追逐嬉闹。朱家沟的田间小路上，弯弯曲曲的小河边，村子里的巷巷道道里留下了他的串串足印，天空里响着他稚嫩的歌声。

到了入学的年龄，伯父把他送到兰州上学，先在孝友街第四小学，后升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兰州一中）就读。寒暑假，伯父用骡子把他接回朱家沟。杨静仁的童年就在爷爷和伯父、伯母的呵护下，在同龄人的嬉闹中无忧无虑的度过了。

创建伊斯兰学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关内中华大地。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中华儿女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此时正在省立一中读书的杨静仁积极参加兰州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多次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上街演讲、游行，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领土、屠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动员、团结全国民众一致抗日。从 1933 年初中二年级起，他就以春魂、火花、铁奋等笔名，在兰州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土豪劣绅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残酷剥削，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为了声援遥远抗日将士，他自己不但捐钱捐物，还组织其他回族学生一起开展募捐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号召和组织领导下，兰州的广大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建立起各种进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静仁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面对当时的形势，他打算和几个进步青年成立回族抗日组织。

一天，杨静仁招呼大家坐在黄河岸边，商讨成立回族抗日组织的事宜。他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回族人民也应该组织起来，投入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另一位叫鲜维峻的青年高兴地说：“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尽快组织起来，成立回族青年抗日组织，宣传国共合

作、共同抗日的伟大意义,声援抗日前线的军民。”几个青年商议了相关事宜后,便委托杨静仁和鲜维峻着手筹备成立回族抗日组织。

几天之后,杨静仁将写好的报告送到国民党省党部,不料竟被退了回来。杨静仁便和鲜维峻径直去省党部理论。一位戴眼镜的官员接待了二人,杨静仁简单地说明来意,又将报告呈上去。这位官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些回子瞎闹什么?参加我们的西北青年抗战团可以,但要你们回教人单独成立抗战团体,绝不允许。”说完,将报告扔出门外,并把他们推了出来。杨静仁捡起报告,愤愤地说:“你们不允许,我们偏要做。”

回来后,杨静仁和几个回族青年又召开秘密会议,最后决定,鉴于当前这种情况硬拼不行,惟有利用过去一个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的老招牌,将回族青年组织起来,因为“伊斯兰学会”以前备过案,不需要重新申请批准。

不久,以“伊斯兰学会”为名的甘肃回族青年抗日进步组织成立了。杨静仁、鲜维峻等7人组成干事会。他们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会员们多次举办座谈会,出墙报、办小报、发传单,大大激发了广大回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们还出版杂志《回声》,杨静仁担任主编。《回声》杂志坚持全国各民族群众团结抗日的原则,坚决维护回族同胞的根本利益,始终站在反抗、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民族歧视斗争的最前列。

由于伊斯兰学会在杨静仁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兰州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全民动员、共同抗日的主张,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多方刁难、挑拨、散布流言蜚语。针对这种情况,杨静仁毫不示弱,他在十四坊回族群众会议上,勇敢地揭露了反动分子马慎德的问题,并号召广大回族群众,特别是广大进步青年团结一致,对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进行改组。在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杨静仁被选任该会书记(相当于秘书长),进步人士杨德亮、吴鸿业被推选为委员。

在杨静仁等同志的领导下,回民教育促进会

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开展的非常活跃。为了加强对广大回族群众和进步青年学生的教育,杨静仁除经常性的办好壁报、召开座谈会外,还多次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作报告。曾先后请顾颉刚先生作学术报告,请张仲实在小范围讲民族问题。1938年初请茅盾作《抗战与文艺》的报告,给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937年秋,经吴鸿宾介绍,杨静仁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党的事业。1938年3月,中共甘肃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的力量”的指示,工委书记孙作宾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决定鲜维峻任支部书记,杨静仁为组织委员,马明德为宣传委员,直属工委领导。

1938年上半年,杨静仁和鲜维峻等去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请示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族工作;并学习抗日救亡进步团体的工作经验。秦邦宪、董必武接见他们并给予指示,还介绍他们会见了著名人士沈钧儒、史良、柳堤、张仲实等,受到很大教益。他们在武汉还与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回来后在兰州、榆中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杨静仁以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到场讲了话,阐明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和任务。

1939年,国民党甘肃省府借口统一领导,严厉限制抗日进步活动,规定社团重新登记,并以此为借口取缔进步团体,打击进步力量。他们不准伊斯兰学会重新登记,勒令杨静仁主编的《回声》限期停刊,至此,伊斯兰学会和回民促进会基本停止工作。

杨静仁与中共榆中县委

1937年10月,兰州地区第一个农村党小组在榆中县金崖镇邴家湾村成立。年底,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崖支部成立。1938年1月,榆中县城关支部成立,至此,榆中已经有两个支部,16名党员。为了巩固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到党的怀抱中,投入到全民族的抗战中,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榆中县委。

根据杨静仁的建议,朱家沟村是一个纯回民聚居区,居住着清一色的回族村民,与外界接触较少,同时国民党榆中县政府对这一地区管理比较松散,加之这里还没有学校,如果在这里办一所小学,以此为掩护搞地下工作,具有很好的隐蔽条件。4月21日,中共甘肃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称:“外县比较好的地方是榆中县,有16个同志,在农民中做些工作,将来准备成立县委。金家崖有一个农民支部……”。

5月,甘工委决定成立榆中县委,派延安党校毕业学生张杰(原名张恩科,回民,河北沧县人)、金少伯(又名金三津,回民,四川人)来榆中县工作,张杰任县委书记。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员思想和党的知识教育,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县委先后建立了朱家沟和大壩岷两所回民小学,张杰任朱家沟回民小学校长,金少伯在大壩岷小学任教。为了帮助县委尽快开展工作,杨静仁时常回到朱家沟。在朱家沟小学同榆中县委书记张杰、中共甘肃工委组织委员郑重远、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成义及金少伯秘密商议组织发展事宜。

为了团结回民,提高他们的觉悟,在杨静仁的帮助下,县委在县城西关清真寺成立了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选举张杰、马腾蛟和马德元为常委。杨静仁以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详细阐述了回民促进会的宗旨和任务。在甘肃工委和兰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杨静仁等的帮助下,榆中县委和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的工作顺利进行。

陇上“阿庆嫂”马兰香的回忆

为了帮助县委尽快搞好工作,杨静仁帮助张杰、金少伯租住在朱家沟村的贫苦农民马兰香家的窑洞里。杨静仁、陈成义、金少伯、傅从俭等也以张杰同学的名义经常来这里聚会。逐渐,马兰香夫妇了解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从事的工作。经过组织谈话,马兰香成为县委的地下交通员,她们家在金崖镇开的饭馆成为县委的地下联络客栈。

马兰香胆大心细,机智聪明,她把一些信件巧妙地藏在发髻下、衣襟里、鱼肚中,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解放后,被人们誉为“陇上阿庆嫂”。

个又一个任务,解放后,被人们誉为“陇上阿庆嫂”。

有一年,从兰州送来一张秘密纸条,要她迅速送到杨静仁手里。为防止敌人盘查,她把纸条卷成小卷塞进毛笔套里,再塞到鱼腹中,然后又在鱼身上浇上水冻成冰鱼,让丈夫陪着她装作走亲戚的样子,把情报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1941年初冬的一个黄昏,狂风怒号,大雪飞舞。两个商人打扮的人走进马兰香开的饭馆。“掌柜的,先倒两碗茶。”其中一个大个子抖了抖浑身的雪花说。在他们吃饭时,马兰香隐约听到两人说什么“朱家沟等天亮就动手……”她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两个人说的事会不会与张杰他们有关呢?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告诉张杰他们。等送走这两位“不速之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外面伸手不见五指。马兰香为难了,自己去朱家沟吧,一个女人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30多里山路很可能要误事,可如果不说的话,万一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得了?正在这时,她忽然想起一个人,邙家湾村的进步青年周焕丰。如果把这事告诉他,让他跑一趟朱家沟,这信就一定送到。马兰香随手拿了根木棍,一头撞进漫天大雪之中,直奔五里之外的邙家湾村。从睡梦中惊醒的周焕丰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口气从雪地里跑到朱家沟报了信。翌日凌晨4点多,有五六个骑马持枪的人袭击了朱家沟张杰他们的住处,却扑了个空。

1941年正月,张杰一行人要到徽县开展工作。马兰香套上牛车,把他们一直送到了榆中和定西交界的水坡梁上。在他们走后不久,一个男子来到饭馆,鬼鬼祟祟地到处张望,一碗饭没吃上几口就走了。第二天刚开门他又来了,问掌柜的在不在家,马兰香心想:这个人面生,吃饭不像吃饭的样子,还爱胡打听。便随口说:“到外地宰牛去了。”那人又说:“嫂子,打问一下,杨静仁是不是常到这儿来?那是我孬舅,我找他有急事。”马兰香一听这话,心里就全明白了,因为杨静仁根本就没什么外甥。她从容地答道:“我不知道,我整天忙着招呼客人,哪里有功夫打听客人叫啥名字。”这人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开饭馆。次日,这男子又闯了

进来,脚还没跨进门里就气势汹汹地叫喊:“杨静仁到底在哪里?还有他们一块的张杰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我不是说了么,我不知道!”马兰香虽柔声细气却坚决地回答。来人盘问许久,马兰香巧妙应付,没有透露半点蛛丝马迹。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男子恶狼一般扑上前来揪住马兰香的头发,死命抽了她几个耳光,见仍无反应,他又将马兰香的头向墙上撞去。厉声喝问:“杨静仁他们到底在哪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马兰香从容地捋了捋凌乱的头发,大声说道:“不知道!我这里来的都是客,什么杨静仁不杨静仁的。”那人恼羞成怒,竟从正旺的炉火中夹出一块炽热的炭,吼道:“说不说?”可回答还是“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就将马兰香的裤腿猛地捋起,强行将她按在炭块上。

解放后,在皋兰县工作的女儿将马兰香接到自己身边,马兰香当选为皋兰县两届政协委员。1965年,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她几次到北京去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杨静仁,杨静仁要她留在身边,她却难舍故土,执意回到了家乡。

尽孝伯父伯母

鉴于杨静仁的处境日渐险恶,中共甘肃工委决定让他撤离甘肃去延安。1941年3月,杨静仁到达延安,先后任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政委、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等职。解放后,杨静仁忙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很少来朱家沟,但他非常关心伯父伯母的生活。“文革”中,杨静仁的妻子吕琳也来朱家沟避风。1983年7月21日,时任中央民委主任的杨静仁陪同胡耀邦总书记来甘肃视察时,回到朱家沟,在村口的坟地里,祭奠了安葬在这里的伯父伯母。

心系家乡

解放后,杨静仁虽因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来家乡看看,但他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关心着家乡父老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了解到家乡2000多名群众文化生活单调,一年才能看上一两次电影后,协调文化部门专门为朱家沟村调拨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使回族群众每月都能看上新影片。

1981年,了解到群众没有机械搞运输时,又协调调拨了6台手扶拖拉机和1台中型拖拉机,解决了各生产队的运输困难。1982年,当了解到家乡2000多名回族群众吃水要在6里外的地方拉时,他协调国家民委支持7万元,由县水电局抽调专人测量施工,埋设了9公里管道,解决了2000多名回族群众的饮水问题。1987年,协调有关部门投资,为朱家沟小学兴建了500平方米教学楼,解决了200多名孩子入学难的问题。90年代初,兴隆山风景旅游区开放后,应榆中县委、县政府的委托,杨静仁专门请胡耀邦总书记为兴隆山题词:“陇右名山”。90年代中期,了解到家乡正在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部志书时,欣然题写了《榆中县志》书名。

2009年,杨静仁的子女们专程到朱家沟,认亲访友,寻根问祖,感谢全村父老乡亲在革命战争时期对父亲的保护和支持,同时祭奠了祖父祖母。

永远的怀念

2001年10月19日下午5时,是一个无比悲痛的时刻。朱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马进禄,从电话上接到一个不幸的噩耗:在朱家沟长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杨静仁在北京逝世,请他作为乡亲代表前往参加葬礼。

马进禄便带着五百多户回族人家、2400多乡亲的哀思,和县政协副主席丁述学打点行装,同省委书记宋照肃、市政协副主席施进兵等作为杨静仁家乡的代表,飞往北京,前去吊唁。

杨静仁的追悼会于10月22日8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有国家领导人李瑞环、胡锦涛等前来参加。会后,杨静仁的遗体移往北京回民公墓区。

70多年来,朱家沟群众为了表达对杨静仁的无限怀念,教育青少年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把杨静仁、张杰、金少伯等工作、生活过的县委旧址、杨静仁故居精心保护下来,榆中县已将这些普查为革命遗址进行保护和开发,使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

从《慕寿祺致甘肃通志总纂安晓峰书》 探先生方志学的学术思想

慕思恭

慕寿祺先生是清末民国时期甘肃史志界的著名学者。著述甚富,但其有关史志学的学术专论还未所见。笔者于2002年在编修《镇原慕氏族谱》中收到了他散落民间的一些手稿。其中,有一篇是他在清宣统元年(1909)致《甘肃通志》总纂安维峻的上书。安维峻(1845—1925年),字晓峰,甘肃秦安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归任《甘肃通志》总纂。是年,安已63岁,慕寿祺34岁,是他中举的第五年,时供职于甘肃高等学堂历史学主教兼经学分教,两人始有接触。上书中有“既蒙青及,窃欲白之”等语,说明安到兰后可能就有通志编写事宜与慕有过交谈。慕当时是以晚徒下属的身份上呈他对甘肃方志编纂的一些学术性意见。全文约4500多字,是一篇古旧上书行文体,难免恭维之词,但并无攀附仕晋空泛流俗之语,纯是学术论谈。主体内容是简述了甘肃旧志状况;说明编写《通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婉转呈述了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大胆的评述了清代方志成志书的一些失误,分析了造成失误的原因和各级修志队伍组织中的弊端。是一篇兼具学术性,又具实用性、并具文献性的资料。因为我见到的是先生亲手草稿,当时是否已达安维峻的鸿案?是否公之于学术界?时越百年,不得而知,诚恐文献湮没,即校点录入《镇原慕氏族谱·文存卷》。值此全省各级修志之时,仅以本人阅读粗解,就其论及的主要观点归纳

为五个方面,节录其原说供读者鉴赏。

其一是:省之有志,如国之有史,久而失修,缺略无徵,何以光邦家?

文中说:“《甘肃通志》自乾隆以来,历百余年,经历任制军从无人起而过问者非略之也。诚以为,省之有志如国之有史,所以记地理、志风俗、述典礼、定经制、表人物、系纲常。视芳徽于既往,垂考镜于将来,其事至重,其任至艰,其关系至大,非有迁史之才,董狐之笔不能道其只字,传其千秋也”。……“志之为书。其原本于《春秋》,其例仿于职方氏,其书行于成周之末。自秦无道,天下起而鹿、沛公入咸阳,萧相国收秦图籍,说者谓即今之志类,盖三代诗书尽付祖龙之炎。然则,相国所收者非中秘书也,不过各郡县所载,用以辅炎汉四百年之治。自汉而后,梁元帝有《荆南志》、樊文仲有《中岳颍州志》、沈怀远有《南越志》、王石朱有《九峻山志》,宋以前传者仅此而已。至宋而府州军监始有志,各县亦有之,不能尽有也。至明而府州县均有志,而通志之名犹未闻也。至清受命而兴……国史馆既修《一统志》,十八承宣司又修通志,此甘肃所以有通志也。通志而外,府、州、县次第纂修……。自乾隆至今,期间因革损益。盛衰兴废其事何至一端?而官师人物、忠孝节义之辈出者代有人焉。况同治兵燹以来……陇右无完宇,向之典章文献委弃于荒烟碎瓦中。及劫运既转,虽《通志》无恙,而州郡之志镌版销亡殆尽,欲问旧时轶事而故老列

在者，盖邑乘之志废坠入矣。当兵戈扰攘之余，老成凋谢之秋，若不搜集而重修之，再越数十寒暑，无论以通省事迹询问诸大夫或茫然无以应。即以一邑之事，寻一邑之人，如执三代以下之人谈混沌初开之时，瞠目结舌不知所谓。”“久而失修，缺略无微，何以光邦家。”

先生简忆方志源流，引用甘肃历代省州县志的空缺和散失，以一位史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呼吁甘肃方志编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甘肃置行省较晚，原无全省通志。明至清初，甘肃的地理、历史记载多附《陕西通志》中。清雍正六年(1728)始创修通志，由许容、李迪纂修。多抄录《陕西通志》的甘肃部分，仓促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镌刻印刷定名为《甘肃通志》。各府州县志多创修于明代，但因战争灾荒频繁，毁失严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肃设通志局，由安维峻任总纂修，重修甘肃通志，并统领重修府州县志。先生即在此时向安维峻上书，反映甘肃方志的编修和存书状况，呈述自己对志书编修的意见，显示出—位史志学者的才华和卓见。他不但是一位声嘶力竭的倡导者，而且是一位呕心沥血的编纂者。他后来个人编著了洋洋四十卷的《甘宁青史略》，到民国十四年(1925)供职甘肃省通志局任主纂，与杨思、张维等，历时11年编成130卷的《甘肃通志稿》。其业绩即可证实先生当时所言之由衷。

其二是：旧志宜修，诚不可一日而已，失误弥多，得人尤难。

文中说：“旧志之宜修，诚不可一日而已也。然尝观一郡一邑之志……数年衰然成集矣，究其所成者，考据不详其失也漏；见闻未确其失也浮；取去不守其失也私；舛误滋多其失也滥；芜秽不纯其失也杂；铺张过甚其失也夸。识者阅之，手未终编。盖由修志始，官吏借以掠美而沽名分纂，各员亲故居其半，绅耆居其半，率皆因循简陋，迎合长官之意，虚靡下民之膏。宜其言之不传，传之而不能久也。郡邑之志得人且难，又何论其通志哉！”“视近世志书，或出有司这粉饰；或听俗世之铺张，欲夸耀一时者固出万万矣。惟是开办之初，不得不集材外府，大吏下之府道，府道下至州县，州县委之绅

衿，绅衿处长委末学新进，了草塞责，视为具文。其与上之总局者，非抄袭旧本即妄呈私见。欲如康对山志武功、王美陂志雩洲、吕涇野志高陵、韩五泉志朝邑、孙立亭志富平、乔三石志耀州、汪来志北地、胡亭志秦州、刘九经志眉、张先武志华、赵浚谷志平凉，有黄图决录之遗，有班、马简洁笔，窃恐未必然也。”

先生浓墨重笔指出清代方志的六大失误；强调修志队伍专业修养的重要性。认为旧时修志在各层队伍选配上的恶习及弊端是造成志书编写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历来通令修志中具普遍性的问题。主张平庸官吏不能主持修志，与章学诚“文人不可修志”的主张相类似。

其三是：本集思广益之心，宏兼容并收之量，广阅新旧志书取长补短，方能达到翔实完备，繁简得中。

文中说：“太岳之高，资群山以为辅；沧海之广，合众水以同归。大厦之成，非一木所能任；千金之裘，非一腋所能为。本集思广益之心，宏兼容并收之量，每得州县之志，虚心采纳，有长必取，有善必录，有渣滓则涤除以修饰之；有玩延则遣人收取之，必其善，无一惑遗。”“凡国计民生、人情风俗、山川形势、政治本原洞悉然于胸中，兹以胸中欲言者赖志书发泄之。所谓建置之沿革，官师之贤愚、风俗之变迁、田赋之增减、山川、疆域、方物之数、忠孝节义、山林隐士及形势古迹、城郭津梁、祀典学校、人物选举、文章韵事之述，纲举目张、繁简得中。”

先生主张集思广益不能孤高自是。不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均须纳百家之言，取长补短，成一家之书，才能翔实完备。只有纲举目张，才能繁简得中。并强调在各类目的记述中要注意事之变迁、物之增减，显示其因果关联性，采用动态记述。强调“民俗”、“方物”记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突出地方特色。

其四是：志之虽书，图尤为要。

文中说：“虽然志之为书，文固重而图为要。昔萧相收秦图籍遂知山川道涂之广狭，郡国人民之增减，用以促秦浮楚而兴汉，说者谓志之有图。”

“传卫元王使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则图之所起远矣，后世史策所载。南宋袁燮为江陵尉令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又元始嘉定县志改乡为都，改里为图。国朝志书亦各有图，但其所绘者城池耳、衙署耳、祠宇耳，与文不相联络。近十余年来，吕国绘图之学日益发明，以助文字之所不及。昔者普法之战。普国军士帽中各有法舆地图，按之往皆验之。近今考之他国地图顾可不重哉？”“每类必绘以图，俾阅者一目了然，知山川之厄要与道路之纵横，固考古者之所资借也，而亦行军用兵之所莫能外。”

先生用较大篇幅例举前代的经典志书和历史故事，说明图在志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图与文的关系，指出图可以助文字所不及，可以增强志书的适用性。也批评了清代一些志书图与文不相关联的问题。他在百年前就提出：“志之虽书，图尤为要”。主张志书“每类以图”在学术上还算是较早的，对后来史志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其五是：人物传记“善恶并记忠烈必录，将以扶世教而正人心”

文中说：“康对山叙武功，官师有书其善者，有书其恶者，有书一人善恶并书者。志在劝惩，义存笔削。”“盖非如此，不足以扶世教正人心，藏之名山，传之无穷。”“对山而外，如宋次《洛阳志》、童太史《沔阳志》皆具史一体，是可知其大凡矣。昌黎作柳子厚墓志铭而曰：子厚少时为人不自贵重。南丰作颜公祠堂记曰：公出入浮屠。古人执笔为文，虽平生至交……表其善而不能掩其恶，体例大都是，况志书为政治风化所关，顾不可等诸应酬文字哉！”先生针对当时轻视忠烈记载的倾向说：“或谓今之通志与往时异，凡忠孝节烈之事未必尽录，亦何必多此一举？”“鉴忠诚贯金石，无非忠义二字蕴蓄于居恒，此次给定修殆，将以扶世教而正人心也，舍忠义何以哉！天道每十年一变，纲常则万古常昭。如必以忠义为迂阔则是张子房之椎、苏典属之节、嵇侍中之血、张睢阳之齿、颜常山之舌、岳武穆之背、文文山之正气歌、武乡侯之出师表、周公旦之金縢书皆将废而不存乎？如必以节烈为庸，则是卫工作服姜之守柏舟、楚贞姬却白璧、曹大家之

作女诫、黄甫氏之废车轮、梁高行之以刀断鼻、段纪配之援刀断指、刘氏女之剪金为字、李烈妇之引斧断臂、汉刘向编烈女传、康武功之作节妇歌皆将卑无足道乎？当亦仁人君子所不忍为也。”

秉笔直书，善恶并记，原本是史志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历来实难坚持。时至清末，政治腐败，世俗恶化，平庸者率想盘据志局馆，史德坠陨，人物志传谬误弊端甚多，遗害甚重。先生忍无可忍，方重新呼唤以救志风。先生又用设对驳论方式，列举了大量的志例和传记典故，驳斥了当时轻视忠孝节烈志录的不良倾向。主张忠烈必录。大声疾呼：志之成书“将以扶世教正人心也，舍忠义其何以哉！”

先生的这篇上书是1909年所作，仅见其早期学术思想之一斑，嗣后的四十年才是他史志学术上的辉煌时期，想必还有精深卓见之作，笔者孤陋寡闻，仅据所得星点资料，梳理抄录供史志学者参考。

（作者系庆阳市档案馆原副馆长）

赴甘谷县 大庄乡杨家坡村扶贫

◎ 钱旭

寒风向西我向东，
甘谷乡下去扶贫。
车到山前已无路，
爬坡越岭靠步行。
进村入户问饱暖，
翻地平田忙春耕。
小康有期添薄力，
大爱无垠献真情。

（作者系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因“离天只有三尺三”的露骨山和风景秀丽的雷公峡景区相扮，青山绿水中的漳县石崖寺显得更加美丽动人。

石崖寺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周边群众淳朴朴实的民俗风情使这方土地洋溢着温馨与和谐的气息。这里的人们善于唱花儿，家家有歌手，户户有新苗，举手投足之间都有花儿相伴，可以说花儿已渗透到了人们的心田，绽放于日常生活之中。

每年农历六月六，一年一度的石崖寺花儿会便拉开了帷幕，来自汉、藏、回各民族的花儿歌手都会来到石崖寺一展歌喉，他们打着雨伞，手抚耳根，唱出了自己最拿手的歌，使这儿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沉浸在歌的海洋，展现出一番山中有歌，歌中看人的别致景观。

穿戴地花枝招展的人们或三人一组，或十人一滩看戏谈心、载歌载舞或聊天休闲，甚是热闹。僧人也开始在大雄宝殿里念经，善男信女们烧香的烧香、磕头的磕头显得极度虔诚，一切礼拜完毕后便都加入了花儿竞唱的行列。

听，这边在唱：

“六月六日搭伞哩，
人的精神人长哩，
你去我把你想哩，
我的精神谁长哩？”

那边立刻有人响应：

“火盆沿上三块碳，
前天说的天花转，
天天把你不见面，
活把人的心操烂。”

这边又在唱：

“石崖寺的山顶里，
人如小豆乱滚哩，
寻个石头垫稳哩，
恐怕你把我哄哩。”

那边立刻又有人响应：

“冰冻三尺着口子开，
雷响三声着雨点来，
陪住你着走不开，

石崖寺花儿会

李雪兰

坐哈没心肠起来……”

总有那小青年恶作剧：

“缸缸里提了渗沙水，
前搭胳膊后搭腿，
咱们两个嘴对嘴，
欢欢乐乐真个美。”

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歌手都在这一天大显身手，人们脸上各个洋溢着喜庆的笑容，歌儿里夹着糖，渗着蜜，出尽了风头。妙趣横生的花儿使人们流连忘返，戏台上，县秦剧团的演员们也闪亮登台，为为期三天的花儿会献上最精彩的唱段。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石崖寺，人们唱花儿，听花儿，品花儿，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温馨，尽情倾诉心与心之间的甘苦，一颗颗年青的心在花儿中拉近了距离，一个个陌生的人在花儿中走到了一起。

各民族之间的花儿对唱也别有一番情趣：“桶子里担水缸里倒，不知道缸里是漏的。口儿里说话眼睛里笑，不知道心里是爱的。”“露骨山下帐房白，手打上凉伞浪来，小阿哥相亲我相爱，心上的花儿(哈)漫来。”“上山的鹿羔下山来，下山了平川里跪来，老远的妹妹跟前来，手拉着手儿阿哥的跟前坐来。”“漳河沿上的松柏树，河底里扎根(着)哩。小阿哥走的是治富路，尕妹妹放心着哩。”

……

唱热了，给钱的，给糖的，挂红花的，场面盛大，热闹非凡。

在这样的盛会上，大姑娘小媳妇们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把平时攒下的零用钱用来买这买那；老大爷，老大娘们个个拄着拐杖咧呵着缺了牙齿的口来凑热闹。最高兴的要数那些光着屁股，流着

鼻涕的小娃娃们，他们一会儿跑到这边，一回儿跑到那边，口里边嚼着大人们给买的零食，或叫或闹、或哭或笑忙的不亦乐乎。许多小贩们把生意做到了花儿会上，什么买酿皮的小吃的，买衣服零碎的这边喝来那边应，一天下来的收获要比平时翻几翻，既尽了兴，又赚了钱，心里面热乎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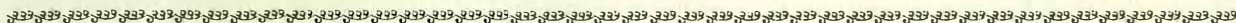
石崖寺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刹。当时，藏汉群众在山顶上修造了大雄宝殿，内塑三尊大佛，寺内僧侣众多。后于光绪四年（公元 1878 年）又扩建了转阁楼，塑造佛像十二尊，寺院坐落在小山顶上，南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十株松树，这座寺院把拉麻十多个村庄都尽收眼底。

据说，光绪七年的时候，拉麻出了个路大王，是朝廷命官，光阴很好，回乡后在外地逛庙会时受

人戏落。回家后说：“我们也要唱戏”。于是就在半山腰盖了戏台，每年六月六自发组织起来唱戏、耍乐，为当地庙会增色不少。遗憾的是如此鼎盛的风景亮点在文革期间惨遭破坏，成了废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地群众重修了戏台、庙宇。二〇〇一年又修复了石崖寺大雄宝殿和观音殿，并从兰州五泉山运来三尊大佛四尊铜像。一年一度六月六花儿会也延续了下来，而且一年比一年热闹。

石崖寺花儿会，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唱出了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好光景。歌手们满怀深情引吭高歌“红牡丹开在花园里，马兰花开在路旁，共产党领导真英明，带咱们在幸福路上。”“暖不过天上的红太阳，共产党亲如咱爹娘，乡村的光景大变样，农民们住上新房……”

（作者单位：漳县文化馆）



（上接第 51 页）

- 民族事务
- 民族风情
- 第二章 宗教
 - 宗教事务
 - 宗教管理
 - 重大集会及事件
 - 宗教界社会公益活动
 - 友好往来与交流
 - 宗教调研
 - 宗教场所

民俗篇

- 第一章 新词汇
- 第二章 汉族民俗
 - 节日
 - 婚俗
 - 丧葬
 - 日常礼仪
 - 衣食住行用
- 第三章 穆斯林民俗
 - 节日

- 婚俗
- 丧葬
- 服饰
- 清真名优食品
- 礼仪、禁忌
- 民居

人物篇

- 传记
- 简介
- 名表

附录

- 文献选录
- 碑文
- 前志勘误
- 关于成立临夏市地方志第二轮修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
- 关于出版《临夏市志(1986—2005)》的请示
- 关于准予出版《临夏市志(1986—2005)》的批复

中国地名趣味派对

车安宁

人类社会,从文明萌生的开始,就给自己的居住地和活动区域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后来延伸到周边地区,再后来,延伸到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因为民族语言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观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同一个地域或山川河流,也会出现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不仅反映着一个民族在不同时代对自然环境、地理概况的认知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一定时期不同民族的信仰理念和价值取向。由此,地域名称中便有了文化信息的含量,就不仅仅是特定地域的符号代称。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纵览中国地名,大都以汉语为准,总体上以两个字组合而成。其中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两者对应,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有如北京—南京;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等,其中一字相同,另一字相对;有如开封—封开;化隆—隆化;东阳—阳东等,其两字相互颠倒;还有更多的地名,则是字面意义相互对仗,或形成对照反差,或互为因果关系等,似为传统对联中的上下联句。笔者不揣浅陋,本着趣味性原则,对一些地名进行组合派对,以益于大家加深对地名的记忆,也有益于对中国地名文化的了解和研究。由于地名本身的限制,无法严格遵循平仄要求,有些地名派对的不一定恰到好处,难免贻笑于方家。

本文主要选择县(区)级以上地名和著名山川河流,个别涉及到乡镇和岛屿及大的地理名称。对于古地名,则暂不列入。

北京—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城—西城;
鸡东—鸡西;肥东—肥西;东平—西平;
日月山—日月潭;长三角—珠三角;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山阳—山阴;
西安—安西;宁海—海宁;罗平—平罗;
开封—封开;宁安—安宁;化隆—隆化;
高阳—阳高;安吉—吉安;东阳—阳东;

和政—政和;安平—平安;长子—子长;
曲阳—阳曲;和平—平和;宣武—武宣;
都昌—昌都;德化—化德;康保—保康;
新乡—古县;兴城—昌都;合水—双流;
崇文—宣武;崇礼—尚义;文成—武功;
平遥—靖远;桐城—梧州;丰镇—沛县;
古交—新和;突泉—平江;广水—深泽;
广饶—大丰;迁安—旅顺;集贤—来宾;
沙洋—漠河;鹿寨—象山;仙台—佛坪;
息烽—偃师;巍山—景谷;墨玉—黄石;
南阳—北辰;孟村—孔府;甘泉—苦水;
禹州—夏邑;沙县—泉州;陕县—秦城;
威县—霸州;紫阳—密云;金沙—玉溪;
云县—雷州;太仓—谷城;丰城—肥乡;
榆林—竹山;大连—通辽;宿迁—新宾;
东城—西乡;保定—固安;米易—枣强;
延寿—永年;稻城—盐池;定州—安国;
赤城—青县;三河—五峰;盘山—环江;
三原—五台;湖州—海城;鱼台—米林;
凉城—温州;五原—九台;龙江—马海;
明水—清河;抚远—定边;南开—张北;
蛇口—龙井;南宁—北安;含山—夹江;
神池—灵台;无极—道真;大悟—贡觉;
天镇—仙台;天台—仙居;平谷—高台;
平湖—高陵;仙台—巫山;临城—望都;
蛟河—龙泉;仙米—嘉鱼;河口—海门;
楚雄—汉阳;贡山—猷县;松桃—荔枝;
东海—西湖;雄县—阳城;武乡—文县;
宜君—奉贤;久治—长安;百县—万州;
固阳—当雄;长海—大港;两当—双牌;
武强—文安;博野—大田;临西—东至;
梅山—萍乡;长治—泰安;太谷—大洼;
乐山—慈溪;金华—玉环;长兴—永昌;
乐都—曲阜;怀安—承德;凤台—龙岩;
屯留—温宿;武邑—文山;内丘—中川;
启东—迁西;三峡—五寨;宽城—长垣;
海城—长岛;耿马—涿鹿;洪湖—泽州;
长岭—横峰;界首—延边;铁岭—嫩江;
德化—武安;武川—文水;平潭—静海;
怀仁—顺义;铁岭—铜山;青龙—义马;
射阳—定日;玉门—壶关;龙州—凤城;
容城—盖州;洛阳—汉阴;平江—衡山;

孝义—和顺;崇仁—尚志;浮山—涟水;
玉山—银川;平果—梨树;德兴—孝昌;
上饶—广丰;乐亭—曲周;晋城—魏县;
丰都—肥城;延吉—长寿;康县—寿县;
长江—上海;长海—天山;黄河—红山;
西安—南宁;南昌—西宁;辽宁—延安;
江门—海口;吉林—玉树;黄海—青岛;
威海—镇江;山东—河西;河北—湖南;
河南—湖北;山西—海南;秦岭—汉水;
赤峰—白水;陇南—肃北;洱海—湛江;
乌山—青海;温江—凉山;赤土—红河;
秦岭—晋江;虎门—龙口;普陀—崆峒;
龙游—凤翔;内江—临海;佛山—禅城;
铁岭—铜川;武威—文昌;武都—文县;
长安—永靖;遵义—崇信;德清—孝感;
唐山—宋城;锦江—宝山;洛阳—淮阴;
阳江—阴山;华山—丽江;三水—四川;
荆门—韶关;石狮—金牛;金华—铜仁;
黑山—白云;湘潭—滇池;南沙—北海;
芜湖—荷泽;赣水—湘江;昌都—兴国;
共和—大同;德宏—昭通;黄浦—青川;
乐清—曲靖;太和—永昌;富平—康乐;
仙桃—大荔;西和—南平;互助—合作;
福州—寿县;通县—达州;运城—通州;
融水—合江;三峡—六合;礼泉—义乌;
彰武—修文;香港—灵台;渤海—洪江;
海盐—江油;烟台—香山;临河—望江;
海城—江都;厦门—潼川;独山—合水;
玉林—珠海;宝鸡—丹凤;锦州—花都;
枣庄—瓜州;酒泉—烟台;四平—六安;
甘南—陕北;梅县—兰州;古蔺—新竹;
黄岩—赤水;热河—凉山;崇信—贵德;
锦屏—鹤壁;白山—黑河;新乡—故城;
恩施—善化;新野—古田;昆明—敦煌;
红河—蓝田;浑江—清水;秀山—丽水;
神木—灵石;金门—银川;澳门—汶川;
楚雄—秦安;太湖—广州;伊春—临夏;
阜新一个旧;城固—乡宁;开封—张掖;
榆林—桃园;营口—马关;乐山—怒江;
长沙—古浪;弥勒—道真;黄石—红水;
金坛—铜陵;建德—兴业;华山—夏河;
鹿寨—马山;巨野—太原;华阴—贵阳;

北流—南汇;商州—易县;西昌—南通;
中山—下关;石林—玉溪;鲁山—齐河;
武进—文登;环江—临海;深圳—广河;
广和—长乐;包头—汕尾;静海—响水;
朝阳—栖霞;沙市—漠中;日照—云浮;
酒泉—茶陵;鸡泽—鹤岗;九江—十堰;
吉首—大足;温县—凉州;抚顺—安康;
玉门—石城;绥化—靖安;兴文—修武;
固原—和田;鸡泽—鹰潭;蚌埠—鱼台;
商丘—周庄;乌镇—白城;单县—双城;
安源—本溪;广水—辽河;通山—达川;
竹溪—松江;武冈—文山;南平—西宁;
广德—无为;万宁—永福;蕉岭—芦山;
保德—巩义;汉江—唐海;桦川—柳河;
木兰—石棉;柳州—桐乡;同江—合川;
赤壁—青冈;柏乡—松原;商水—夏河;
福安—寿宁;万州—诸城;安福—平乐;
永吉—长安;隆德—巩义;林口—洞头;
盐山—谷城;秦山—汉江;大安—普定;
红山—蓝田;开原—广平;中山—内江;
香河—甘泉;万县—大邑;咸丰—永和;
和政—同仁;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
太阳岛—月亮湖;巴音郭楞—呼伦贝尔;
九龙江—双鸭山;二连浩特—五大连池;
日月山—星星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三门峡—九寨沟;胶东半岛—河西走廊;
黑龙江—白马河;钓鱼岛—打柴沟;
公主岭—太子山;高碑店—大石桥;
黄浦江—青海湖;南泥湾—北大荒;
秦皇岛—炎帝陵;牡丹江—葫芦岛;
调兵山—驻马店;山海关—连云港;
张家界—石家庄;小汤山—大亚湾;
千岛湖—万泉河;大通河—太平岛;
乌鞘岭—白洋淀;嘉峪关—渤海湾;
五指山—千佛洞;石家庄—张家港;
牡丹江—蝴蝶泉;防城港—保山市;
嘉峪关—鼓浪屿;八达岭—九华山;
白鹿原—黑龙江;伏牛山—驻马店;
红龙庙—白马寺;梅山岛—松花江;
五道梁—六盘山;黄果树—攀枝花。

(未完待续)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天水市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2月22日，天水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和市地方史志编委会成员，各县(区)分管领导、志办主任，市直各部门、各单位及驻市有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共160人参加。天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奇若出席会议并代表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市直各部门签订了地方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简平、市政协副主席安志宏出席会议，市委办副主任、保密办主任李虎生宣读了市政府关于表彰全市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并向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书。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房建平 油画作品赏析



记忆



一篮鸡蛋



有竹篮的景物



三个汉子



午时